

瞭望

2014年第06期 02月13日出版 总第528期 定价:RMB 1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5115/Z 邮发代号:4-757 国外代号:W1826

ORIENTAL OUTLOOK

东方周刊

上海人在高坪

被称为“浙江西藏”的
丽水市,成为许多老年
人的乐园



张海在哪里

张海涉嫌造假立功减刑
并外逃的信息,出自广
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黄
武之口

封面报道

中国新智库

他国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都是很难的 P74



9 771672 588035

● 奇趣软件

● 小众游戏

● 各种图书

● 最新杂志

● 尽在 五花八门

● www.i5h8m.com

● qq交流群 11579083

CONTENTS 目录



P12 封面报道 COVER STORY

中国新智库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按照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的分析，应从“智库”、“中国特色”、“新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和内涵

社评 / EDITORIAL

P07 统一城镇化与农村改革视角

城鉴 / CITIES

P21 “灰城”石家庄

书摘 / BOOKS

P26 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健康 / HEALTH

P30 几百元体检足以预警妇科肿瘤

时事 / TOP NEWS

P33 防止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来管理行政学院
——对话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

P36 军方采购“瞄向”深圳



P21 “灰城”石家庄



在石家庄市环保局官方网站的民调页面上，近80%的受调查市民在“对自己的居住地环境质量满意程度”一题上选了“较差”选项

P66 马年，世界各国都什么样



一些国家经济逐渐驱散阴霾，人们的日子开始好转，社会生活重现活力，乐观情绪又出现在人们的脸上。而体育正是安逸时代最好的挥洒激情方式，因此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在谈及2014年展望时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体育



P08 新闻超市

P62 一周人物

P72 读者来信

解析 / ANALYSIS

- P39 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
——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 P42 高原上的“草帽局长”

专栏 / COLUMN

- P46 做一个低脂蛋糕
- P47 野渡无人舟自横

东方口碑 / EVALUATION

- P48 每周重要消费舆情
- P50 “马”上有钱
- P52 养老小镇崛起
- P54 上海人在高坪
- P56 基金打新顶风逆行

财经观察 / BUSINESS

- P59 财权格局新博弈

大生活 / LIFE

- P66 马年，世界各国都什么样

修行论语 / MORALITY

- P70 爱情的层次

文化 / CULTURE

- P74 他国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都是很难的
——历史学者姜义华专访（一）

西行录 / HEADING WEST

- P79 一个英国旅行者的“中国三问”

东游记 / HEADING EAST

- P80 一个日本人的观察：中国如何从源头上反公款送礼吃喝



(2014.01.27)
瞭望新闻周刊

踏遍青山问计人民

习近平从2012年11月15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至2013年12月末的400余天时间里，共用了39天，进行了14次国内考察调研，遍及全国1/3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七大军区。



(2014.02.05)
环球

大使总动员

中国充分发挥驻外大使的有利资源与条件，充分展现新时期中国大使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际公理的主动作为，揭批安倍错误行径，提醒国际社会警惕安倍的危险与企图。在这场舆论战中，中国师出有名，牢牢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2014.01.20)
财经国家周刊

新版“大北京”

时隔近10年，不堪重负的北京城，将重修规划。新版“大北京”规划将更加重视区域协作，《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在北京新机场、交通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城镇化等专项合作方面，北京已与天津、河北互相签署多份合作协议，京津冀越来越走近“政策共同体”。

瞭望东方周刊

新华通讯社主管
瞭望周刊社主办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瞭望东方周刊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姬斌

常务副总编辑 Executive Vice Editor-in-Chief
孙凯

副总编辑 Vice Editor-in-Chief
赵悦 程瑛 王启广

主笔 Senior Writer

黄志杰 山旭 祁和忠

责任编辑 Senior Editor

黄琳 顾佳赞 牛二波 戴闻名
金明大 张瑜 徐赛虎

记者 Reporter

柴爱新 张琰 杨天
黄柯杰 刘伊曼 赵新社
李静 周范才 葛江涛
张欣 邢静 骆晓陶
刘武 刘耿 芦垚
张静 傅天明 张海林
武刚 吕爽 钱贺进
张璐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徐修安 周传丽 董龄岳
周开艳 石婧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纪元 张杏梅

文字编辑 Language Editor

赵秀红

编务 Executive Assistant

康佩红 陈玥 杨卓琦

编辑部地址 Address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305号
电话：(021)64728115
邮编：200031

北京采访中心 Beijing Editorial Center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97号甲
新华社发行楼6层西侧
电话：(010)88052828
邮编：100031

2014年01月30日截稿

瞭望周刊社

总编辑

姬斌

副总编辑

胡俊凯 罗海岩 叶俊东

王磊

总编辑助理

史湘洲 杨桃源

瞭望周刊社主办刊物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
环球 财经国家周刊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赵悦

副总经理

张栋

财务经理

蒋震芳

广告中心 Advertising Center

常务副总经理

潘美君

副总经理

赵君

华北区 010—88052826

销售总监

戚健

高级客户经理

马远 张丽娜

客户经理

张玮 魏子源 叶夏

华东区 021—64721131

销售副总监

王楚伟 韩薪茜

华南区 020—38810492

销售副总监

张明达

广告助理

周杰

市场推广中心 Promotion Center

总监

张志勇

副总监

周佳妮

市场部

孙璐 高雪梅 刘丽娟

刘柳 韩晓晔 韩雪

发行中心 Distribution Center

总监

薛玲

副总监

郭伟

高级经理

王文林 钱民义 李黎

李建荣 徐正

印务

刘小东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石工商广字第0036号

广告总代理

上海瞭望东方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热线

上海 (021) 64721131

北京 (010) 88052826

邮箱 E-mail

读者来信邮箱

lwdfdzx@vip.sina.com

读者评刊邮箱

lwdfdzpk@vip.sina.com

财经新闻邮箱

lwdfcjxw@vip.sina.com

时政新闻邮箱

lwdfszxw@vip.sina.com

社会新闻邮箱

lwdfshxw@vip.sina.com

文化新闻邮箱

lwdfwhxw@vip.sina.com

新闻评论邮箱

lwdfxwpl@vip.sina.com

国际新闻邮箱

lwdfgjxw@vip.sina.com

图片新闻邮箱

lwdftpxw@vip.sina.com

印刷 Printed by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网址：

www.yuecheng.com

电话：

010-84417799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上海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757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海外定价：\$2.9

(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

W1826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2-5883

国内标准刊号：

CN11-5115/Z

订阅热线：

(021)64728110

(010)88052829

新华网网址：

www.xinhuanet.com

瞭望东方周刊网址：

www.lwdf.cn

本刊声明

《瞭望东方周刊》所有内容，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方式复制、改编、摘编、转载和传播。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头等舱、商务舱阅读刊物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本刊手机客户端，关注本刊官方微信、微博：



安卓版
客户端



苹果版
客户端



官方
微信



新浪
微博



腾讯
微博

统一城镇化与农村改革视角

本刊评论员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1年聚焦三农问题。与往年聚焦当年要推进的三农具体议题不同,今年的一号文件首次对以农村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作出全面的安排。

《意见》规定的时间范围是“201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而不是像往年一号文件那样只对未来一年的农村工作提出总体要求。这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从顶层设计着眼,以改革为抓手,全面部署农业现代化中长期建设的战略意图。

不仅如此,文件指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为紧迫”,这意味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部署是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大局一盘棋的思路下开展的。

只有厘清“新四化”的内在逻辑,特别是深刻把握城镇化与农村改革的内在联系,从城乡二元发展的对立统一视角着眼,才能找到从根本上处理好三农及城镇化等问题的思路。

首先,有效的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将降低无序的人口城镇化或城镇贫民窟化的风险。巴西等国的经验教训表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城乡不均衡发展,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大批农民抛弃土地来到里约热内卢,无处容身就兴建了大批贫民窟。现在约22%的里约热内卢人居住在贫民窟,毒贩和黑帮取代政府和警察成为贫民窟的实际治理者。

为了避免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应当在城乡一体化上多下功夫。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城乡同质化,而是在保留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将生活便利度与生活质量提升到城镇水准。

《意见》提出的“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和“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谓正中鹄的,在此基础上再提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便利,就不会给城镇容量造成过大的压力。届时,人们面临的选择只是田园与城镇两种栖息方式,而不是质量相差悬殊的两种生活水准。

其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为土地城镇化提供更大空间。《意见》明确提出,“引导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实际上,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城市群,存量建设用地中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从技术上讲,包括确权登记、流转交易平台、基础地价体系等在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体系的构建固然要花费心思,但

从本质来看,如何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保证这些土地入市的利益能为地方政府、农村民众、开发商及市民等相关利益主体所分享,更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配套细则成败的关键。

第三,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将提高城镇化整体质量。城镇化

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统一,前者过度超前于后者将造成“鬼城”现象,后者过度超前于前者又会带来城市管理与服务水平下降或农民被迫“上楼”等问题。《意见》指出,要“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出资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服务。”

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能够借助商业、金融业工业化的力量与管道,将农村和农业领域的空间与生产要素,平稳释放和转化为与城镇相容的元素,并能够使这些空间与要素均衡有序地融入城镇。

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如果囿于三农本身,就难以提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推进方案。而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四化联动的整体思路,扩大了政策实施与推进的战略自由度,这让我们对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充满期待。■



禽流感再来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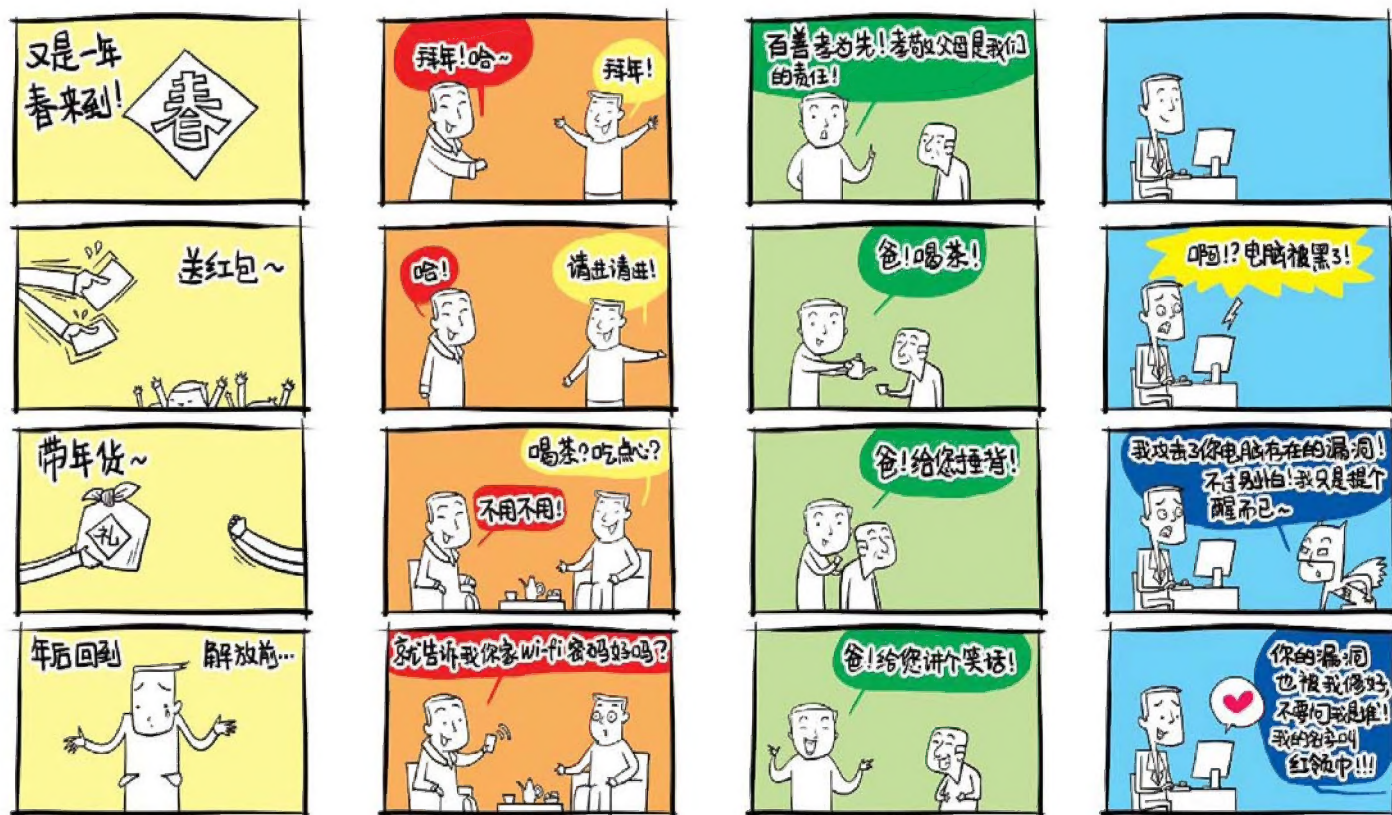
2014年伊始，H7N9禽流感再度来袭，我国多个省份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报告。截至1月27日，浙江共确诊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49例，死亡12例，广东确诊患者32人，其中4例死亡，另外上海也有4例死亡病例。1月26日卫计委指出，禽流感病毒或通过接触病毒污染的环境传播至人，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续的人传人。

@宁波笨鸟： 看着公公含泪的眼睛，真是心酸。今年养鸡真是坎坷，先是禽流感，再是高温，后是大水，眼看春节可以卖鸡了，这下又是禽流感。欠下的饲料费也交不出，辛苦一年，还得亏好几万，真是太心酸了。我只能帮忙吆喝吆喝卖，每只80元，五到七斤，并负责杀好，保证健康美味。

@嘉善老顾： 禽流感来势汹汹，鸡鸭养殖业又遭灭顶之灾。早上去谈公路农贸市场兜了一圈，家禽交易区虽然尚未关闭，但已经少人问津。回来时，小区物业正在排查有没有人家还养着“过年鸡”，一经发现，上门通知业主“斩立决”。

@胡冰蜀黍： 前天，杭州网友@谭年年乘地铁时发现车上有个麻袋在动，突然一只鸡头从麻袋一角探了出来——“活的！”网友们表示：无论有没有禽流感，只要是活禽都不应该带进地铁啊！

杭州农贸市场摊主： 现在的顾客都是“谈鸡色变”，我们的生意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现在一天冰冻鸡就卖个20多斤，销量连过去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春节账单

中国传统春节是人们走亲访友的“黄金时间”，而在网上晒春节“账单”的热度也渐渐升温。一条关于“80后春节回家要带多少钱才够”的帖子点击率超过30万，回复中大量年轻人晒出的春节账单让他们叫苦不迭。在具体项目上，孝敬长辈、给晚辈红包、礼品花费等“人情账单”占春节支出的比重较大。

WiFi待客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过年串门有了新的节目单，除了多少年的保留节目：边看电视边吃瓜子、边吃瓜子边聊天外，手机元素也已登堂入室。春节串门拜年问候语除了“新年好”，还有“你家有WiFi么？密码是什么？”有网友调侃称“WiFi待客”已成为过春节时的必备，过年接待客人最首要的不是零食多不多，而是家里有没有wifi。

精神赡养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赡养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老年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注重追求精神生活需要，而且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也规定了精神赡养的内容，因而目前出现不少精神赡养的诉讼案件。精神赡养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使其愉悦开心。

道德黑客

随着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和黑客泛滥后，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新职业，他们专门模拟黑客攻击，帮助客户了解自己网络的弱点，并为客户提出改进建议，找到应对的方法，维护互联网安全，他们就是道德黑客。

新闻下周看

2014

2

1

2

3

4

5

6

7

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月7日至23日在俄罗斯索契举行，预计有来自85个国家的6000多名运动员参与角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将出席开幕式。



李娜经纪人：

回应“商业价值超3亿元”

澳网开始前，便有澳洲媒体给中国网球明星李娜算了一笔账，说李娜的商业价值已经超过了悉尼歌剧院，夺冠后，李娜的价值更会成倍地往上翻，有3亿元之多。对于3亿元商业价值的说法，李娜的经纪人麦克斯表示：“我们未来只会再接一到两个赞助。我现在首要考虑的，是寻求为李娜建立起与房地产企业的合作，这样能够帮助她在退役后开办网球学校铺平道路。”

专家：

无证据表明橄榄油可防癌抗衰老

和其他植物油相比，橄榄油显得相对“高档”，也日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健康饮食追求。除了被视为最健康食用油外，一些文章更宣传橄榄油具有抗衰老、降血脂、防癌、防辐射等功效。对此，一些专家给出了建议。大连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王兴国表示，虽然有调查结果表明以橄榄油为主要食用油的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心血管系统疾病和癌症发病率较低，但这还不足以得出橄榄油抗癌的结论。西班牙脂肪研究所研究员、橄榄油营养学专家温瑟斯劳·莫雷达也说，橄榄油中包含的抗氧化剂等成分有助于帮助修复小的皮肤创口和防止皮肤过敏，但没有充分的研究证明可以预防衰老和抗癌。

周恩来警卫：

网传“邓颖超日记”系伪造

2014年2月4日是邓颖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日前，周恩来邓颖超秘书、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赵伟，周恩来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廖心文，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李爱华等4位嘉宾做客人民网党史频道演播室，共同纪念缅怀邓颖超。针对网上流传的“邓颖超日记”，高振普强调，所谓的“邓颖超日记”是假的，纯属伪造。高振普说，邓颖超和周恩来都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过去长期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不允许他们把事情都记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延续了这样的习惯，不记日记。邓颖超不仅不记日记，也不记大事记。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时都没发现日记。

广州花都：

“老虎被当街开膛破肚论斤卖”纯属谣言

近日，几张“老虎被当街开膛破肚”的照片在网络广泛流传，并称“据说此事发生在广州花都”。1月21日，广州市花都区委宣传部证实，该消息纯属谣言，这几张图片此前已在多处出现，事发地点也多次变更。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否认高考音乐考试体育教师作考官

近日，有网络传言称今年广东普通高考音乐术科统一考试有体育教师作考官。对此，广东省教育考试院1月27日回应表示，广东音乐术科统考所有考官一直以来都是从相关高校遴选，全部为音乐专业毕业并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业教师，没有一个是非音乐教师，更不可能是体育教师，考生不要相信谣言。

武汉市应急办：

否认即将汽车限购

近期，武汉再度出现“即将实行汽车限购政策”传闻。对此，武汉市应急办通过官方微博予以否认，“最近有传言即将实行车限购，据了解，目前我市并未研究限购或与此相关问题”。此外，对于媒体传言的“2016年达到230万辆时有可能限购”的说法，应急办解释称，“230万辆只是理论车辆容量推测，并非实行限购的充分条件，”并表示“我市实施道交办法规定，限购须经听证程序。请大家不要轻信传言，盲目购车。”



普京：

驳斥索契冬奥会腐败传言

俄罗斯索契冬奥会2月7日开幕，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接受多家媒体的联合访问，当被问及索契冬奥会存在腐败问题时，普京表示自己“还没有发现严重腐败例证，但存在施工量被高估问题。”普京称部分承包商用低价赢得招标，却在其后抬高了价格。然而普京强调，目前并未发现存在任何重大腐败案件，并欢迎掌握证据的人士能提供相关证明。此前，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吉安·弗朗科·卡斯帕称，索契冬奥会在筹备过程中超过1/3的筹备资金涉嫌被贪污。俄前副总理和反对党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估计，涉腐金额高达300亿美元。对此普京反驳道，卡斯帕的评论是断章取义，没有证据能证明存在腐败。



1 | 山西平遥：

永久禁售禁燃烟花爆竹

山西省平遥县政府1月26日发布通告称，为了确保平遥古城的绝对安全，从即日起，该县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永久禁止在古城保护范围内使用电热扇，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禁止销售、放飞孔明灯。

2 | 最高法：

无罪被羁押困难群众可获国家赔偿法律援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近日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国家赔偿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对无罪被羁押的公民申请国家赔偿，经人民法院确认其无经济来源的，可以认定赔偿请求人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对申请事项具有法定紧急或者特殊情况的，可以先行给予法律援助，事后补办有关手续。

3 | 江西：

国企员工创业可停薪留职三年

日前，江西省印发《关于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意见》，其中规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停职领办创办企业后，若3年内不再领办创办企业的允许回原

单位工作；若3年期满，愿意继续领办创办企业的，则按辞职规定，依据劳动合同法进行经济补偿。经单位批准辞职的职工，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4 | 美国军方：

放宽着装限制 准许军人蓄胡子戴头巾

美国国防部1月22日宣布放宽军人着装限制，准许军人基于宗教理由穿戴头巾、留胡子及刺青等。包括穆斯林、锡克、犹太及威卡教徒等，在衣着与装扮上，必须奉行特殊戒律的教徒，现在都可以请求例外处理。美国国防部将按个案处理，如果会妨碍到任务执行或是军纪，军方有权否决。

5 | 俄罗斯：

官员或将实行每隔5年晋升一次职务

俄罗斯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萨维利耶夫日前对《国家公务员》联邦法案提出了修改建议，按照修改意见，公务员的职务晋升可参照如今军人的职务晋升办法，即每隔5年晋升一次职务，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依照在职官员的工作调动变化去规划其职务晋升。





中国新智库

【编者按】

2014年1月2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中文版发布。

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库6826家。目前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1828家），中国超过英国、印度、德国，以426家的总量居世界第二。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各界评价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一是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应发挥更大作用；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四是要求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五是要求加强智库自身建设，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这无疑会激发中国智库建设的热忱，同时，也引发舆论对中国智库现状的审视及中国智库未来的思索。

对于这一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有较为精到的总结。这一报告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报告说，近十年来，中国新增了多家智库，但中国智库发展仍处于成长阶段，且各级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智库的行政依赖色彩还十分浓厚，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按照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的分析，应从“智库”、“中国特色”、“新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基本特征和内涵。

“智库”，是制造和提供智力产品或思想产品的机构；

“中国特色智库”最根本的，要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人民福祉为本、国家利益至上；

“新型”，就是智库的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制度规范有别于外国智库，也有别于中国传统智库和现有体制内智库，应该是创新型、开放式、现代化的办会理念和治理模式。

抽丝剥茧新智库

在中国智库的自我评价中，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无疑是评价其影响力的最佳指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焱 | 北京报道

不同于一些学者对于智库研究独立性的强调，易鹏从不掩饰自己的“幕僚”情结。在他看来，智库需要的是师爷，而不是教授。

“智库是拿方案，做幕僚。不像高校搞理论研究，盘古智库有一个要求，就是经世致用。我们的研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下的国情，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春天。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媒体评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2013年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智库产业，建设思想市场，必将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贡献积极的力量。

这一批示催生了中国智库的迸发，2013年甚至被人称为中国的智库年。

体制内外

易鹏说，“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智库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

政府主导的研究机构，关键是体制机制不够灵活，因此受到诸多制约。”

在2013年4月之前，易鹏的身份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在体制内建设新型的专业智库，需要在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统筹协调外部力量的机制上做出创新。

身为“体制内”的研究者，易鹏对成立民间智库的渴望由来已久。“之所以在2013年启动，跟大环境有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十八大提出来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

易鹏认为，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无疑是要破除体制的约束。因此，2013年4月，他褪去了官方身份，来到国际金融论坛担任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是一家非营利、非官方国际组织，由中国、美国、欧盟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球金融机构和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国际金融论坛主席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加入其后不久，易鹏发起创办了盘古智库。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目前似乎还没有认识一致的统一标准。我们的看法是，所谓‘特色’，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不是政府举办的、不受财政供养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员工聘任不受人事部门调控的、



干部不是由组织部门任免的、研究选题不是政府下达而是独立自主选择的，等等。所谓‘新’，就是出现晚、发展历史短。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视野下看，所谓的特色新型智库，就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且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办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就是中国现代智库的中间形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副院长苗树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中改院始建于1991年11月，一般被视为中国智库改革的先驱者。

苗树彬说，中改院成立后，走出了改革的三步：第一步，1991年建院之初，向海南省政府提出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人编制只要30人的“皇粮”；第二步，1992年建院不到一年后，又主动向省政府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请求，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求生存，自我发展；第三步，1993年向原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提出由事业机构彻底转变为非盈利性企业法人，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研究机构的新路子。



2013年12月17日，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主办的2013中欧人文智库峰会“国际大都市的多元构建”在北京举行

中政院对自身改革探索的定位是“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谋生存、自求发展”。

“单向门”

从易鹏参与的两家民间智库的共同点不难看出：尽管在组织性质上是纯粹的非官方组织，但是其核心成员的官方背景也很突出。

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来看，这一特点尤其明显。

被媒体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国际金融论坛一样，由一位前副国级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其4位顾问均为现任或原任副国级领导，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原国务委员唐家璇、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

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实际上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也不吃“财政饭”。2013年，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也反复强调其民间智库的身份，并说中心的终极目标就是建成中国民间智库的旗舰。

另一个拥有重大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同样因汇聚了大量官方学者和官员而令人瞩目。其学术委员会成员除了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林毅夫、樊纲等人外，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

美国智库因“旋转门”机制而为人熟知。

“旋转门”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官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每隔4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作者王莉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相比“旋转门”，中国目前的这些智库，更像是一扇“单向门”。

明确不要境外资金

盘古智库最初打算以NGO形式注册，但最终还是以公司形式成立，但明确了非营利性的特点，即成员不分红。

“智库是思想库的民间称法，我国管理部门也没有使用这个名称。”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如果不考虑官方的研究机构，从归口管理上，智库属于民间组织。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分三类登记注册，分别是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但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需要寻找挂靠单位，这成为许多机构注册的障碍，因此，大量是以公司形式进行工商登记的。

“纯粹的民间智库比较多的是以工商登记形式存在，或者干脆没有登记。”贾西津说，“他们的资金来源大多数靠项目，有基金会、有政府的项目。北京有个城市发展研究院，是个民间组织，但是与政府部门关系很密切，

政府部门会委托他们做规划。这跟创办人的思路，对组织的定位、研究方法和理念相关，他认为要和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才能发挥研究院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民间组织和政府取得合作的并不多，因为政府购买较少，很难占到他们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民间智库更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靠委托项目，比如企业咨询，所以很多所谓智库，实际上是个咨询公司。一些组织也会有基金和国外基金，但完全依靠国外基金的也不多。思想库对外国资金还是比较敏感的，尽量减少对外国资金的使用。”贾西津说。

易鹏说，盘古“明确不要境外资金”。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捐助，多来自民营企业，还有课题经费。

一些智库也在创新收入来源。

2013年1月19日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是新近成立的一家智库。与高校传统的研究机构不同，其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重阳投资为研究院注资，采用基金运营的方式支持其运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告诉本刊记者，2013年基金盈利率在全国位居前列。因此，研究院的财务支撑非常充沛，且能长期持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通过邀请企业会员的方式保证了其获得稳定的财政资源，企业会员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埃森哲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这些资金来源主要是央企，民营企业极少。

内部材料和批示

在评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时，郑新立认为其必备的三要素即是号称“全球第一智库”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

其中，独立性是美国智库最核心的原则底线：所谓“独立性”体现在研究成果上，要努力做到基于事实来说明问题，不被政治所左右，超越政党之争。

但是，易鹏说，盘古“不过分强调独立性”，评价智库看的是影响力和思想水平，

关键是能不能提出经世致用的方案。

尽管在此观点上有所差异，但是，追求影响力是所有智库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利用自身资源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是所有组织智库的目的。

中国官方智库的研究成果可通过内部材料或送阅件影响决策，因此在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而个别有大量官员或退休官员的非官方智库，其影响力毫不逊色。

从影响渠道看，便不难得知为何媒体称中国经济交流中心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国经中心目前出版有4本内部刊物，其中每周两期的《要情》，针对的主要是相当级别的高级官员。郑新立说，国经中心把社会上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将其以政策建议的形式供决策者参考。“用曾培炎理事长的话说，《要情》所追求的就是‘临门一脚’效应。”

在中国智库的自我评价中，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无疑是智库影响力的最佳指标。这从智库对其珍视程度可见一斑。

《北京青年报》曾报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高校一贯被视为中国智库的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校本身上报内部材料只有教育部一条组织渠道，但是，不少高校学者有各自的资源，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例如，被称为国情专家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1999年创办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即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其递交内部材料的渠道为中科院。

人大重阳则通新华社等数个渠道，2013年共递送了内部材料14件。

通过舆论扩大影响

即便是民间色彩浓重的智库，也将上报内部材料等资源作为其核心影响渠道，更将其作为自身优势广为宣传。

易鹏常年关注地方产业、城镇化等问题，对于自己是否有影响官方的私人渠道，他毫不避讳。

北京一家致力于为产业研究及地方政府咨询的民间智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

们在寻求课题时，亦会主动将其拥有的内部渠道作为主要竞争力展示。

另一家非官方智库为《瞭望东方周刊》展示的2013年内部年终工作汇报中，亦将两位中央领导的批示作为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这些民间智库，大多依靠私人关系疏通影响渠道，进而产生影响力。

不过对于非官方智库来说，追求舆论影响是多数智库的选择。

在担任人大重阳执行副院长之前，王文曾担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这一经历，使他非常重视舆论影响力。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重阳与百度合作推出“六组数据看清两会经济”；6月，当“钱荒”问题突显时，人大重阳推出了“八成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未发生金融危机”的调查报告；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3小时，人大重阳就推出了关于全会的“十大解析”。

作为中央电视台等多个媒体的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易鹏对于营造舆论影响力极度重视。他说，盘古智库的20个学术委员会成员，每天大概会接受5~10个新闻采访。

中改院虽然能够将政策建议直接报中央有关部委、通过内部材料向高层反映，但他们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媒体扩大社会影响力，“进而影响决策”。

即便是前高官汇聚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同样重视媒体宣传。

郑新立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时特别强调，它除了对国家政策有影响力，对公众观点也有影响力。他注意到，布鲁金斯通过出版研究成果、召开面向公众的研讨会、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及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评论员文章等方式扩大影响力。因此，在谈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时说，除了注重加强与国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建立工作联系与学术交流，中心还通过举办重大活动展示中心研究成果，并通过各类媒体扩大宣传。

公共政策与商业课题

“中改院自主研究的课题比接受中央有关部委、省市委托的政策咨询课题略多一些。”苗树彬说。

尽管地处海南，但中改院始终把影响全国的重大公共政策研究放在首位。

例如，1995年中改院提出了“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建议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1998年，中改院再次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建议。

中改院将自己的研究总结为四类，一是围绕我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并快速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及时提出政策建议；三是围绕重大战略问题，把握趋势，进行储备性研究，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四是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指导，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在做好重大公共政策研究的同时，中改院也做咨询和培训等有偿服务。这些收入也是中改院日常行政经费的重要来源。

易鹏很看重研究是否接地气，因此，地方政府项目是盘古智库重要的研究内容。不过，他说，“智库不能只跟课题追热点。”

除了委托课题，盘古智库目前提出了20多个自主课题，都是“对国策有影响”的课题，例如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这类课题计划每年做4个左右。

“很多智库需要内部平衡，通过商业咨询来平衡组织结构解决生存，没有必要做纯粹的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这块不赚钱，考虑的是公共价值和社会效益。”贾西津说。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近日在《科技日报》专门撰文，分析中国智库在经费方面面临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智库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把机构性支持和课题性支持分开，中国智库应该有能力和条件来自主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而且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之所以强调分开机构性支持和课题性支持，是因为“课题性支持取代了机构性支持，所有研究人员的收入和薪酬水平完全寄托在课题的多少和大小上，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研究机构的行为”。



2013年6月29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

朱旭峰：中国智库没有模式

外国人对中国思想库的认识是偏颇的，他们粗浅地认为官方思想库都是政府喉舌，而民间智库则会对政府进行批判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焱 | 北京报道

“没必要整天盯着美国最著名的智库看。像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16年，至今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我们的智库都还很年轻。”朱旭峰说。

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朱旭峰是国内最早开始智库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2002年开始进行中国的智库研究。同时，从研究数据上，他可能也是资料占有最全面的学者。在2004年，他就调查了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1家智库的情况。

尽管目前中国智库看似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朱旭峰仍然反复说：“对于中国的非官方智库来说，首先是要活下来。”

“旋转门”不是中国智库必然选项

《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卸任的官员大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不少智库的

研究者同样会到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互相流通的“旋转门”，使美国智库拥有巨大的政策影响力和对研究人才的吸引力。我们是否也需要建立“旋转门”机制？

朱旭峰：国内很多研究智库的人提起外国智库便会说“旋转门”，但实际上，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机制，英国、德国、法国的智库都没有。

“旋转门”本身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但这一机制是由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美国是总统制国家。被选下台的总统包括政府高官立刻就没了工作。智库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人才储备场所，因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旋转门”。

政治制度不同，智库的特点也就不一样。比如英国，作为内阁制国家，他们的大选只选出下议院议员，不直接选举政府首脑。在大选中获得议会席位最多的政党党首直接出

任首相。被选下台的政党的政府官员可以马上作为“影子政府”继续工作，等待下一次选举上台。也就是说，英国下台的高官没必要去找智库暂时休养生息。因此，英国智库没有“旋转门”机制。可以看到，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多党选举制国家，智库也是不具备“旋转门”职能的，何况其他国家。

中国没有必要跟美国学，也非要搞一个“旋转门”不可。

以前，我们的官员退休以后，多数去人大、政协或民间团体。现在他们发现还可以去搞些研究，尤其是一些本身具备研究能力的官员，所以最近中国有些新成立的智库由退休官员领导。这可以认为是一种类似“旋转门”机制，但这是中国自己的制度创新，与美国智库“旋转门”不是一回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影响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最主要瓶颈是什么？

朱旭峰：很多人可能会说，中国民间智库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政府不重视。但我的调查研究证据表明，虽然民间智库在影响政府渠道方面相对官方智库来说存在先天劣势，但这不能说是政府歧视。和很多人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现在阻碍民间智库发展的主要瓶颈是无法吸引优秀、年轻的研究人才。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然民间智库就很难生产优质的知识产品。

中国对年轻研究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哪里？是高校，其次是国有的研究院所。民间智库缺少的东西很明显，比如说高校能解决户口，而民间智库没这个能力。在北京，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而且，在高校里面有职业发展预期，从讲师开始，到副教授、教授。

布鲁金斯学会也是这样，他们的研究员也分级，有一级一级的奋斗目标，而且研究员的社会地位是得到认可的，比如资深研究员如果愿意可以去高校任教授。

还有一点很重要，美国的智库是免税的。美国个人所得税非常高，在智库里工作收入可以免税，这一条就会提高智库对研究人员的吸引力。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这些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对于非官方智库来说，解决起来难度好像相当大。

朱旭峰：只要有自己的吸引力和资源，愿意为年轻人铺路，还是可以吸引到人才的。

比如“金融四十人论坛”，他们是非官方、非营利性的金融学术研究组织。他们有几十家理事单位（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信信托、中国平安等），在“金融四十人论坛”工作满一定年限的年轻人，做得好的话，可以被推荐到这些理事单位的研究部门担任职务。这就为吸引年轻学者创造了条件。

决策越复杂越需要智库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智库大都是经济类的，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朱旭峰：我2008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政府官员，大概意思是问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愿意听谁的，是听媒体的、公众

的还是专家的？

统计结果分析，这取决于政策本身的情况。如果政策问题不太需要专业知识的，决策者倾向于不听专家的。而且，很多时候决策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比如政府卖地或拆迁，可能更多的是要权衡不同的利益问题，

而不是专业计算的问题。但是，反过来，专业性越高越复杂的决策，需要专家和思想库的概率就越大，比如经济、金融问题，医药卫生体系改革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对于智库发展来说，政府的决策民主化程度很重要。

朱旭峰：不仅如此。在思想市场上的供需双方都需要提高能力，智库需要提高研究能力，政府也需要提升能力，主要是找准问题的能力。

独立性与倾向性

《瞭望东方周刊》：外界对于中国智库的划分大多用“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的形式，这两种智库的研究成果的独立性，与其本身的组织属性是否有相关性？

朱旭峰：外国人对中国思想库的认识是偏颇的。他们粗浅地认为官方思想库都是政府喉舌，而民间智库则会对政府进行批判。实际上，这些机构本身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官方智库有时候也会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一些公认的纯民间智库也承接大量政府研究课题，并以能得到政府课题委托为荣。

《瞭望东方周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官方智库的财务更有保障，有时反而更敢于发声。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官方和民间智库的研究结果和其组织性质的相关性和大众的印象正好相反呢？

朱旭峰：不是这样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中国智库没有模式，中国的情况是各显神通。不要给中国的智库贴标签。

《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几乎所有智库都将独立性作为一大标准，但很多智库似乎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比如一些民间智库给人的印象是多为弱势群体发声。

朱旭峰：“独立性”的概念相当复杂。独立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倾向性。

比如，为农民工说话就独立，为企业家说话就是不独立？农民工和企业家，都是利益集团。为利益集团代言其实没问题，研究结果有倾向性也没问题。

问题在哪儿？

独立性的关键，是看智库的观点和它们的经费是否存在相关性。没收钱也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这是倾向性。倾向性可能是学者自己的价值观和研究证据决定的，与智库的资金来源没关系。而因为收了钱才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这才是丧失独立性的问题了。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智库比较独立。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基金会比较多，他们不需要靠政府订单活着。特别是像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他们自己有基金，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能够独立。但实际上，美国的智库完全独立的并不多，很多都代表了党派和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欧洲，智库的独立性比美国差得多。比如，在英国，除那些依附主要政党的大智库以外，独立智库被政府认为总是指出政府缺点的刺儿头，因此它们得不到政府的太多支持而发展缓慢。在德国，智库主要分为接受政府课题的研究所和不同政党组建的研究型基金会。在法国，最早的智库就是法国国防部仿照美国兰德公司的模式组建的，而法国非官方的独立智库也主要靠政府的研究订单生存。在日本，政府多采用政府委托研究的形式采纳智库意见，而日本企业财团也组建了许多智库。

在中国，许多半官方智库，由于也能经常接受民间基金会甚至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大多能够做到项目运作“独立化”。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中国智库的大部分财政经费来自于政府，它们才得以与大部分产业利益保持着一定距离。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只要能够有充分的利益博弈和政策辩论，为利益集团说话对于智库来说并不是个问题？

朱旭峰：关键在于，智库的资金来源一定要公开。公众一方面可以直接查看智库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查看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公开的观点。这样能看出他们的研究结



朱旭峰

果和资金有没有关联，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他们的研究是不是有独立性。

智库政策咨询不应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畴

《瞭望东方周刊》：在2013年7月底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立即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中国的新型智库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味：由政府购买服务？

朱旭峰：对智库来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是什么好事。智库应该有稳定的经费支持，而不能靠一笔一笔订单活。

为了维持生计，一些智库把主要精力用在“拉项目”上，很容易造成智库专家为了保持与项目资助机构的良好关系，看他们脸色行事的局面。所以，政府、基金会、企业如果要支持智库，应该采用捐助的形式——不是以资助研究课题的方式。

捐助和资助的区别在于，捐助的对象是机构，资助的对象是研究项目。研究项目资助更容易与某些利益集团扯上关系。

而且，如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需要招标。招标的时候可能要更多考虑投标人的报价是多少，这会影响招标结果。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招标可以避免研

究重复的问题。不然，把一个课题给了好多人做是不是浪费？但是，政策就是需要辩论。委托多个课题组开展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形成不同政策观点和方案的交锋和竞争。只有经过充分的辩论，才能形成科学的决策。将成本投入到前期的政策辩论，比决策失误后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

但是，如果是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话，就必须符合政府采购的规则，就很难同时“采购”多个课题组开展平行研究。所以，政府购买服务最好不要把智库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纳入进来，除非对采购公共决策咨询服务有专门规定。✎

国际问题智库盘点

在排名前100的智库中，中国占据6家，其中4家都是国际问题研究智库

文 | 姚亿博、芦垚



2013年6月9日，卡塔尔多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塔尔共同主办的2013美国—伊斯兰世界论坛拉开帷幕

根据《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在排名前100的智库中，中国占据6家，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4家都是国际问题研究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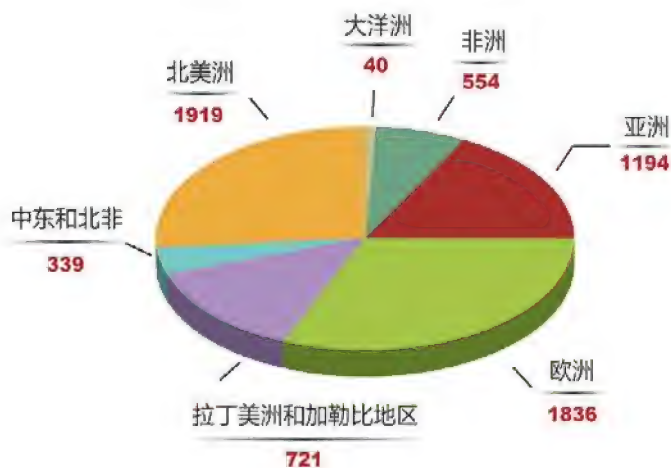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中，也有不少都将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例如，布鲁金斯不仅致力于外交事务的研究，而且尤其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成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其宗旨便是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该基金会旗下的《外交政策》杂志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样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外交关系协会，其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其政策影响力可见一斑。

相较美国智库，中国国际问题智库仍然差距明显，但在国内智库的对比中，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全球智库机构的洲别和地区分布饼状图

数据来源：《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



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队”

涉外部委都会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建立起智库。比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有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外交部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新华社有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由于挂靠部委，直接为相关部门乃至中央的外交决策服务，因而被外界视作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中的“国家队”。

“国家队”的负责人都是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同时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和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的于洪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曲星等，都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

成立于1980年的“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被外界誉为“中国的兰德公司”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第一智库”。

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亦伴随改革开放而风生水起。院长季志业是研究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问题的专家；副院长袁鹏是活跃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我国官方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中，中国社科院的西亚非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都进入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的国际顶级智库及相关分类的前五十名。

直属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身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6年。而2010年新近成立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由于其直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因而在政策研

究和政党外交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在各自擅长的军事问题、经济问题领域具有难以替代的发言权。

关于传统智库的新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桅说：“传统的智库在转型，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在外交智库的工作上非常活跃，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评论国际热点问题，举办各种国际会议，同西方智库合作，等等。与以前的模式不一样，他们非常积极主动为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做及时前瞻性的研究”。

除了为国家战略层面做研究的官方智库，近些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开展，中石油这样的能源企业也建立了与自己相关的国际能源问题研究机构，目前这一趋势有不断扩展的势头。

高校智库中的明星学者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相关高校，需要在完成培养国际问题研究和实践人才的同时，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被视作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高校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三驾马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具有传统的优势。

建国后早期的分工是，人大负责苏联和东欧；北大负责亚非拉国家，即第三世界；复旦则负责以美国为重点的西方国家。由于

有着早期深厚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底子，这三所学校在中国高校智库中至今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经常在媒体出现的各高校学者——北大的王缉思、王逸舟、朱峰，人大的时殷弘、金灿荣、王义桅；复旦的沈丁立、苏长和等人，就可见一斑。

除了上述传统的三所高校之外，以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新兴的国际问题研究高校，也表现出了迅猛的势头。

“准民间”智库和地方智库

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民间或者由于多少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准民间”智库曾经比较低调和边缘，但伴随着相关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推动，以察哈尔学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南海研究院为代表的民间智库，近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成立于2009年10月的察哈尔学会，是一家专注于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非官方、无党派、独立智库，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其创会主席韩方明，是具有国际问题专业背景的企业家，兼任包括TCL、中水电、国航、中船等大企业的董事职务。

“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年会”“中国国家形象报告”“察哈尔圆桌”“峨山北京论坛”“公共外交季刊”这样的会议和期刊，已经发展成国际问题学界的品牌活动。其研究团队包括了知名学者王义桅、赵可金、余万里、庞中英、贾庆国等人。在公共外交、中韩关系等领域，察哈尔学会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全国性研究战略问题的民间学术团体，前身为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成立于1979年10月。从其第一任会长，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军人外交家伍修权的身份可以看出该学会的军事研究色彩。被外界视作中国鹰派代表人物的罗援，也是该学会的高级顾问之一。

地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尤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南海研究院最为知名。

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政府所属智库排名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名列第20位，甚至超过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灰城”石家庄

在石家庄市环保局官方网站的民调页面上，近80%的受调查市民在“对自己的居住地环境质量满意程度”一问题上选了“较差”选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石家庄报道

2014年1月17日，石家庄。据河北环保部门数据显示，石家庄当天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

石家庄市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此定下更具体的目标——“力争年内在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退出后五名，确保 PM2.5 浓度下降 6%，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

“我十多年前到石家庄来上中学的时候，还能看见星星，后来就慢慢看不到了。”石家庄的出租车司机杜荣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霾一直就有，就像现在这样，但去年冬天尤其厉害，和雾一起来的时候，车都不敢开。”

在一个“路灯都看不见”的夜晚，杜荣才开着出租车送人往西走了三四十公里。上了太行山之后，顿时豁然开朗——又能看见满天的星星了。

从北京西站坐火车往石家庄走，未到保定，“白内障”的感觉就开始明显。这一线的华北平原基本见不到蓝天。农田、原野，都笼罩在一片灰白里。

从环保部大气质量在线监控的地图上，石家庄市并不算是一个孤立的空气污染重灾区。从北边的保定、定州一直到南边的邢台、邯郸，均是大气污染指数经常集体“爆表”的地方。

本刊记者查阅国家环保部发布的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信息后发现，2013 年，石家庄一直稳居全国空气质量较差城市的“前三甲”，其中不少月份还“高中状元”。

在石家庄市环保局官方网站的民调页面上，近 80% 的受调查市民在“对自己的居住地环境质量满意程度”一问题上选了“较差”选项。其余三个可选项分别是“满意”、“还行”和“一般”。

因为地理环境和静风气候，也因为越来越密集的高楼和林立的塔吊，再加上日渐拥堵的交通状况等，让石家庄这座省会城市渐渐成为一座密不透风的“灰城”：房顶上、窗玻璃上、绿化带上都落满了灰，街边小商店的商品，拿下架来的话，得用纸或毛巾擦一擦。

城市的顽疾

石家庄的污染问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不仅是大气污染，河流与地下水污染问题也十分严峻。只是因为“霾”这个关键字成为席卷中国大陆的焦点，所以在民间的论坛上、代表的议案上以及领导的军令状上，石家庄的空气问题异常“高调”地成为“重中之重”。

2013 年，石家庄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的两会议案提案里，涉及环境问题的有 120 多件，是往年的 4 倍左右。其中，大约三分之一都跟雾霾有关。

石家庄市环保局的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句实在话，石家庄大气污染治理这十来年，力度一年比一年大。十年前，石家庄的优良天数才二百六七十天，当时是 67 个全国省会和重点城市的倒数第一。”

据这名官员回忆，那个时候政府就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的姿态来治理。到 2012 年，优良天数达到 322 天，成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两年突然雾霾这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搞源解析，不仅搞颗粒物的源解析，也做 VOCs（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源解析，搞清楚污染物的构成”。

他告诉本刊记者，石家庄的空气遭遇 2013 年的“滑铁卢”并不是偶然。这跟环保部提高了空气指标限制标准和增加了 PM2.5 和氮氧化物等监测项目有关。也就是说，以前的空气也并不是有多好，不同的是，以前“味儿大，PM10 多”，现在是“霾多”。

“你要说没治理，也不对，咱们每年都花好多钱，你要说布局不合理，也一直在调，污染企业从市区搬出去，从上风向侧风向往下风向搬，也都在折腾这些事，但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河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沈洪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她向本刊记者介绍，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原本这是一个小村庄，因为京广线而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人帮忙规划的时候。城市主要还在京广线西侧，一些工业企业都集中布局在东北角，离市区较远。“那时候的规划是比较合理的。”

但随着人口增加、城市扩张，石家庄也开始像北京一样“摊大饼”。西边有矿产资源，于是发展起了水泥等相关产业，上游水源地附近也建起了工厂。南边建起了工业园，东边兴建了化工区，北边则是传统的工业区。

整个石家庄，逐渐被密集的工业包围。

作为一个工业城市，钢铁厂、焦化厂、制药厂、炼油厂等排放“大户”长期支撑着石家庄经济的增长。从《石家庄年鉴》上可知，近十余年来，石家庄的工业产值一直保持着每年 10% 以上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从 2003 年的 1319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4500 亿元，工业始终占据半壁江山。

难控制的排放

虽然每年都在关停“五小”企业、整顿治理污染企业，但是企业和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却依然在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城市的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多，从 2003 年的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 1 辆家用汽车，增加到 2012 年的每百户 19 辆。

大约从 2000 年开始，石家庄的空气污染类型，就已经从“煤烟型”向包含尾气、扬尘等等污染



▲ 藁城市金鑫焦化厂，正在排放大量浓烟

物综合作用的“复合型”转变了。

尽管有“三令五申”的措施，“壮士断腕”的决心，但本刊记者在石家庄市及各区县走访时，依然看到一些企业的烟囱里冒出滚滚黑烟，闻到空气里飘散的浓浓异味。企业多，污染物的种类多，有的还会在空气中反应形成二次污染物，所以实际上，同样的 AQI 指数或许意味着成分完全不一样的污染物，也意味着对人体可能大不相同的影响。

比如，在藁城市的金鑫焦化厂，几个高低不同的烟囱断断续续地排放着至少是未经除尘袋处理的烟尘。而附近的一些小冶炼厂，给村庄的房顶和庭院铺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灰，在阳光下泛着光。

2014 年年初，当本刊记者走进部分遭受乱排放危害的村庄采访时，旋即被收到“风声”的企业相关人员“拦截”，并告知，“我们都花了很多钱治理，现在没有污染了”，还信誓旦旦称，“环保部的也都来检查过了”。

一位曾经在某煤电厂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一些排放“大户”，现在环保局都要求上脱硫除尘装置，以及便于管理的在

线监控装置。但实际上企业的可操作空间很大。因为运行环保装置需要耗费石灰石等原料，耗费水电，也就是说要多花钱，所以很多企业都会“做手脚”，甚至半夜的时候偷排偷放。而有的企业，原本就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很小，为了生存，不得不偷排偷放。对这些企业来说，被抓到了无非是罚款，但是不偷排偷放的话，则意味着企业要死……“根源上，也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在市区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药厂周边，本刊记者都闻到了令人不适的恶臭。中石化石家庄炼化公司的炼油厂厂区内，时而飘来的一些有机物的味道甚至掩盖了炼油厂的气味。炼油厂的职工告诉本刊记者，曾经因为其他企业长期半夜偷排，忍无可忍的炼油厂职工家属在老厂长的带领下集体去石家庄市环保局投诉……

监管的误区

“我们现在的管理可以说是走进误区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宋国君认为，对固定污染源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源没有



▲ 2013年2月28日，石家庄大风和沙尘来袭，给市民生活和出行带来许多不便。

🔴 石家庄的空气遭遇2013年的“滑铁卢”并不偶然。这跟环保部提高了空气指标限制标准和增加了PM2.5和氮氧化物等监测项目有关。也就是说，以前的空气也并不是有多好，不同的是，以前“味儿大，PM10多”，现在是“霾多”。

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连续达标排放。“而我们的监管，还在强调‘总量控制’，这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大气的污染是以浓度计，排放是不是达标也应该用浓度计，所以用年度的排放总量来限制没有意义。”

“我们现有的许可证相当于是一个注册证。就跟结婚证一样，注册了就行。但是排污是365天，连续在排，不是注册了就行。这个证是要有更详细的要求。就是让企业提供自己持续达标排放的证据。”宋国君说。

宋国君所介绍的，是在美国等国家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

对于移动污染源也是一样。宋国君说：“油已经最干净了，车已经最清洁了，假如污染还是很重的话，再来说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提倡大家少开车等，这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污染源都还没有控制好，就在说让大家少开车，这就是本末倒置。”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石家庄市区的车用汽油开始全面实施国IV标准。按照官方宣布的说法，这将“大大改善”机动车尾气的排放。

而实际上，标准高低暂且不论，石家庄乃至河北省的油品市场异常混乱。根据环保部2013年下半年的一次抽查，油品市场的情况可以用“很差”来形容。这些“问题油”不仅损害汽车，更是往空气里贡献了大量有毒有害的物质。

全河北省大概有8000多座加油站，其中中石化约占1800多座，中石油1100多座，剩下的除了少量的中化、中海油等公司之外，民营企业加油站的数量占了约一半。

2014年1月，本刊记者在石家庄随机采访数十位加油站工作人员和司机。他们告诉本刊记者，从油品质量上来说，中石化的最好，因为华北平原是中石化的“势力范围”，中石油也从中石化采购一些油。民营企业的加油站大部分也号称是从中石化进的油，但是价格上差异相当大。

比如说，2014年1月中旬，中石化加油站的93号汽油每升价格是7.64元，大量民营企业加油站价格竟低至7.41元甚至7.31元。

“我们就是从中石化拉的油，拉来什么卖什么，他就是加水也没人管。”离炼油厂不远的的一个简陋的加油站里，老板一边给客人加着廉价的汽油，一面笑着对本刊记者说。

但据本刊记者查证，同一时间，中石化石家庄炼化公司炼油厂的93号成品汽油的出厂价是7.5元每升。也就是说，即便是中石化自己的销售系统，在这一地区也不可能以低于7.5元的单价卖。

“那些民营加油站如果以这样的价格卖，就不可能是我们的油。”中石化石家庄炼化公司的一位副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或者不全是我们的油。或许是掺合了大量的从山东地炼拉过来的油，那质量就不好说了。”

另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加油站是特许行业，一般人轻易拿不到经营权，所以监管上也很有难度。

被忽视的移动污染源

即便是被大众公认“最好”的中石化的油，在环保部的抽查中也发现了“明显违规”的问题。包括中石化、中石油在内的央企加油站，不仅在石家庄市没有标注地卖着普通柴油，在高速公路上也卖着普通柴油。而根据国家规定，普通柴油适用于拖拉机、内燃机车、工程机械、船舶、发电机等，车用柴油应用于压燃式柴油发动机汽车。

相比较车用柴油而言，普通柴油的污染更重，尤其是致癌物多环芳烃的含量，没有限值。

根据此前中石化总部专家对本刊记者就“柴油双轨制”作出的解释：正是因为履行环保减排的义务，所以才把柴油“分两步走”，先是提高在市区、人群密集区域、公路上跑的汽车要用的车用柴油标准，下一步再将“田间地头”等环境容

量相对大的地方使用的普通柴油质量提起来。

而加油站，按照规定，必须按标准所卖的柴油究竟是车用柴油还是普通柴油？“要求要标注，他没有标注，这就是违规的。规定要加车用柴油的车，卖普通柴油给别人，这也是违规的。”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主任汤大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然而，不仅是石家庄，整个河北省，这个问题都仿佛被政府以及销售商一起“忽略”掉了。所有的治理重点都放在了最末端“黄标车”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中石化河北分公司获知，目前河北销售的柴油里面，绝大多数是普通柴油。而石家庄炼油厂生产的柴油，目前都是普通柴油。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生产车柴，而是因为：第一，生产车用柴油的成本更高；第二，到目前为止物价局并没有给出两套价格，就算是生产了车用柴油，到市场上也只能按照普通柴油价格卖，没有价格优势。

石家庄一些加油站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曾经卖过一段时间车柴，但是“细粮不经烧”，所以又换回来了。“其实都一样，说白了，无非就是车柴对环保好一些而已。”一位加油站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说，“所以你真要卖车柴，就算比普柴贵一毛钱，也没人买。”

据美国加州环保局统计，加州 2% 的重型车辆排放了 30% 的氮氧化物和 65% 的颗粒物，因此得到的结论是加强重型车辆排放控制非常必要。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于 1998 年 8 月宣布柴油排放的煤烟为有毒空气污染物。加州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于 1999 年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导致当地居民患肺癌的风险要素中，70% 是由洛杉矶地区空气中漂浮的细微柴油煤烟颗粒物贡献的。

根据石家庄官方的统计，2012 年，石家庄市的柴油消耗总量是 67 万多吨。这些油往大气中究竟排放了多少有毒有害物质，造成了多少雾霾，到现在还难以统计。

2014年目标：空气质量力争退出全国后五名

治理污染改善空气的政府号角再度响起。2014 年 1 月 7 日，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通报，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保护部与全国 31 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各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这份目标责任书里，河北省确定的 PM2.5 年均浓度下降目标是 25%。

《石家庄日报》2014 年 1 月 24 日的报道称，“顶着巨大压力，河北立下‘军令状’：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必须执行。”立下这份环保军令状的，是河北省省长张庆伟。

在 1 月 15 日召开的石家庄市两会上，石家庄市政府首次就大气污染防治情况提交了专门报告。这份名叫《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情况的报告》宣称的措施包括：启动三环内所有排污企业搬迁工作；沿街增设播放空气污染数据电子显示屏；建设生态区着力构筑绿色屏障等。

河北省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就该市的“治霾”强调，“真刀真枪干一场，尽快扭转省会大气质量在全国排名落后的局面。”

石家庄市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此定下更具体的目标——“力争年内在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退出后五名，确保 PM2.5 浓度下降 6%，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

2013 年空气质量较差的前 10 位城市

12月	邢台、石家庄、邯郸、保定、衡水、西安、唐山、淮安、南京、武汉
11月	石家庄、保定、邢台、唐山、邯郸、济南、太原、廊坊、乌鲁木齐、衡水
10月	石家庄、邢台、保定、邯郸、唐山、济南、哈尔滨、衡水、西安、武汉
9月	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济南、衡水、保定、廊坊、天津、西安
8月	邢台、唐山、石家庄、济南、邯郸、天津、衡水、西安、保定、廊坊
7月	唐山、邯郸、石家庄、济南、邢台、天津、保定、兰州、郑州、衡水
6月	唐山、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衡水、济南、天津、郑州、太原
5月	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济南、保定、郑州、北京、衡水、天津
第一季度	石家庄、邢台、保定、邯郸、唐山、济南、西安、衡水、廊坊、乌鲁木齐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部)



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质就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融合与运用为代表，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

文 | 周洪宇 徐莉

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以保罗·麦基里（《经济学人》编辑）为代表，一种以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

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2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专题文章。该刊著名编辑保罗·麦基里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革命，标志是3D打印技术，关注点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并对工业革命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现在正在兴起，以“3D打印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或者说是以数字化制造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具体地说，18世纪末在英国发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了手工；20世纪初福特发明完善的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其核心是“制造业数字化”。

所谓制造业数字化，是网络信息革命和材料技术革命的结合。网络的发展，使信息传递的费用近乎于零；3D打印机就是未来制造业数字化的典型代表。3D打印机是一种智能制造机械，它利用分层加工，叠加成形，逐层增加材料，最后生成产品，如零件、汽车或一幢房子。

著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撰写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即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这个划分的视角，是以科技发展带来的能源的变化为标志的。

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两条：一是认为石油人均产量已达到了峰值，全球石油产量峰值将会来临，原油价格飞涨不可避免，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现尾声；二是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熵账单即将到期，近200年来石化原料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向地球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阻止了太阳的热量从地球上空散去，导致地球温度灾难性的转变，继而会对未来生命造成毁灭性打击。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难以为继，因此，新的工业革命势必日渐兴起，使人类走向后碳时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而且迫在眉睫。他认为改变未来社会有两样东西：一是能源，如同人的血液；二是互联网技术，如同人的中枢系统。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可再生能源体系与互联网技术有机融合的产物，或者说能源互联网将是未来社会新经济系统的发展基石。

所谓能源互联网，就是在现有能源供给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新能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大量分布式能量采集装置和分布式能量储存装置互联起来，通过智能化的管理，实现能量和信息双向流动的能源对等交换和共享网络。

除了以上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外，还有《创客：新工业革命》作者克里斯·安德森的强调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统一的观点，他认为，互联网及最新的制造业技术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一些聪明人通过网络互动，再加上一个新概念，就能改变世界。未来属于基于虚拟法则的互联网公司，也属于扎根于实体世界的企业。

“创客”之所以能被认为将掀起一次“新工业革命”，主要缘于以下两大要素。首先，当代创客因得到了一系列新颖机器设备的支持而变得异常强大。比如他们可以通过3D打印机造出真切可用的实物，也可以依靠激光切割机、数控刨槽机、数控铣床等将一些既定物体（比如金属块）切割、雕镂成无比精致的形状。其次，以创客社区为依托建成的各类DIY群体或商业组织在“硬件开源”思想的指导下无偿向公众提供着设计灵感，从而将个体爱好者的星星之火汇成了燎原之势。

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实际都提出一个共同论点：经济困难时期，往往也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而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为经济发展开辟出新的领域。从这些不同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大致认可的一般性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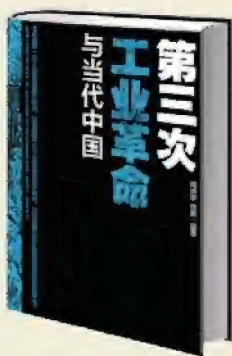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质就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融合与运用为代表，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如何出现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世界重提“再工业化”问题。一个声音逐渐响亮——“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在这种背景下，工业化问题再次成为世界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与此同时，大自然不断发出警示：人类不能再沿袭传统的攫取和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沿袭历史上少数国家以集聚世界多数资源为手段的发展模式。人类需要寻求更加集约、更可持续、更符合自然和社会伦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个根本出路是，以新一轮技术革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些学者较早分析了其对员工、收入和研发等微观层面的影响。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真正兴起和全球化传播，则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息息相关。



摘自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当代中国》

周洪宇 徐莉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

命为支点，推进和实现新的产业革命。

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2011年9月，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端于美国，绝非偶然现象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后初期美国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众多优秀的科技人才、蓬勃向上的民族创新精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二是战后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直接促成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

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由西方提出。最近，随着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专题讨论，在法兰克福举办的欧洲模具展上3D打印机现场打出锤子，以及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在中国的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了一个热词。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些学者较早分析了其对员工、收入和研发等微观层面的影响。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真正兴起和全球传播，则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息息相关。

具体来说，一是至20世纪80年代，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日渐枯竭，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的持续生存带来了危机。二是化石燃料驱动的原有工业经济模式，不能继续支撑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三是欧盟的推动和媒体的传播。从2000年起，欧盟就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转型。

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很有可能化解人类面临的资源困境，甚至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模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如何改变我们

首先，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出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经济模式所形成的灾难与陷阱。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经济模式均以化石能源为动力，其结果带来地球人所知的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化石能源是非再生资源，其枯竭已渐渐临近，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工业模式与社

会生态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化石能源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如果不扭转目前的工业生产模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将难逃灭顶之灾。

而正在兴起的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就是利用如水能、风能、潮汐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资源，如果能够实现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将从根本上摆脱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道路，从而使人类社会走上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以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为支撑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是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唯一出路。

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使世界制造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主要特点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服务业劳动力比例占到70%以上，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世界制造业总量的比重都持续走低。

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从1980年的2790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2000亿美元。其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5840亿美元增加到1856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93%降低到18.20%。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330亿美元增加到1923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78%增加到18.85%。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劳动力成本低廉是根本原因，而劳动力成本低廉又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与低安全标准和低环保标准。未来制造业数字化与可再生的绿色能源充分利用后，欧美发达国家凭借科技实力与先进的创新体制将会在世界制造业中重新占据优势。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出了拔地而起的工厂和大片的工业区，以及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而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信息技术，生产将会是分散式的，每栋建筑都可以利用自己产生的能源进行生产，而生产方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展示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这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

也就是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传统生产方式具有颠覆意义，它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新经济发展范式上的，并带来产业组织模式和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第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也是欧、美、日

等发达工业化国家走出目前经济衰退的必由之路。

自从 2008 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到现在已四年多了，尽管各国都纷纷采取了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种种迹象说明，目前全球经济衰退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特征，更多地表明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走出自经济大萧条以来全球最大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正如里夫金所说：“为了摆脱危机，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会试图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

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过渡，为协作的时代奠定了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后，人类就进入协作的时代。

工业革命曾经创造了大量雇佣劳工的工作机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IT、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技术使机器代替人力，很多工厂没有工人在里面工作，全靠软件运转。由于工厂自动化，很多人可能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全世界都在发生。

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带来最后一次雇佣劳工大潮，在接下来 40 年里为两代人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我们仔细看一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新能源、新建筑、能源存储、能源互联网、交通物流），都意味着大量的工作机会，既包括高智力工作，也包括熟练和非熟练的工作。对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雇佣劳工大潮就很有意义，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此后会出现乘数效应，创造更多人们希望从事的工作和创业机会。由于新的设施是智能化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那时我们就要对雇佣工作反思了。接下来会更多地转向技术，用一个个小的自动化智能化工作间取代工厂车间里的大规模劳动。服务业也是同样，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劳动密集，语音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发展，未来会更好地发展和应用。

总之，人类就把简单的工作交给机器和技术，自己去从事更高级的职业（而不是生产性的机器），用社会能力去建设充满人文色彩的社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后，到 2050 年，人们会随之进入市民社会。市场或者说传统的商业社会，会由少量专业职业人士通过专业技术来经营管理，大量的就业会转入市民社会的相关工作岗位上。

当然，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名人荐书

《外交》：

戴蒙德具有雄辩之才，尽管近来美国民主主义推行者们一再犯错，但是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一个去帮助那些正在争取自由的社会的角色。



《民主的精神》

【美】戴蒙德 著

张大军 译

群言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龚鹏程：

作者写的乃是一个变动时代中的小人物，有些文化修养，有些社会关怀，有些道义担当，但在大时代里终究还是力量微弱的。



《一枕清霜》

夏磊 著

三联书店2013年10月版

李昕：

本书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改写而成，是孔飞力的代表作之一，着重提出中国晚清以来，直到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性议程”。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美】孔飞力 著

陈兼 陈之宏 译

三联书店2013年11月版

樊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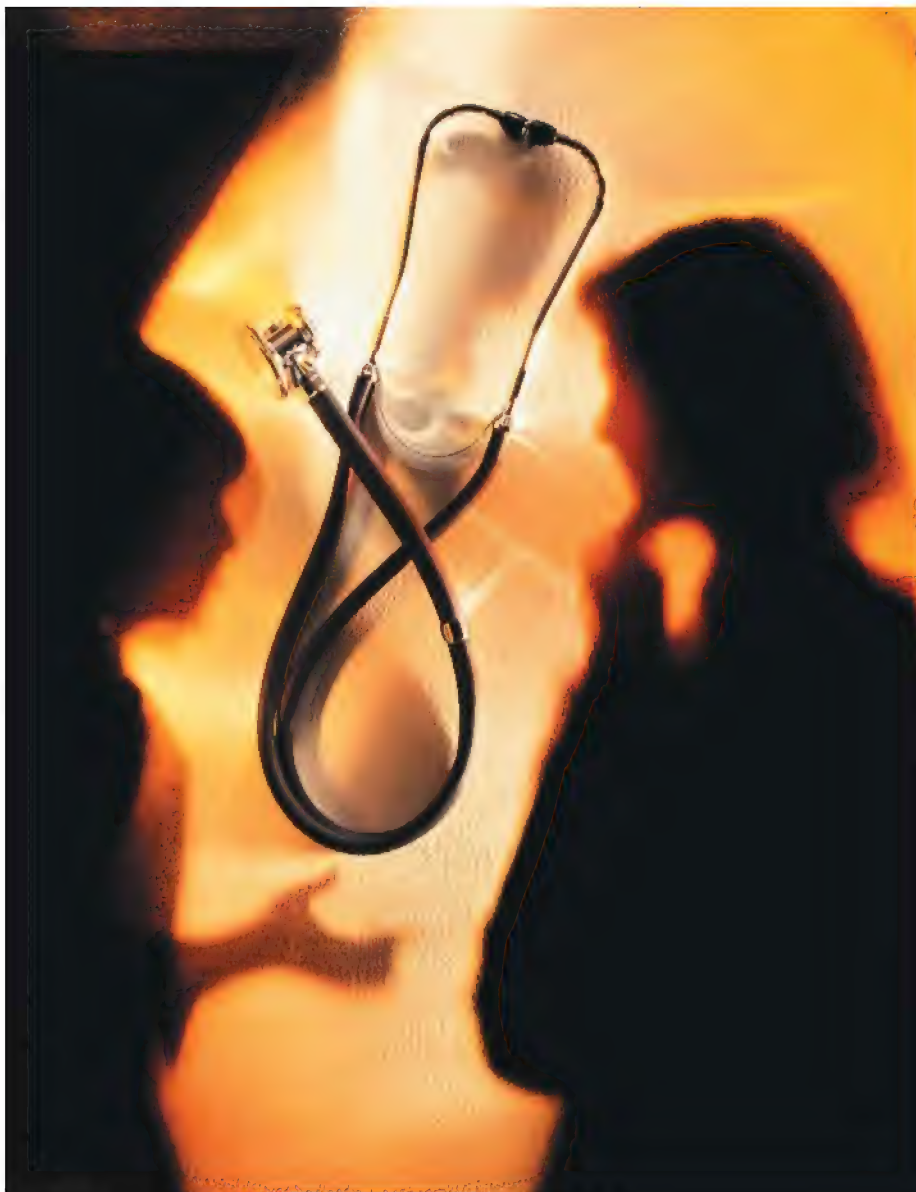
我本人通常在作预言时比较保守，但我的确从本书中获取了大量的“正能量”。



《中国领先一把》

李河君 著

中信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几百元体检足以预警妇科肿瘤

肿瘤直径1厘米，约重1克，包含109个细胞。如果肿瘤从一个细胞开始分裂增生，到出现临床表现，大约需要458天。可见癌肿的产生发展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有征兆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 北京报道

虽然“单独两孩”正激发中国人新的生育欲望，但是同时，由于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呈现出升高和年轻化的特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郎景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介绍，以宫颈癌为例，小于35岁的患者所占比例，较上世纪80年代已经增长了25个百分点，“宫颈癌年轻化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年轻的女性往往无法完成生育，同时引发其他更多的问题。”

郎景和是中国最好的妇产科医生之一。他在1964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其后即到北京协和医院从事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1986年，他出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1993年至今任妇产科主任。

此次采访中，郎景和谈到了目前妇科肿瘤的诸多要点问题，以及检测、治疗等实务问题。他说，几百元、包含B超的合格体检，其实就可以预警卵巢癌这类最隐蔽的妇科肿瘤。

妇科肿瘤跃上疾病谱

《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是你从医的第50个年头，在你看来，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性的身体健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郎景和：应该说这50年来，中国妇女遭遇的疾病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说疾病谱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看的主要病患，在妇科是炎症比较多，另外涉及妊娠的一些问题，包括早期妊娠和先兆流产比较多。产科来讲，当时很主要的问题是出血、感染和妊娠合并的一些疾病。那时叫妊娠中毒症，现在叫妊娠高血压病或子痫前期。

现在炎症和先兆流产的情况就少了。从产科来讲，产科感染明显减少。因为各种预防做得比较好。从妇科来讲，妇科肿瘤多了。子宫内膜异位症也比较多见。生育年龄的妇女子宫内膜异位的发病率达10%至15%。这会导致疼痛、癌变和包块。

另外，我们重视了中老年妇女的健康

问题，比如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等以及绝经相关问题。这很大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寿命延长。我们在全中国一定范围内做的调查，中老年妇女这方面的问题比例高达30%。

所以总体来讲，疾病谱发生了改变，表明整个社会发生了变迁，同时，人类文明和身体健康的状况出现了新问题。我们可以简略地说：肿瘤的问题、中老年妇女的问题以及生殖要求、解决不育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瞭望东方周刊》：妇科肿瘤的发病率有怎样的变化？

郎景和：发病率发生很大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十个门诊里有一两个肿瘤患者，现在能达到四五个。尤其是子宫颈癌，近一二十年尤其增多。

子宫颈癌现在发病率明显提高，在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中仅次于乳腺癌，居第二位。子宫颈癌全世界每年有45万新发病例，其中发展中国家占80%，我国每年有新发病例约13.15万。全世界每年有29万女性死于子宫颈癌，我国约为5万。

子宫颈癌还表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以往小于35岁的患者只占全部患者的5%，现在能占30%。子宫颈癌年轻化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年轻的女性往往无法完成生育，同时引发其他更多的问题。

另外一个常见的是子宫内膜癌，以前发病率比较低，现在也高了。这个和个人的体质有关。子宫内膜癌患者通常有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三联症”，反过来说，有这三种情况的女性“高度危险”发生子宫内膜癌。另外应用雌激素也会增加罹癌风险。

吸烟与子宫颈癌有相关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子宫颈癌被称为“女性头号杀手”，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

郎景和：子宫颈癌在女性生殖道肿瘤中威胁最大，可谓女性“第一杀手”，多发于50岁左右的女性，如果及时得到诊断，早期子宫颈癌是可以治愈的。特别是年纪较轻时对子宫颈癌前病变进行积极治疗是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措施。

这个发病原因现在已经明确，主要由人

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引起。

HPV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认识，但真正把它和宫颈癌联系起来的，是由德国的一个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他是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他的贡献不是发现了HPV，而是在100多种HPV中，明确了某些类别的HPV和子宫颈癌的关系，或者说明确了高危型HPV就是子宫颈癌的致癌病毒。

这很重要，这是人类对癌症认识的重大革命——癌症有很多原因，包括慢性刺激，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致癌病毒。

《瞭望东方周刊》：子宫颈癌的发病在阶层和地域的分布上是否有一定的差异性？

郎景和：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过一个调查，从北到南，内蒙古、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西这些地区是子宫颈癌的高发地区。2013年，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现在还是这样。

这个发病率高低与生活水平、卫生和受教育程度相关。

HPV感染是导致子宫颈癌的最大病因。与子宫颈癌相关的其他高危因素还有：过早开始性生活，多个性伴侣，其他性传播疾病以及吸烟等。

《瞭望东方周刊》：子宫颈癌的高发是否和现代人的性观念开放有关？

郎景和：当然。这个病毒的感染主要是通过性传播。所以我们倡导洁身自好。

HPV的感染是很普遍的。人群中大约有20%的女性会有HPV感染，而每位女性终身累积感染的平均概率可高达70%。我这里有个2010年的全球感染者一百万份样本的抽样调查，全球的感染率为11.7%，亚洲地区为9.4%。我们国家预计是在10%到15%。

但感染了不一定得病，绝大多数感染在一年左右就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清除了，最终只有2%会有不同级别的病变。

《瞭望东方周刊》：环境的变化是否也是一个重大因素？比如大家现在很关心的雾霾问题？

郎景和：雾霾和生殖器官的关系还不好

说。目前没有证据能证明这点。但是雾霾对整个的身体机能有影响，这样来推导，可以说它对生殖器官有影响。

我们现在明确的是，工业污染导致的化学毒物二噁英，会促发子宫内膜异位症。而日本的研究也证明吸烟与子宫颈癌有相关关系。所以我们倡导丈夫为了妻子的健康，不吸烟。

洁身自好才能预防宫颈癌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洁身自好和戒烟，对感染病毒的了解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

郎景和：说得很对。后来能够预防宫颈癌的首支癌症疫苗问世，创造了人类抗癌史的神话。

现在全世界有两家公司生产HPV疫苗，美国默沙东公司研制的Gardasil，英国葛兰素研制的Cervarix，一种针对HPV-6、HPV-11、HPV-16和HPV-18这4型病毒；另一种只针对HPV-16和HPV-18。

疫苗需在6个月内完成3次注射。打疫苗之后阻断了感染，可以很好预防。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在使用。

《瞭望东方周刊》：国内的状况呢？

郎景和：我们没有引进。我们在自主研发，预期一两年可能面世。

在我们国家，我们的疫苗比如脊髓灰质炎糖豆、接种牛痘等都是国家提供给公民免费使用。而美国研制的这个疫苗300美元一支，连续打3支，太贵了。

当然，经济上只是一个考虑。中国感染的HPV和美国的种类还不一样。就是常见的高危的十几种HPV，感染的频度和类型也有差异。比如HPV-18在国外感染率很高，在我们国家就排在第五位。在国外感染率最高的是HPV-16和HPV-18，在我们则是HPV-16和HPV-58。这样疫苗的针对性就会不同。

《瞭望东方周刊》：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预防HPV感染？

郎景和：总的来说，预防宫颈癌可以分三级。

打疫苗是一级预防，不让你感染。感染后到宫颈癌前病变是很容易发现的，这时我们还可以阻断它，叫二级预防。

如果这一步没做到，过10年左右就发展到癌了。当然，这时也是可以治疗的。现在宫颈癌的死亡率有明显下降趋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癌前病变和早期宫颈癌的及时发现和规范治疗。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正确认识、提前预防、全面筛查、积极治疗，我们的两癌、即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就做得很不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很好地预防、阻断和处理HPV感染和病变。

如何“看天象”与“体检”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妇科疾病中最容易被误诊的是什么病？

郎景和：不能说误诊。只能说不容易诊断清楚。

不容易诊断清楚比较多的是卵巢癌。70%的卵巢癌不能在早期发现，发现时通常就是晚期了。这样的病人有不少。

所以卵巢癌发病率次于宫颈癌和子宫体癌，但卵巢上皮癌死亡率却占各类妇科肿瘤的首位。卵巢上皮癌患者手术中发现肿瘤局限于卵巢的仅占30%，大多数已扩散到子宫，双侧附件，大网膜及盆腔各器官，所以在早期诊断上是一大难题。

为什么这个容易混淆？子宫是可以看见的，卵巢则是隐匿在盆腔里，看不见。只能通过影像检查比如B超检查来看有没有包块，才能发现它。

《瞭望东方周刊》：常规体检里的B超能及时发现这个隐形炸弹吗？在临床上是否有一些诊断技巧？

郎景和：做B超能发现是否有包块，可明确肿瘤的大小、形态、囊实性、部位及与周围脏器的关系，鉴别巨大卵巢囊肿及腹水。这个很重要。但大家有定期体检吗？城市的情况好些，特别是在农村。

由于卵巢的胚胎发育、组织解剖及内分泌功能较复杂，早期症状不典型，术前鉴别卵巢肿瘤的组织类型及良恶性也很困难。

这在早期不是很好区分。我们很难要求

医生每个都诊断出来。附件包块术前很难确定性质，常常需要手术及病理才能识别庐山真面目。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随着信息的发展，大家有很多途径了解自己的健康问题，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郎景和：看书上网只能教你保健知识，教你如何防病和找大夫。保健靠自己、看病靠大夫。我们不能自己看看书查查资料就不看大夫了，好多医生都有病呢。

我们有位心脏病猝发的医师，自己就是很有经验的内科医师。他就说：“我的实际身体状况和我对自己身体的估计有很大差异，即使面对一些合理的警号，这些差异仍然存在。”所以定期体检是很重要的。在小孩子的幻想中，总以为他可以长生不死，前线战士通常也不怕“长眼睛”的子弹。同样，一位自觉身体健康辛勤工作的人，对身体会遭到意外也是漠不关心的。

女性有时不觉得自己有病，有时不觉得这个是毛病。我们估算，肿瘤直径1厘米，约重1克，包含109个细胞。如果肿瘤从一个细胞开始分裂增生，到出现临床表现，大约需要458天。可见癌肿的产生发展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有征兆的。

什么时候要来找大夫？我通常会给女

性强调四个字：血、带、痛、块——这是我们“看天象”的四大症候。妇女如果在经血、白带、疼痛、包块这四个方面有一定的症状，比如绝经期出血不要以为就是青春常驻，长包块了不要以为是“发福”，而应该找大夫。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提到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对于妇科检查，哪些项目是特别必要和重要的？大约需要多少费用？

郎景和：这个话不好说，有的医院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但的确有这样的情况，该检查的不检查，不该检查的还很贵。

有的人觉得花2000元体检好像很高级，好像就保险了。这个费用姑且不谈，检查者自己的水平也是一个问题。

一个妇女无论有没有上面“看天象”的四个症状，我的建议是最好每年查一次体，包括乳腺、子宫颈、子宫体和卵巢附件检查，这样可以防范问题。

具体来说，至少应该做一个宫颈抹片，刚才讲的宫颈检查就是这个。以前用木片，现在我们用毛刷，对宫颈的刺激更小。

做一个B超。这些检查都不复杂，花费也不高。其中最贵的是宫颈抹片上的细胞学检查，因为有人工100多元。总的几百元就够了。[E]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郎景和与他的医疗团队

防止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来管理行政学院

——对话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

“就是要让每个领导干部知道自己是吃什么饭的，让老百姓知道，有一支队伍专门为他们着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 北京报道



周文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11月22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周文彰不再出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

周文彰的履历，可以归纳为从教师到官员，再回归学校去教官。在海南的20年，周文彰从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成为“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7月，他调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4年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9年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多年教学和从政积累的经验在行政学院这个教如何从政的课堂上得以施展，仅仅4年的时间，周文彰在国家行政学院推出了一系列力度不小的改革措施，理顺教学管理制度，在学员结业式上独创“一句话礼物”，收到强烈反响。日前，本刊记者专访刚刚离任的周文彰，解读他的行政学院风云录。

从“会什么教什么”到“要什么找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来到国家行政学院任职？

周文彰：我做这个副院长，与在行政学院学习过有关。2008年9月到12月，我在行政学院英语强化班做班长。英语强化班停了6年没办，我来的时候是第一年恢复。班上面临如何把学风带正、如何把各种意见统一起来，保证培训的正常进行等问题，我这个班长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学校就对我有

印象，班里组织部的同学也对我有印象。后来中央调我来北京的时候，行政学院一些老师要调出去，中组部就征求我的意见。

《瞭望东方周刊》：来国家行政学院之前，对它了解多少？

周文彰：一无所知。我长期为学，在小学中学中专大学这一系列的阶梯我都教过，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博士，一级不落，所以对教学方面我不陌生。在海南工作的20年对来行政学院帮助也很大，怎么处理问题、怎么做领导干部都是在海南学会的。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上任以来在行政学院推动了不少改革措施？

周文彰：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理顺教学培训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在实际运行当中，我感觉到有一些摩擦、错位。摩擦就是由于工作的体制和机制不畅通，经常在教务部、教研部、培训部、进修部，还有行政后勤部门，有一些摩擦。

我采取的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建立教学培训联席会议制度，这三大部门和行政部门全部的一把手参加，每个月开一次会，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大家总结上个月教学培训存在的问题，然后一起来研究解决。后来的联席会议内容超过了这些部分，有一些教学方面的改革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完成的，先达成共识再上报党委。以前没有这种制度连接沟通这几个部门，所以就会导致各自为政。

第二个改革是调整一部分部门的职责，把小教务变成大教务。

我们三个教学培训部门，一个叫进修部，主要是培训省部级、国企领导干部；第二个是培训部，主要培训地厅级、少数县处级，和师资培训；第三个是培训中心，主要接受社会部门和企业的委托和合作培训。

后来增加了“应急管理培训中心”，2001年成立。国家的突发事件逐渐多发，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比较多，西方国家早就把应急管理提上日程了，中国和欧盟有应急管理培训的合作，我们在应急管理培训中心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中欧应急管理学院。

每个培训班我们都要制订一份详细的教学方案，比如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课程安排、教师队伍的考核评价等。以前，进修部的教学方案都是由进修部牵头制订的，进修

“我感到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

部和培训涉及相关政府机关统一制订。培训中心主要听取委托部门的意见，唯独培训部的教学方案是由教务部门制订的。这就造成了整个行政学院的教务部只为培训部服务，教务部成了培训部的教务部。这就导致了第一个弊端即教务管理体制不统一，第二个弊端就是影响了教务部去管其他事情。

我来了之后做调研，提出把教学方案的制订统一交给学院部门来做，教务部不再搞培训部的教学方案的制订，它的任务是参与，最后审核发布。教务部集中起来现在统管全院的教学培训改革。

2009年7月份我给教务部提出了18个调研课题，他们经过一个暑假，绝大部分都拿出了调研结果，这些稿子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后来学校的文件。

“一句话礼物”讲哭厅级干部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教务改革院内有没有反对声吗？

周文彰：有反对声，主要是教研部门有意见。教研部门安排课程的权力受到了一些制约，他们的长处就是对教学业务熟悉，对课程内容熟悉，对学科前沿熟悉，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会什么教什么”，容易照顾老师，而不是严格以培训任务为导向。

我们提出了围绕政府工作设置班次，围绕政府工作配备课程，围绕政府工作编写教材，围绕政府工作建设学科的要求，先把课程确定下来再找老师，这叫“需要什么找什么”。

实际上教研部门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比如经济管理专题班、社会管理专题班都是他们做的。综合性的培训班、进修班、青干班，这种一个月以上的，由培训部切成几个板块，比如公仆意识、公共管理、社会管理、应急管理板块，然后分别由教研部去做具体内容。

评估质量方面，我把观摩教学，学员评课和专家听课称为“铁三角”。学员评课过去一直有，过去有很多指标，比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姿态等，学生打分打得很繁杂，可行性逐渐降低。我改成了只打一个印

象分。有意见可以写在下面。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初是如何设计“一句话礼物”这个活动的？

周文彰：最初我的考虑是改革结业式。我们结业式的大体流程是学员代表谈体会收获，培训部门做总结，校领导发结业证书。感觉缺少新意，结业式是教学培训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我们把它升华成教学培训的最后一课，让学员们带着思考和感动甚至震撼离开岂不更好？

2009年12月9日，在第十七期青海班结业典礼上，最后由我代表学院送一句话，这句话就确定为党性教育和公仆意识教育，“一句话礼物”。我作了题为“做官、做事与做人”的讲话。现场反响很热烈，学员上来纷纷和我握手要名片。

“一句话礼物”讲话内容有两类：一个是针对性，针对学员组成和培训主题。比如一个培训班的学员是市长，我就提出“诚信政府的关键看市长”；如果这个班是食品管理，我就讲“牢记民以食安为天”，主体功能区建设我就讲“把生态文明建设贯彻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始终”，西部地区来了，我就讲“缺什么都不能缺精神”。

第二类是共性的，不管你来自哪个培训班、什么培训主题，都要铭记于心的，比如“把群众当亲人”等。

有一次我讲官僚主义，话说得很诚恳也很重，下面几个正厅级干部都听得眼里噙了泪。我的这些结业式讲话很快传播开来。北京行政学院那里，校园培训信息几乎大部分登了我的讲话。

三个学期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一共送出去80多句话。我知道自己快退休了，我就跟学院说，我做的其他改革你们都可以推翻，但唯独这个“一句话礼物”希望能坚持下来。

干部培训机构也要去行政化

周文彰：习总书记讲了一个“问题意识”，问题通过改革不断解决，问题又在实践中不断产生，这是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我在学院的管理思路也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学院的管理形象比喻为农民把种子往田里一撒就不管了，望天收，而我做的是除草、施肥、松土的工作。

周文彰：比如职称评定规定，要求有三

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外校评委，主要是专业评委。我感到这样的构造不合理。我的设计是初评有外校专家参与，只看业务，只要业务能力达到了都通过，不设名额限制；然后到高评，高评委应该全部由我们学院有正高级职称的领导组成，评的是教师的思想道德品质，是不是有团队精神等。

有一次评完后我就感到很沉重，我把职称办的人找过来谈话，职称评定要求副高升正高以上要有一本书或一篇在核心刊物发表的文章，可是有3本书有5本书的呢？有8篇文章有20篇文章的呢？结果投票当中著作少的人上去了，多的反而下去了。这证明投票里面有人情关系，而且专家委员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一旦通过了连党委都没有办法否定。

我建议做细化工作，应该有一个分数，一本书的文章是多少分数，分数出来后再给大家投票，但是这个目前还没有解决。

现在讲高校去行政化，行政学院有它的特点，它本身就在党政系列，它是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有行政级别。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教学规律，按照教学科学化、有效性来安排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教学培训这个工作为中心。

干部培训机构也要去行政化，是指的管理方面，防止用行政机关的办法来管理行政学院。

中国特色培训干部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能给我们概括下中国特色培训领导干部的模式吗？

周文彰：中国培训干部，一方面要放眼世界，在学习理论、培训理论和培训方法的研究和探索方面，发达国家是有不少走在前面的，比如案例教学法、行动教学法、组织行为理论等。

我们教学培训要开放办学，不能封闭，就是请进来，走出去。但是再好的经验都不能套搬。教学培训也是同样的道理，要符合中国国情。

我们干部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工作，政府管理也要适应这个国情要求，所以干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和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

此外，干部本身来源不一样，有自身特



国家行政学院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

点，学历有高低，有的在基层时间长，有的在机关时间长，教学也要有针对性。

中国处在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观念要创新，思想要解放，是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中的，教育政府管理者的内容因此也是动态创新的。

案例教学是从法国行政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先做起的，案例教学比较适合成人教学。两个学院的教学方法有不同，哈佛大学用资深教授去采写案例，法国行政学院是管理者本人讲自身的管理经验，我们就综合采用了这两种办法。

应急管理培训，找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来讲课。机关作风建设和政府效率，我们请徐州的来讲，有的地方有自己的独到经验，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也鼓励老师自己采写教案，比如《雾霾挑战中国》的课题。我们的老师每年都参加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和亚洲联合会。每到国外一次就有新东西学回来，比如我们去澳大利亚学习，学到了每天早晨做小结的做法，每天用15分钟回顾前一天的内容，收效良好。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观察，我国整体干部队伍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周文彰：自从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以来，经过35年来的不断建设，我们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教育背景基本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博士硕士有相当比例；执政能力不断提高，这个能力包括驾驭市场

经济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群众工作和发展的能力等诸多方面；眼界和思路也在更加开阔，现在通过多种渠道，互联网、出国培训等，都让干部有了国际化的思维。

我到过基层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基层干部，我感到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有不少干部有群众情怀，主流还是好的。但是宏观来看，干部队伍还有很多问题，能力需要提高以及反腐败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许多重大改革，例如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干部队伍要怎么与时俱进地提高执政能力？

周文彰：这是体制改革。我们最大的思想准备是要准备向自己开刀，向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刀，比如要舍得放权，把不该管的事，不需要审批的事情坚决下放到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把以前长期忽视的事情抓起来，就是适度地做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五个方面，一级抓一级。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因为这次改革刷新了我们许多思想观念。比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等。

此外，要有勇气，任何改革都是现有格局的打破，现有利益的再分配，所以就需要对传统改革的勇气，不能在改革面前缩手缩脚。这个勇气现在地方的基层干部还是欠缺的。东



科技强军需要军民融合式的道路，鼓励民企进入国防工业，对民企意义重大

军方采购“瞄向”深圳

涉军行业整体利润率较高，通常以生产军用整机、整系统利润率最高，至少可达30%以上，军品二、三级配套也可达到近20%的利润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傅天明 | 深圳报道

以国家现有的军工行业标准，只有取得“保密资格认证”、“国军标 9000 体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资格许可证”，即“四证”齐全的企业才能成为涉军企业。

《瞭望东方周刊》从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获知，现阶段深圳市取得保密认证的企业有 40 多家，四证齐全的企业有 25 家。四证齐全的企业通常都是军方直接订货的企业，民营企业占 90% 以上。

军方直接采购年订货额接近 3 亿元的企业有中兴、通创通信、国威电子。其余企业大多数订货在 2 亿元以内，部分企业由于以二、三级配套或元器件配套为主，难以准确统计军民比例，但军用部分大致也在 1 亿元以内。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提供的信息显示，深圳这四十多家涉军企业军品年产值在 60 亿元左右，全产业链 GDP 在 100 亿元左右。涉军行业整体利润率相对较高，通常以生产军用整机、整系统利润率最高，至少可达 30% 以上，军品二、三级配套也可达到近 20% 的利润率，军民通用的产品或元

器件利润率相对低一些，一般和民品利润率相当。

国内首家“军工协会”

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志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是国内首家特种技术装备协会。

2006年，在时任副市长陈应春和原深圳市贸工局副局长殷勇的支持下，深圳市中小企业促进会成立第一个军工专业委员会，并搭建起一个军代表与军工企业间的互动平台，使得深圳市军供企业有了最初雏形并得以起步发展。

通过军代表的推动及牵线搭桥，一大批企业开始成功“参军”，深圳的研祥、金信诺等企业均在其中，这一平台延续至今。

2011年，在广东省保密局和原深圳市科工贸信委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特种技术装备协会宣布成立，深圳市的涉军企业终于从“星星之火”开始“抱团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觉得将来国防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靠国有大型企业，十大军工集团，确实需要军民融合式的道路，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有较多好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我们军工、武器装备方面，过去可能是短板，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大的军工集团，没有这些企业来补充完善，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不容易。科技强军需要全民动员。”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东华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深圳的民企是很有创新能力的。军方以前不是有意识地让民企参与，现在是有意识并鼓励民企进入国防工业。这让民企业也有了新的广阔空间施展，对民企意义非常重大，“这也会促使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在企业经营和升级换代方面，提供好的机会。国防科技是引领民用技术的，比如移动通讯、GPS，都是国防科技转化而来的。”

杨志勇介绍说，90年代初，当时由总参通信部主导的全军电话网改造列入军队“八·五”计划，要求在两个五年计划内将全军的电话体制由步进制、纵横制全部升级改造为程控体制。总参通信部在深圳设立的窗口公司“深圳电器公司”于1992年引进香港鸿年公司技术，开始为军队生产按键式程控电话单机，从现在掌握资料看，这也是深圳最早一家为部队提供正式型号装备的涉军企业。

90年代中期，以巨、大、中、华（巨龙通信、

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为代表的四大国内通信企业在程控机交换机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军方程控交换机订货由合资企业开始向四大公司倾斜，深圳市四占其三，军方在深圳巨龙、中兴、华为的订货一年合计就达3亿多元。

军工行业的“黄金期”

这一时期，深圳的军工重点代表企业得以长足发展，主要有以军民通用的程控交换机为代表的（巨龙）、中兴、华为、（港湾），以野战电话单机、野战程控交换机、终端设备、野战微波传输设备为代表的深圳电器公司。

从90年代末至今，每年军方订货总额均在6~7亿元左右。随着巨龙、港湾两个企业的淡出，中兴、华为现已成为我军固定有线网络交换设备的主要供货商。

这一期间，一大批民营企业，也开始以二级或三级配套的方式进入军工领域，如研祥、金信诺、亿威尔等。部分民企以及有国企背景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其技术、服务、体制的综合优势，已成为军方的直接供货商，如国威电子、中航比特、东方红海特、国志汇富、南航电子、安托山等。

“有了这些民企参与竞争，结果就是，价格下来了，质量提高了。为了节省军费，通过招投标，建立民企引进的机制，这对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建设和规划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索。我几次到深圳，感觉民营经济不可小看，另外，要很好地发挥协会的作用，使协会有一个活跃、有序地发挥大家积极性的机制。”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原部长阮朝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

北京国志汇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卫向本刊记者介绍，深圳民营企业活跃，协会就把大家整合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发展，“军工发达的城市，反而没有这个协会，因为没有必要，他们都是国企，各自都有自己的线，现在要建立一个通路，但通路很困难，有些企业走通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复制到其他企业，因为行业都不一样。”

军方的采购门槛

尽管深圳有了首家特种技术装备协会，民企朝军工产业的发展亦走在全国前列，但依然是一个试水摸索阶段，发展中的一些难题依然显而易见。

杨志勇介绍说，军工行业较高的准入门槛，使众多中小民营企业望而却步。以申请办理“四证”为例，即便顺利，办全“四证”最快也要3年，期间投入的设备费用、人员费用、管理费用需要近百

万，在没有明确的市场预期下，企业这笔投入风险极大。

深圳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是以其独有的技术优势，为国内军工集团提供部件或器件，但由于缺乏军工行业背景，同时对军方市场信息的了解也处于不对称状态，长期以来大都成为十大军工集团的“技术代工者”。

在引进和留住人才方面，军工项目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制周期长，从项目研制到形成订货，周期最短的3年，长的要5至10年。而在这整个研制周期内，要确保核心研发团队的人员稳定，对涉军企业是巨大的经济压力。现在深圳的高房价和高工资，使得深圳涉军企业在保持研发人员的稳定性上感觉难以为继。

一些涉军企业老板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政府对军工产业扶持力度还不足。深圳市政府2011年对军工企业出台了一次扶持政策，后来中断，“相关管理部门由于自身对军工行业背景并不熟悉，在企业资质认证、军企之间市场平台搭建等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上，没有相应的帮扶政策出台。”

杨卫告诉记者，“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这个行业，也感到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的问题。首先是做好，在圈子里面站住脚后，再考虑怎么利用我们民企的优势做强。暂时还不敢说做大，再大也只不过十大军工集团。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经验带领大家走进来，走进来你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做很多事。”

“深圳军工技术研究院”设想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东华认为，国家倡导这个军民融合，对已经涉足这个行业的企业来讲，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

“让我们能够不断推展一个高利润的市场，对产品性能创新性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从美国、英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国防工业来看，国有企业（在这一块）非常少，美国大部分企业并不是有国有资本参与，欧洲大部分企业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市场要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也应该包括国防工业和国防力量的配置资源。让民企进入这个市场，进入一个自由的竞争的空间，我想会产生很多活力，而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受益者。”肖东华说。

杨志勇认为，现阶段深圳市取得保密认证的企业有40多家，四证齐全的企业有25家，这为数不多的几十家企业中，大多数以生产元器件、

部件为主，生产整机、整系统的企业不超过10家，年产值尚不及十大军工集团的一个研究所的产值。

因此，现阶段深圳军工行业应该鼓励企业之间抱团发展，在行业内整合资金、技术、市场等可共享资源，形成合力，方能在国内军工行业里取得一定成绩。

杨志勇向本刊记者介绍，协会也在考虑一些出路，具体可采取两种路径，一是由政府扶持。深圳已取得“四证”的军工企业，以自愿的方式联合成立“深圳军工技术研究院”。国家现阶段在产业扶持政策上，特别是在军工领域，对国有和民营还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别。此外，民营企业即使能力具备，也未必能直接承担军方的大、中型科研项目，这也是造成大量深圳民营军工企业成为国有军工集团“技术代工”的直接原因。

而成立“研究院”后，则可以以“研究院”的名义向军方承接项目，这可以大大降低军方的“政策风险”。同时，过去一个企业难以完成的项目，通过“研究院”平台整合深圳军工（包括民用）企业技术资源，形成军用整机、整系统的科研和生产能力，实现深圳军工以原器件、部件为主的模式向整机、整系统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种路径是，鼓励部分已上市的涉军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模式快速将军品业务做强做大，成为深圳军工领军企业，以带动整个军工产业链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说，在国内十大军工集团已基本完成其专业和产业布局的大格局下，深圳要想在这个领域分一杯羹，必须突出深圳优势制定顶层竞争战略。首先是利用深圳国际化开放城市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网罗军工领域顶级人才，以人才优势占领国内（甚至国际上）的技术制高点，以技术优势切入十大军工集团已有的市场领域。其次是以深圳强大的金融业为后盾，引导金融资本、风险投资进入深圳军工行业，使军工行业获得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再次是选择二至三个深圳优势产业，通过培养若干个具备整机、整系统竞争优势的领军企业，打造优势军工产业链。

钱树根说，实践证明，深圳的力量是可融合的，今后只要有更好的引导组织，肯定就会有更好的发展。现在信息化的建设有很多是很先进的，过去我们军队方面也是很需要这些。军队的科研元素要很好地了解民企的东西，了解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发展和优长、特点。民企也要了解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装备，多方面结合起来，互相弥补，无论是材料的还是成品的生产。■



2014年1月17日，冀北秦皇岛供电公司工人在检修辖区内的一条110千伏供电线路

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

——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中央政府仍然保持着相当良好的资产负债表。
总体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完全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新年伊始，全国20余省份已陆续召开两会。在诸多发展规划中，本刊记者发现，各省不约而同地出现“严控地方债”这一目标。

北京市提出，“规范债务‘借、管、用、还’，逐步将政府性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防控债务风险。”

地方债问题列入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云南明确提出“严控新增债务，化解存量债务”。陕西提出实施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重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作出系列部署，要求“加强领导干部任期债务审计，维护偿债计划执行的严肃性”。

“严控地方债”被全国各省区同期强调的背后，可以看到2014年随着地方债偿债高峰来临，部分地方政府将面临颇大的偿付压力，同时与中央的部署也密切呼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印发通知，明确规定要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将防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这也是中央首次将防控债务风险列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之一。

自2010年开始，地方性债务问题持续发酵，但直到2013年12月底国家审计署公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社会舆论对规模庞大面目却有些模糊的地方债问题，才从总体轮廓上有了初步认识。

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债问题，究竟以何种路径来解决，仍是目前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日，本刊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长期研究、关注地方债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各方估算相去不远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估计地方债黑洞已突破20万亿元，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什么？很多研究机构对中国的地方债规模作出了估算，如何看待这些估算的结果？

李扬：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有各种机构对此进行了估算，其结果都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少数评级机构甚至据此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

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增长迅速。其中，直接承担偿债责任

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一直显著超过名义 GDP 增速，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和影子银行的信用膨胀尤为突出。

2010 年底为 6.71 万亿元，2013 年 6 月底为 10.9 万亿元，两年半增长 62.44%。

“或有债务”2010 年底为 2.34 万亿元；2013 年 6 月底为 7 万亿元，两年半增长 299%。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直接+或有)2010 年底为 10.7 万亿元；2013 年 6 月底：17.9 万亿元。两年半增长 67.3%。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截至 2012 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 13.45 万亿元，加上非融资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债务 6.49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可能达 19.94 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截至 2013 年 6 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超过 20 万亿元。

渣打银行的评估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 21.9 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 24.4 万亿元。

以上估算，均未将政府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和或有债务分别开来。如果做此处理，则各方估计相去不远。

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体制现象，需要准确统计和估计各级政府债务。在适当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中国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特征，厘清其风险。主要应通过体制改革来寻找解决政府债务问题的路径。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审计署发布的上述报告，对观察现今的地方债水平，有哪些启示？

李扬：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清晰地反映出这一过程：从 2009 年开始，中国经济明显经历了两轮加杠杆，2009~2010 年是第一轮加杠杆，2012~2013 年是第二轮加杠杆。2010~2011 年中国的杠杆率基本上是平的，得益于当时央行的宏观调控和对地方政府信贷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抑制措施，所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2011 年地方政府债务没有上升，压了一年。

2012 年 6 月以后，由于重新把稳增长提到重要位置，所以信用的扩张重新进入新一轮杠杆快速上升的过程。

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至 2013 年 9 月的 15 个月时间内，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上升了 32 个点，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一直显著超过名义 GDP 增速，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和影子银行的信用膨胀尤为突出。

中央政府信用的救助是可以考虑的重要手段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目前舆论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我国债务规模占 GDP 的比重是否仍在安全线下，从总体来看风险可控么？

李杨：中央和地方政府（与财政责任相关）的债务规模占 GDP 的比例，仍然控制在 40% 以内。这仍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的 60% 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之内。

在单一制国家中，政府有很强的控制力在各级政府间平衡债权债务，这使得中国加总的净债务率较低。如此，只要国家整体对国外保持净债权状态，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尤其是，中央政府仍然保持着相当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就总体而言，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

未来中央政府信用的救助是可以考虑的重要手段。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没有单独承担风险能力的主体，它的行为可以公司化，但产权关系是模糊的，这好似一艘没有做底舱隔段的船，任何一级政府的风险都可能是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风险。

所以，中国未来要利用好仍处于健康状态的中央政府的表（2012 年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只有 23%）。通过低成本融资，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至中央政府的表上，集中进行债务重组。具体执行的技术细节可以进一步探讨，比方说中央可能要跟地方和银行谈一个价格，不能全额埋单，要倒逼硬化约束机制的建立，减少未来道德风险的发生。

先转移杠杆，再减去杠杆，如果组织有序的话，能最大限度避免减杠杆过程中的无序践踏风险，将有效缓解流动性紧张。可以降低存量债务系统循环的成本，也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裕的流动性。

总体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完全可控的。

“赶超”阶段的特殊现象

《瞭望东方周刊》：一谈到地方债务产生的体制性因素，人们往往将其与财税体制联系在一起。分税制改革是地方阳光融资制度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么？

李扬：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自1979年开始出现。从一开始，它就同地方政府兴办企业、直接从事投资活动和配合国家宏观调控等行为密切相关。但是在不同时期，地方政府为上述活动筹资的主要渠道有所变化：

1994年税改之前，地方政府的主要做法是滥施税收优惠。税改之后，转到乱收费上。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之后，转到土地出让金上。

2008年之后，转到融资平台举债。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反危机只是原因之一。据审计署分析，2011年底前的地方政府债务中，为反危机而发生的比例为38%。其后虽续有增加，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目前不到30%。

追溯地方债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扮演着“准公司”的角色。一方面，它们直接出资成立诸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投资机构，进行地方企业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压低土地价格、变相税收减免、政府信誉担保等方式，影响和引导辖区内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间接实现其投资意愿。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被人称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但是，这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以规模扩张为要务的“赶超”阶段的特殊现象。一旦越过这个阶段，地方政府过多参与地方经济事务，特别是如果因此而形成恶性竞争，一定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大量的水分（无效投资和过剩产能）和不良债务。

地方债产生的另一大根源在于：城镇化加速及政府支出责任不对称。中国正处在工业化深化和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城镇化发展极为迅速。围绕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发生的投资和各类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城镇层面。

然而，中国的资金无论是财政资金还是金融资金，基本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严重缺乏资金来源，使得它们在财政上严重依赖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金融上严重依赖各类融资平台和非平台债务来源。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然而中国的金融结构又难以提供大量长期资金。期限错配，构成中国金融系统的痼疾。

从金融上看，融资平台也在从事资金的期限转换。

强化债务约束的预算改革是关键

《瞭望东方周刊》：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关键是在标本兼治中把握“治本为上”的制度建设，同时，当前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在于不够透明，有待于建立起严格的债务审查、债务风险防控机制。眼下，治理地方债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李扬：从长期来看，地方债务治理机制主要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债务约束的预算改革，这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个系统工程，习总书记说是“啃硬骨头”。这可能要改变中国的分权式竞争体制（GDP竞争的政绩考核制度），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分权式竞争体制下，只要是一旦经济下滑，重启地方进行融资和进行竞争性发展的这种特征就顽强存在。治一阵子又起来一段，起来一段又治一阵子，永远跳不出这个循环。

其二是地方政府未来要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市场融资主体，必须有配套制度的保障，使其能获得相应的与债务匹配的偿债收入，这样才能为其设计对应的金融解决方案。

在成熟国家中，与地方政府举债相对应的偿债结构主要是两个制度安排。第一个是高效率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基础设施的运营不是完全靠政府财政补贴，相当部分靠市场化运营和使用者付费，而中国目前主要靠财政补贴。

比方说，北京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基础设施，但收费可能是最便宜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然垄断性领域（电网、铁路、油气、水网等），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这有利于形成支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合理偿债收入。

第二个是地方政府要有稳定的主体税源。在成熟国家，地方政府的收入是以不动产税、消费税和资源税为主体的。由于分税制没有形成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中国的地方政府越来越求诸“土地财政”，行为短期化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届别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通过土地出让，50年或70年的土地租金事实上被政府一次性收取，而一届政府的任期只有3~5年。这种不对称性是诱使地方政府无休止地占用辖区土地资源的基本原因。■



援藏干部封正辉（左）常常戴个草帽在县城忙碌，被当地老百姓唤作“帽子局长”

高原上的“草帽局长”

高原的夏天，紫外线非常强烈，封正辉不管是下雨天还是太阳当空，不管是周末还是上班时间，每天都戴着草帽、拿着卷尺穿梭在各个工地上

文 | 成文

成都冬天最冷的时候也不过0℃左右，从这样温暖的地方一下子进入零下20℃的藏区，高原反应加严寒冰冻，很少有人能忍受。成都市的一批援藏干部却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干得热火朝天，为藏区当地的变化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走向深入，成都各级干部走出办公室、会议室，来到寻常巷陌、田间地头，了解普通群众所思所想、所急所盼。这些干部不仅认真听取民意，还想尽办法、排除万难，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

现年39岁的成都市锦江区建设局建设工程图审中心主任封正辉就是其中一位。2012年7月，他积极响应支援藏区的号召，来到位于川西高原的炉霍县。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位援

藏干部已是当地百姓熟知的“草帽局长”。

秋日河旧貌换新颜

四川省委、省政府自2012年4月启动对口支援藏区工作，成都市对口援助甘孜州甘孜、丹巴、德格、石渠、炉霍、巴塘、道孚、色达、白玉和得荣10个县，成都相对应的10个区（市）县按不少于上年度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0.5%的标准投入援助资金。通过资金扶持、人才输送、项目促进等方式，成都对口援藏工作有序有效推进，全力助推产业发展和民生工程，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炉霍县平均海拔3860米，氧气含量为平原地区的69%，是颗美丽的“高原明珠”，此前却处于长期发展落后的境况。按照部署，

成都市锦江区与炉霍县在2012年6月签订了援建框架协议，将发展文化旅游业、特色农牧业和改善民生作为援建工作重点，封正辉等40名干部正是成都派去“现场坐镇”的。

封正辉所挂的职务是炉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曾在西藏呆过的他，没料到还是遭遇了高原反应。他一边调整身体，一边开始熟悉住建局的工作，很快便发现工作的“短板”——县住建局的人手、特别是专业人才奇缺。虽然名为住建局，却承担了房管、建设、规划、城管等多个职能。局里全部在编人员只有18名，在他来之前几乎没有人熟悉市政设施建设。封正辉到来之后，几乎挑起了局里所有的援藏工程和其他建设项目的监管。

在签订援建协议时，成都方面就明确未

来5年拟投入1.3亿元支援炉霍县。前期投资2620万元启动的5个重点项目件件关乎民生：自来水厂老化，群众吃不上水，就为厂龙沟自来水厂注入400万元缺口资金；县妇幼保健院医疗条件落后，就投资500余万元进行改扩建；还投资近百万为晏尔龙村修起了“爱心路”……

投入1500万元的秋日河沿线综合整治项目是5个重点项目之一。

秋日河是穿城而过的一条河流，此前是炉霍县的“龙须沟”，河周围的人“晴天一身尘、雨天一身泥”。外地游客和投资商纷纷提出不满足意见，严重影响炉霍县的旅游和投资环境，当地群众对其进行改造更是有着强烈的愿望。但由于财力有限，炉霍县委、县政府改造这条街区的愿望多年未能实现。

今年夏天，秋日河综合整治工程加紧施工，县里还有其他几个项目同步实施。为了赶工期，封正辉几乎天天加班。高原的夏天，紫外线非常强烈，封正辉不管是下雨天还是太阳当空，不管是周末还是上班时间，每天都戴着草帽、拿着卷尺穿梭在各个工地上，检查工程质量、工程进度。

经过几个月的加班加点，秋日河已旧貌换新颜：昔日的臭水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爽整洁的河道；两岸道路不但平整宽敞，还点缀上了颇具藏族风情的景观和雕塑，路过的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当地人知道，这个工程是成都市帮炉霍县建的，有位“草帽局长”现场坐镇。

关于“草帽局长”这个称号，封正辉笑着说：“当时天气热了，看到工人在买草帽，我也买了一顶。可能是大家总看到我戴着草帽在工地上穿梭，所以给我取了这个外号。”

高起点规划

由于环境的恶劣和经济的落后，炉霍县人才严重缺乏，管理制度也不完善。封正辉主动承担了编写炉霍县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标准、工程建设扬尘管理办法等任务。

有了严格的管理，还得有长远的规划。为切实有效推进援藏工作，成都市先后聘请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中景旅联（北京）国际旅游规划设计院分别修编、编制了炉霍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交通建设、教育发

展、旅游发展、文化事业、卫生计生事业等“十二五”系列发展规划。

“市政设施建设改变的只是面貌，要真正让炉霍县发展起来，必须为他们谋划产业支撑。”这是援建干部达成的共识。

秋日河沿线综合整治项目，成都市锦江区一开始就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与工程建设结合起来。“旅游产业最怕同质化。”项目设计中充分融入炉霍文化元素，通过挖掘提升“崩科”（藏语意为“木头架起来的房子”）建筑符号、结合现代建筑结构和功能，将沿河两岸房屋风貌设计成现代“崩科”建筑风格；景观带内用少数雕塑、浮雕展示茶马古道和唐卡文化，栏杆造型独特。

为了建好炉霍，成都利用自身资源引进社会资金，对秋日河两岸的商业业态进行调整和打造，把这里建成一条具有浓厚高原特色的民族文化展示街区——霍尔风情街。此外，还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炉霍县的社会事业建设和经济发展。

智力援藏

对口支援藏区工作，不能只是维稳，不能只是给钱，更要为藏区的发展出“智”出“力”。

封正辉来到藏区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长，在工作中及时发现并指导改正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

炉霍县近年来一直缺乏饮用水，不管水质、水压和水量都严重不足。去年4月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了全县最大的民生工程——引水改造项目。该项目在10月下旬基本完工，但在试通水时发现有很多问题致使整个项目不能正常运转。封正辉临时受命接手该项目的整改工作，他接到命令后立即带上图纸，沿十多公里的山道逐点进行检查，从取水口一直到自来水厂，通过几天的调研和反复论证，发现取水口设置、减压阀位置、排气阀数量、厂区内管道接法及老厂区内的管线等多处都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于是立即组织施工单位对整个引水系统进行改造，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11月15日晚上通水成功，使全县人民终于告别了缺水的时代。

冬至过后，高原地区更冷了。封正辉在这样严寒的天气中多次沿着管线走村串户，协调解决村民反映的问题。山上严重缺氧，

对平原地区的人来说走路都成困难，封正辉在这条线路翻越多次，曾因严重缺氧而晕倒，但他仍坚持亲自去检查和完善每一个细节，直到整个引水系统正常运转。

“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正如封正辉所言，人才、特别是管理和专业人才匮乏，是制约藏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成都坚持“人才工程作保障”的原则，在抓好炉霍县机关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上下功夫，加强了援藏干部管理和专业志愿者队伍的派遣力度，锻炼培养提升了当地干部的能力，为炉霍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智力保障。

援藏干部在挂职工作中，有意识地将管理经验、知识技术等传递给当地的干部，通过具体项目中的“帮、带”，让他们尽快熟悉先进的城市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理念。以炉霍县住建局为例，目前，能够熟悉承担市政建设项目任务的工作人员已有3人。


一切都值得

临进藏前，封正辉的母亲被查出已是胆管癌晚期，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还没度过危险期，封正辉就随组织一起进藏，家里全靠妻子撑着，既要照顾年幼的儿子，还要照顾病重的母亲。

封正辉积极响应甘孜州的号召，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做好实现群众工作全覆盖中。按照炉霍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走到乡村，走进藏家结对认亲，访民情、解民忧、助民富。

藏区的不稳定，很大程度是因为这里条件落后、教育落后、缺少沟通交流、认识差距大造成的。他在这里不仅与农户结对认亲，同时还帮扶了一名孤儿，不仅从生活上给予帮助，还买了很多学习用具和辅导书送去，有空还当起家庭教师对孩子进行辅导。

在他结对认亲的村子，有一段入村道路的边坡存在严重危险。封正辉回到单位发动全单位人员捐款，购买了所需建筑材料，并在村上做动员工作，号召大家投工投劳，在雨季来临前完成了这段边坡的整治工作。

去藏区工作没多久，封正辉的母亲就去世了，在天寒地冻的异乡，他经历了母亲病逝的悲痛，经受着妻儿不在身边的寂寞，“可看着外地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当地群众在这里跳广场舞、锻炼身体，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 省级人大常委会新当选副主任 】

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男，满族，1953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

1970.07~1972.12 北京市东城区城建房管局工人；

1972.01~1979.02 共青团北京市东城区委干部、组织组负责人（1974.05~1975.05 北京市怀柔县沙峪公社下放劳动）；

1979.02~1980.09 共青团北京市东城区委副书记（1979.02~1979.08 中央团校学习）；

1980.09~1987.12 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青工部部长（1980.04~1984.08 北京市东城区职工大学中文专业学习）；

1987.12~1990.11 国家监察部办公厅干部、部值班室主任、办公厅外事办主任兼办公厅办公室主任（1985.09~1988.07 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函授经济法专业学习）；

1990.11~1993.01 国家监察部办公厅副司级监察专员兼外事办主任；

1993.01~1993.04 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检查员、监察专员兼外事办主任；

1993.04~1994.03 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

1994.03~1997.01 中央纪委外事局局长（1995.09~1996.07 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01~1997.09 中央纪委副秘书长（1995.04~1997.04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律系经济法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1997.09~1998.04 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五室主任；

1998.04~2002.02 中央纪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2002.02~2006.08 中央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交通部党组成员（2003.03~2004.1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3.09 兼交通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2006.08~2010.09 山西省常委、省纪委书记；

2010.09~2011.02 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2008.03~2010.12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1.02~2011.03 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2011.03~2011.11 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2011.11~2014.01 山西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2014.01~ 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党校校长。

辽宁省委常委赵国红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女，汉族，1954年6月出生，山东淄博人，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月参加工作，辽宁省委党校函授本科班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在

职大学学历。

1972.01~1977.06 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工人、团总支干事、团委副书记、车间党支部书记；

1977.06~1979.05 本溪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团委书记；

1979.05~1981.12 共青团辽宁省抚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81.12~1983.12 共青团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

1983.12~1985.07 辽宁省委党校文化进修班行政管理专业学习；

1985.07~1985.12 共青团辽宁省抚顺市委副书记；

1985.12~1989.01 共青团辽宁省抚顺市委书记；

1989.01~1992.12 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1989.09~1991.12 在辽宁省委党校函授本科班行政管理专业学习；1990.09~1991.07 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2.12~1994.10 辽宁省劳动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994.10~1998.04 辽宁省劳动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1998.04~2003.04 辽宁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3.04~2009.03 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党组书记，省编委办主任；

2009.03~2009.05 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党组副书记，省公务员局局长；

2009.05~2010.09 辽宁省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0.09~2010.10 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人选；

2010.10~2014.01 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2014.01~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黄润秋当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男，汉族，1963年8月生，湖南长沙人，1994年11月加入九三学社，1986年2月参加工作，成都地质学院水文系工程地质专业毕业，工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8.09~1989.04 成都地质学院水文工程地质系讲师；

1989.04~1993.06 成都地质学院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专业实验室副主任；

1993.06~2001.09 成都理工学院院长助理（1993.11 聘为博士生导师；1996.09 兼任水文系主任；1997.04 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副主委；1997.05 九三学社成都市副主委；1997.09 兼任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1997.12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2001.09~2006.10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副主委、成都市副主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

境保护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

2006.10-2007.05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四川省副主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

2007.05-2007.12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四川省委主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7.12-2008.01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四川省委主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8.01-2013.01 十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四川省委主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3.01~ 十一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四川省委主委，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4.01~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袁荣祥当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男，汉族，1955年3月生，浙江嵊州人，197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1978.03-1981.01 浙江省金华农业学校学习；

1981.01-1987.02 浙江省农业厅干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1984.09-1988.06 参加省职工政治大学（业余）政治专业学习）；

1987.02-1991.12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处级秘书，省财政厅农业财务处副处长（1989.01-1991.09 参加浙江财经学院成人教育财会专业学习）；

1991.12-1992.11 浙江省财政厅农业财务处处长（1992.05-1992.11 挂职丽水地区财税局副局长）；

1992.11-1993.05 浙江龙泉市（县级）委副书记、代市长；

1993.05-1994.04 浙江龙泉市（县级）委副书记、市长；

1994.04-1994.08 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

1994.08-1997.03 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地税局副局长；

1997.03-1997.11 浙江省湖州市常委、副市长；

1997.11-1998.05 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1998.05-1999.08 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6.09-1999.07 参加浙江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习）；

1999.08-2000.02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00.02-2002.05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书记、市长（1998.09-2001.07 参加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2002.05-2005.05 福建省漳州市委书记；

2005.05-2010.01 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

2010.01-2011.09 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1.11~ 福建省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2011.09 任命）；

2014.01~ 浙江省人大副主任。

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增添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男，汉族，1954年3月生，福建永定人，1975年1月入党，197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1975.10-1978.08 在复旦大学政经系工业经济专业学习；

1978.08-1983.07 福建省计划委员会（省物价委员会）农业价格处、工业价格处干部；

1983.07-1985.05 福建省物价委员会工业价格管理处副处长；

1985.05-1988.05 福建省物价委员会党组成员、价格信息处处长（1986.05-1987.03 省直机关驻上杭县扶贫工作队副队长）；

1988.05-1992.11 福建省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

1992.11-1993.06 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兼省“901”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海沧建设管委会）副主任；

1993.06-1995.07 福建省厦门市委副书记（1994.02 确定正厅级）兼厦门海沧杏林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1995.07-2000.03 福建省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1994.09-1997.07 参加厦门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0.03-2001.03 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2001.03-2004.05 福建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4.05-2005.06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5.06-2009.06 福建省副省长、党组成员；

2009.06-2010.01 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兼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0.01-2011.09 福建省副省长，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1.11~ 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4.01~ 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食色物语

做一个低脂蛋糕



肥胖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降低脂肪和热量摄入也就成为健康饮食的努力方向。

对于食品行业来说，低脂低热食物越来越受欢迎，许多传统的美食都进入了改进之列。作为典型的高脂肪高热量食品，蛋糕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如果低脂低热了，蛋糕还有吸引力吗？

低脂低热远远不是不用油脂那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固体的叫“脂”，液体的叫“油”。不管是黄油、氢化植物油还是普通植物油，都是油脂，都是“健康食谱”中需要控制的。

但蛋糕之所以不是面包，油脂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油脂是许多香味物质的载体，没有了油脂，就无法得到蛋糕特有的香味。其次，油脂会阻碍面筋蛋白的交联，使得蛋糕更加蓬松。

与馒头面包相比，做蛋糕需要使用低筋面粉——面筋蛋白含量低避免了形成面包那样致密强健的网络，从而保证蛋糕的蓬松酥软。面筋蛋白互相交联需要与水充分接触，而油脂的存在会把一些面筋蛋白包裹起来，使得交联更加不易。

此外，食物的松软程度和液体含量密切相关。在烘烤过程中，大部分水会挥发掉，油脂则不会。即使是黄油或者氢化植物油，其熔点也不高，因而会对蛋糕的松软有贡献。而且，蛋糕的形成还需要引入空气，在烘烤中这些空气膨胀，但又被面团固定在蛋糕中，才能呈现蓬松的状态。

油脂对蛋糕的形成如此重要，要想降低它的含量而不影响风味和口感，就必须让取代它的成分具有类似功能。

食品行业中尝试过的成分主要有麦芽糊精、蛋白质和食用胶。麦芽糊精是淀粉水解得到的产物，与油脂相

取代的目的是做出“能接受”的食品——很多时候，为了健康，在风味口感上有一定牺牲也可以接受

云无心：

食品工程博士，现在美国从事食用蛋白质的研发工作。通俗点说，是“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做饭”。

比，热量低一些。蛋白质与淀粉糊精热量差不多，但蛋白质除了提供热量，还有许多人摄入不足的营养成分，所以用它来取代油脂，具有较好的营养价值。

一般来说，食用胶是各种人体不能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在营养学上可以作为膳食纤维来看待。如果能让它们来代替油脂，就会得到典型的低脂低热食品——膳食纤维是多数人的饮食中缺乏的成分，因此更具吸引力。

但是，用这些东西来取代油脂，能实现油脂的功能、保持蛋糕的风味和口感吗？2013年，希腊学者在《食品科学杂志》上报到了一组这样的尝试。

他们选用了六种成分来取代蛋糕中的起酥油：麦芽糊精、高分子量菊糖、中分子量菊糖、低聚果糖、果胶和浓缩乳清蛋白。两种菊糖和低聚果糖是菊糖水解到不同程度的产物，营养上被作为可溶性膳食纤维，低聚果糖甚至可以算是益生元。果胶是从柑橘皮中提取的食用胶，食品上主要是利用它的加工性能，不过它本身也是一种膳食纤维。

这些成分各自按照适当的浓度溶于水，冷藏过夜，就得到了胶体形状的东西。从外观上，跟起酥油很相似。学者们用它们分别取代35%、65%和100%的起酥油，烤出了18种低脂低热的蛋糕。

然而，这些蛋糕跟传统配方的蛋糕或多或少都有差异，比如，取代脂肪之后，蛋糕的体积要小，口感上更硬。

这些取代了脂肪的蛋糕在某些方面和传统蛋糕均存在差异。不过就食品来说，取代的目的毕竟不是完全“以假乱真”，而是做出“能接受”的食品——很多时候，为了健康，在风味口感上有一定牺牲也可以接受。

就这些尝试的配方，用各种成分取代35%的油脂，对风味口感的各项指标影响都不算大。而全部取代油脂的蛋糕，对于多数人来说可能难以接受。☞

野渡无人舟自横



假如我们把人生比拟为一场旅行，那么渡口、车站这一类地方就更集中地显示了人生的慌乱

骆玉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兼任《辞海》编委、古代文学分科主编。

王维有一首《辛夷坞》，写一个小小的景色而极富禅趣：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里“木末芙蓉花”是借指辛夷。辛夷是一种落叶乔木，初春开花，花苞形成时像毛笔的头，故又称木笔。花有紫白二色，开在枝头（就是“木末”），大如莲花（所以用“芙蓉花”为比拟，莲花也叫芙蓉花）。

这诗说“发红萼”，那是紫色的辛夷。我曾经在山野见过这种花，开花时树叶还未萌发，一树的花，色彩显得格外明艳。这种花的凋谢速度又很快，花盛开的同时就能见到遍地的花瓣，在草地上，在流水中，格外醒目。

佛家言“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意思是在自然草木中也可以体悟佛法智慧，草木似无情而又有情。山谷溪涧之处，辛夷自开自落，不为生而喜，不为灭而悲。它有美丽的生命，但这美丽并不是为了讨人欢喜而存在的，更不曾着意矫饰，故作姿态。

禅宗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国的老庄哲学，有些诗人纯粹从老庄思想出发，也会提出与禅宗相近的人生道理。“道”与“禅”分分合合，时常在半路相遇。譬如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生死是自然的过程，一味贪生怕死，又因贪生怕死而生出无穷欲念、荒唐行径，生命的自然性就被破坏掉了，成为无根的浮器。

王维这首诗虽然令人震撼，但多少有点冷寂，我们再读一首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它的味道有些不同：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是中唐诗人，曾经做过滁州（在今安徽省）

刺史，这首诗就是写滁州西部山野的景色。

诗开头写草。“独怜”是偏爱的意思。为什么呢？一方面山涧边的草得到水的滋润，春天到来时显得格外葱翠，另一方面这是“幽草”，它是富于生气的，同时也是孤洁和远离尘嚣的。对涧边春草的喜爱，呈现了作者的人生情怀。

如果一味地写景色之“幽”，则诗中的意境便容易变得晦暗，所以随后写黄鹂鸣于深树，使诗中景物于幽静中又添上几分欢愉。这是一首郊游遣兴之作，不像王维的《辛夷坞》那样强烈地偏向于象征，它有更多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绝句的第三句通常带有转折意味，同时为全诗的结束作铺垫。在这里，“春潮带雨晚来急”，雨后的山涧到了黄昏时分愈发流得湍急，一方面交代了郊游的时间过程和景物变化，同时又很好地衬托了末句的点睛之笔——“野渡无人舟自横”。

涧水奔流不息，而涧边渡口的小舟却自在地浮泊着，一种摆脱约束、轻松悠闲的样子。时间好像停止了。

人总是活得很匆忙，无数的生活事件迭为因果、相互拥挤，造成人们心理的紧张和焦虑；在这种紧张与焦虑之中，时间的频率显得格外急促。而假如我们把人生比拟为一场旅行，那么渡口、车站这一类地方就更集中地显示了人生的慌乱。

舟车往而复返，行色匆匆的人们各有其来程与去程。可是要问人到底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大都却又茫然。因为人们只是被事件所驱迫着，成了因果的一部分。

但有时人也可以安静下来，把事件和焦虑放在身心之外。于是，那些在生活事件中全然无意义的东西，诸如草叶的摇动、小鸟的鸣唱，忽然都别有韵味。✎

				
	三亚湾红树林酒店	华润怡宝	沃尔玛	沈阳桃仙机场
关键词▶	赌场	水战	特批	暴利
时间	1月25日	1月25日	1月26日	1月27日
事件概要▶	<p>在这个五星级酒店，百家乐、二十一点、地中海扑克应有尽有，如缩小版澳门赌场。每人至少要买一张一千元门票，门票换成筹码，最大筹码50万。各种“游戏”和澳门赌场规则几乎一样，连筹码都长得差不多。</p>	<p>四川绵阳市游仙区汉仙桥地区五里堆综合市场，农夫山泉与华润怡宝双方的业务员手持铁棍斗殴，直到110民警两度赶到现场，才最终制止了这场闹剧。双方人员不同程度受伤。</p>	<p>从2006~2013年，沃尔玛有近200种食品是通过“特别审批”进入卖场销售的。这些“特批”食品有的缺少食品生产许可证、有的缺少QS生产许可标识、有的没有检验报告、还有的没有食品流通许可证。</p>	<p>10个蒸饺60元、1碗面条88元、3份饺子190元，1份烤肉石锅饭套餐98元。肯德基沈阳桃仙机场店的价格也翻番。</p>
消息起点▶	央视	中国网	央视	新华社
影响/波及面▶	<p>2013年2月，该酒店曾被停业整改过。2014年1月16日，三亚市检查过程中，文体局下达“立即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将百家乐、德州扑克、黑杰克、龙虎斗、加勒比扑克等娱乐台共43台撤除。</p>	<p>农夫山泉在小店终端推广pH水测试活动，宣传弱碱性水，有时会拿怡宝做比较。从2012年下半年起，两家时有冲突，甚至出现怡宝砸毁农夫山泉成都办事处的情况。</p>	<p>2007年，陈耀昌担任沃尔玛中国CEO后，将权力下放至门店，并让本地的采购办公室可拥有商品进场权、定价权、促销谈判以及陈列等权力。自现任CEO高福澜上任后，沃尔玛逐渐重回集权模式。</p>	
应对▶	<p>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勇表示，对这种屡次违法，不管多牛，坚决查处到底。（咦？早干嘛去了？）</p>		<p>沃尔玛解释说：特批流程仅限于已有长期合作关系、有信任基础的供应商来加速商品审批流程，需三层管理者审批。</p>	<p>正在用餐的33岁沈阳旅客赵澄：“这简直是五星酒店的价格，上海虹桥、北京首都机场也没这贵。”</p>
东方点评▶	<p>赌场只是吸引投资股权酒店的手段，背后还有一盘更大的棋：该酒店目标是建“亚洲最大的度假目的地综合体”，相当于10座五星级酒店、2座澳门威尼斯人。</p>	<p>没有法治秩序的市场经济，“商战”将回归丛林，真刀真枪。</p>	<p>企业大了，经济就成了政治，也就有了黑幕。如果沃尔玛是一个国家，它将是第26个世界大经济体。</p>	<p>“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p>



幸福 131 餐馆

红油

1 月 27 日

毛某在上海古羊路 300-11 号幸福 131 餐馆担任厨师长期间，先后授意厨师及洗碗工将店内餐厨垃圾中的废油回收，熬制成“红油”烧制食物。

上海长宁区法院

法院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 4 名被告作出一审判决。毛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本刊记者曾调查过上海餐饮废油去向，结果极不乐观，但上海已经是全国地沟油管理最好的城市。



东阿阿胶

涨价

1 月 27 日

2006 年至今，一张驴皮从 100 元涨到 1300 元以上，8 年涨了 12 倍。作为阿胶原料，加工后的驴皮每斤从 2006 年的 2 元涨到现在的超过 80 元，涨价约 40 倍。

《每日经济新闻》

畜牧业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毛驴存栏数量逐年下降，1954 年为 1270 万头，2011 年为 648 万头。

为了掌控上游，东阿阿胶也投身毛驴养殖业。但其 2012 年报显示，主营业务为养殖和驴皮收购业务的子公司几乎全部亏损。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代版。



米市

毒大米

1 月 27 日

自媒体公布广东镉超标毒大米以来，公布的有毒大米主要产区的产品逐渐退出了广东市场，却不断向其他省份销售，如湖北市场上就有了来自江西、湖南的大米，虽然其品牌不与广东方面公布的相吻合，但商家若将其包装袋换一下马甲是十分简单的事。

湖北两位地方政协委员梁潇、林汇泉

呼吁：相关部门要迅速及时地进行跟踪监督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分产地、分批次公布于众。

事关大众健康，对政府部门应该举证责任倒置，必须首先证明自己充分尽了义务。



酒鬼酒

银行账户被盗

1 月 27 日

酒鬼酒子公司酒鬼酒销售有限公司在农行账户内的 1 亿元被人转走。2013 年 12 月 10 日、11 日，一名嫌疑人在公司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向前述账户存现 200 元、300 元，并于 11 日在柜台转取了 3500 万元。12 月 12 日，同一嫌疑人又向该账户存现 500 元，同时在柜台转取 3500 万元；12 月 13 日，此人又将 3000 万元汇出。目前该账户余额仅剩 1176.03 元。

酒鬼酒公告

银行存款被消失问题本刊已报道多次。此番，“酒鬼”恐怕遇上了“内鬼”。



“马”上有钱

2014年1月26日，上线仅5天的微信理财通7日年化收益攀升至7.9%，而推出半年有余的支付宝余额宝则稳中带升，7日年化利率为6.4%。大部分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都低于这个数字

文 | 张瑜

马上有钱和马上有对象，哪个更容易实现？

马云和马化腾一定会告诉你，当然是马上有钱！

这话确实不是忽悠。

2014年1月26日，上线仅5天的微信理财通的7日年化收益攀升至7.9%，而推出半年有余的支付宝余额宝则稳中带升，7

日年化利率为6.4%。这意味着，10万元投入到理财通每年大概可获得7900元收益，而在余额宝则大约可赚6400元收益。

为了吸引用户，网易与汇添富现金宝基金联合在2013年12月25日推出的“添金计划”理财产品甚至拿出了自掏腰包为投资者补贴5%收益的绝活儿，每个用户购买金额最多2万元享受网易补贴，这令其预期收

益超出了 11%。

相比之下，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大多不超过 6%，而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上限是 3.575%，大部分银行，尤其是大银行都低于这个数字。

这样的对比想必会令银行感到尴尬吧——一位业内人士曾调侃说，现在年化收益不到 8% 的理财产品都不好意思拿出手。

资本总是流向高利润的地方。于是，存款资金正在逃离银行，拥抱这些操作简捷的互联网理财产品。面对着收益率达活期 16 倍以上并直逼信托类产品收益率的理财通或者是稍低一些的余额宝、百度百发系列理财产品、网易现金宝、苏宁零钱宝等 20 多个互联网理财产品，不能保持淡定自然可以理解。

有媒体报道说，目前银行存款规模以日均千亿之级别迅速萎缩，这个数字未经官方证实。

但余额宝和理财通的吸金速度可从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一趋势：2014 年 1 月 22 日，腾讯与华夏基金合作的理财通正式登陆微信，当天募集资金 8 亿元，自上线起以每天 10 亿元的速度在增长；2013 年 6 月 13 日上线的余额宝，首日募集资金 3.5 亿，在 2014 年的前 15 天更是以每分钟 300 万元净申购的速度在增长，尤其是在这个年终奖季，在过去 7 天内，有近 400 万人在余额宝内存入资金，加入“马上有钱”的理财大军。

余额宝让中国 80% 的屌丝获得了坐享高收益的资格，做了一场最好的全民理财普及推广秀，但这还不是它创造的最大奇迹，让天弘基金这个连年亏损的基金业屌丝在短短半年之间跨越了一个个雍容富态的高富帅登上中国最大基金公司的巅峰，恐怕才是最大的奇迹。

wind 资讯数据统计显示，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规模排行中，华夏基金以 2282.67 亿元位居榜首，天弘基金 1943.62 亿元排名第二，两者相距 343.05 亿元，其中余额宝资产净值为 1853 亿元。然而仅用了 15 天时间，余额宝规模已突破 2500 亿元，客户数超过 4900 万，一举超越盘踞基金排名首位 7 年之久的华夏基金，成为新的行业第一。

互联网业与传统金融业之间的结合越来越

❶ 包括《瞭望东方周刊》在内的多家媒体频频曝光的各种理财产品黑洞中，出现上述问题并致投资人损失血汗钱的，正是“绝对安全靠谱”的大银行。

越深，关系也越来越微妙。一方面，互联网支付为银行带来了全新的模式，而这是用户的选择，已经不为银行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由支付而带来的越来越多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已经对传统银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

事实上，无论是余额宝、理财通，还是剩下的 20 多个“宝”这些瓶子中装的，大多不过是货币基金产品这种老酒，而它出现已有十个年头。但是，这么基础的理财产品却并不为大多数人熟知，事实上，理财人群的整体比例也并不高。银行这个垄断的理财产品贩售渠道恐怕是块绊脚石。由于中国银行主要靠存贷利差赚钱，存款规模便成为其命脉，为防止理财产品对存款造成分流，银行自然不肯花大力气向用户推广。而作为利益交换，银行则要向投资者收取费用，包括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服务费、管理费及托管费等几大种类，细分之下又涉及销售服务费、托管及保管费、投资管理费、交易费、信托费用等众多名目。

而余额宝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人为设置的藩篱，并且将中间费用降低为 0。除了高利息之外，互联网理财产品简捷的操作模式也大大降低了理财门槛，1 元起售、购买便捷、随时支取，每天通过手机 APP 观察自己的收益，这受到了手中有些闲钱、30 岁左右、高度依赖互联网的年轻一代用户们的青睐。

这让银行感到了些许恐慌。最直接的反应是，银行纷纷开始上调存款利率。然而，即便是将一年期存款利率上浮至顶，即基准利率的 1.1 倍，也只有 3.575，和互联网理财产品相比毫无竞争力。

这时候，有人开始拿安全说事。

近期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甚广的是个“手机丢了，支付宝会怎么样”的帖子，大意是说，手机丢了，支付宝账户里的钱很容易被盗。随后的 1 月 19 日，阿里巴巴小微

金融服务集团首席风险官胡晓明回应称，那个模拟案例的情境是捡到用户手机之后同时在这个用户的个人电脑上找回密码，如果是想在别的电脑上找回你的支付宝密码，他一定需要“手机校验码 + 身份证信息”等更高安全级别的校验，绝对不可能仅通过一个手机校验码就找回密码。

事实上，世界上的确没有绝对的安全。不管支付宝设置多么复杂的风险防控系统，漏洞都是存在的。这对于其他互联网金融产品来说也是一样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随着余额宝中的钱越来越多，如果有心，盗取用户账户也绝非不可能。但是别忘了，钱在银行也不是绝对安全，这方面的案例也已经很多。甚至至今还有许多用户在电话诈骗下自己把钱送给别人的例子。

解决方案之一是保险。2013 年 4 月 16 日，支付宝以保险的形式为用户提供资金保障。支付宝的资金安全由平安保险全额承保，用户发生被盗，平安保险会全额赔付，赔付金额无上限，保费全部由支付宝承担。而理财通账户的资金受微信及财付通账户安全体系保护，由 PICC 承保，且仅可取出至本人银行卡。

而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则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

如果在马年，你将要奋然投身于“马上有钱”，还要注意一点，本文开头所提出的“7 日年化收益率”是个时刻在变动的数字，假如这支基金能够一直保持相对的平稳，则投资人在一年后可以拿到上述收益。

还有一些声音在拿“风险及收益表述含糊”来质疑半年来出现的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不过，讽刺的是，包括《瞭望东方周刊》在内的多家媒体频频曝光的各种理财产品黑洞中，出现上述问题并致投资人损失血汗钱的，正是“绝对安全靠谱”的大银行。

顺便说一下，如果想要获得稳定一定且肯定的收益，那把钱存到银行是必须的——当然你并不知道这钱是否贷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尽管，2014 年 1 月 27 日的活期存款年利率只有 0.35%（你没看错，小数点在 0 后面），但正是那句俗语——苍蝇肉也是肉。❷



养老小镇崛起

我们注意到，一场复归田园传统的浪潮已经萌芽

文 | 黄志杰



▲ 2013年9月14日，江西宜春温汤镇“万人泡脚”活动，吸引10083名游客泡脚，创吉尼斯纪录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归田园居》为中国人耳熟能详，在几千年的耕读文化传承之中，田园情怀深植于国人基因。

今日中国，一场史无前例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澎湃向前，城镇化率以最短的时间历史性地突破了50%，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在2013年底突破2亿。老龄化中国与城市病问题交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临“老依何处”的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注意到，一场复归田园传统的浪潮已经萌芽。

广西巴马，迎来了数以万计、五湖四海的“候鸟人”。他们在这里的“百魔洞”排队打水、排队呼吸空气。百魔屯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外来投资者或国际财团注入资金，养生公寓到处耸立，电梯房的密度竟不亚于繁华的大城市。

宁静的巴马，被扑面而来的热情和资金卷入了纷繁芜杂世界。千百年来所崇尚的“消灭杂念、远离名利、规律生活”，前所未有地受到冲击，一波又一波。

江西西部山区小镇温汤，吸引来数千上海中老年人买房置业。上海人在这里的规模，转眼之间就已经大到足以组织“千人泡脚大会”的程度。

温汤人有一句谚语，“白米饭，木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越来越多在温汤的上海人意识到：“神仙心态比神仙水更重要。”“温汤镇的一天，是从把脚放进温泉水的这一刻开始。”才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天的花甲夫妻张达财和万福妹，去年刚在温汤买房，今年8月初完成装修后在温汤生活了十几天就已经变为“汤痴”。

每天晚上，来自上海的阿姨大妈会

准时跳排舞，这里的麻将馆里流行的是上海规则。每一两个月，数百名上海人会往返于上海南站到宜春近千公里的铁路线上。这个上海人发现并且“深耕”的“世外桃源”，正在吸引多家五星级酒店、大型游乐场进驻。

到2015年，上海老人将超过430万，显然，一个温汤镇远远不够。

受此感染，2013年，上海崇明县陈家镇规划了2000亩地，试图打造中国知名的“养老小镇”。政府方面已经和太保、泰康等保险企业进行了相当密切的接触，以求为上海发展养老产业提供经验。

在另一个老龄化城市——首都北京，平谷区开始建设“养老小镇”夏各庄，这个小镇规划了2至3个养老社区，占地3000多亩，平谷区区委书记张吉福宣称“生态有为”。

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中部大城市武汉的周围。

2013年6月底，武钢退休老员工谌鄂湘等5人来到新洲道观河，找到了闲置的民宅，租了十年。发电机、电钻头、伐木机……谌鄂湘等人搬来工具，自己建起了“别墅”，归隐田园。

而且，真的养起了十几匹马。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群武汉人，自力更生，组团过上了海子诗歌般的生活。

顺势而为，方为大道。2亿老人的渴望，已经逐渐汇聚成为一道道洪流，其中的一道，就是回归田园、落叶归根，在与天地自然的交集中，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妥帖。

于是，我们看到了养老小镇崛起的萌芽。

在这期“东方口碑·报告”栏目中，本刊记者黄柯杰，通过《上海人在高坪》一文，向您介绍了他在浙江丽水一些新兴小镇的所见。这是全国第一个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的地级市。✎



浙江遂昌妙高街道黄庄村，生长着20多棵400年以上的枫香树，空气清新，环境怡人

上海人在高坪

与老乡告别时，他们许下约定：待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带着父母来高坪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 | 浙江丽水报道

2014年1月24日，上海人周伟和朋友开车来到浙江遂昌的高坪乡。买一些年货，顺便看望2013年夏天父母养老寄居的老乡家。

高坪羊肉、冬笋和新鲜的高山蔬菜，把周伟的后备箱塞满，与老乡告别时，他们许下约定：待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带着父母来高坪住。

近年来，长三角城市大气环境持续恶化，处在浙江西南、被称为“浙江西藏”的丽水市，反而成为许多老年人的乐园。

高坪乡的养老小镇

周伟的父母都是上海的退休教师，2012年5月1日，周带着父母沿着高速公路自驾游，在金华夜宿一晚后，他们调头东进，沿着金丽温高速到丽水，然后一路到遂昌，跟着车流到高坪乡的茶树坪村。

高坪乡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是遂昌县海拔最高的乡镇。高坪本意就是高山上的—块平地，盘山公路从山脚延伸到山顶，一下子豁然开朗。周伟还记得第一次到山顶的情景：

沿路开车，山水之景跃入眼帘，到茶树坪村正是中午，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满山的红杜鹃。在通往杜鹃花海的路上，原先僻静的山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游人。

八岁的女儿满山疯跑，中午吃晚饭，周伟全家决定留宿一晚，第二天，父母告诉周伟，他们决定在农民家里留宿，休息一段时间。在经历过一番考察后，父母的提议得到周伟和妻子马晓燕的支持。

“5月1日，上海的天气已经有些炎热初夏的气息，我感觉高坪还是一片春天的景象，温度适宜，空气清新，父母早年插队下乡时认识，很怀旧，喜欢这样的农村。”周伟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起父母当时决定留下的情景。

5月3日，周伟带着妻子和女儿，拉着一后备箱的蔬菜离开高坪回到上海，父母在高坪住了两个月后，周伟全家再一次来到高坪。两天后，他独自一人回上海。

这一次，女儿和做教师的妻子也留在高坪。“上海高温，高坪不用空调，夏季平

均气温 23 度，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周伟说。

“如果把上海 80 平方米的房子出租掉，足够父母在高坪长年养老，而且吃得比上海好。”周伟说，父母在高坪一个月吃喝住的开销不到 5000 元，相比上海来说，十分便宜。茶树坪村的干部说，如果一户村民家里能有两对老夫妻长住半年，收入也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遂昌县旅游局副局长黄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遂昌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年团的驻村旅游发展迅速，“前几年遂昌旅游的旺季是 3 月到 10 月，现在淡旺季已经难以区分，很多上海杭州的老年团到遂昌来常驻，有的住七天，有的半个月，甚至一些老人长住山上，春节就带着家里人一起到农家过年。”

农产品销售也被带动了起来，这位 80 后的旅游局副局长主动与淘宝开展合作，开设遂昌农产品馆，从《舌尖上的中国》的冬笋，到高山梯田糙米、豇豆和高山蔬菜，热销不断。“冬笋需要订购，其他农产品也在源源不断地供应城市市场，我们通过淘宝数据分析，购买遂昌农产品的客户基本都来遂昌旅游过。”黄颖说。

养老行业新契机

类似茶树坪村的旅游小村，已经成为遂昌乡村旅游的新特色。四周群山环绕，翠竹绿树环抱山村，整洁的新农舍，勾勒出一幅农家山水画。

在茶树坪村的定居点，本刊记者看到二十多幢崭新的叠拼安居别墅，这些房子都是新造的移民安置房，由丽水市补贴部分资金，村民自己再出一点，统一建造而成。

这些农村别墅，楼上的房间都改成标准间接待旅客住宿，为规范市场，村里实行了统一接团、统一标准和统一价格，避免了经营户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这里的农家乐被划分为五个服务点，每个服务点由五户经营户按就近原则组成。经营户负责各自游客的起居，每天的菜肴则由服务点内的五户经营户按统一的标准轮流准备。

2013 年 4 月初，来自江苏、浙江、上海老年旅游联合体的 50 余位成员曾来高坪踩线，对高坪的乡村休闲旅游赞不绝口，约定回去后将高坪纳入到老年人养生养老的联系点。

丽水市发改委副主任兼养生办专职主任王平一直关注着高坪乡农家养生游的发展，看上去更像一位学者。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时代不同了，曾被称为“浙江西藏”的丽水，如今反而更具优势。

2008 年，丽水在全国所有地级市中率先把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全市发展战略，为生态休闲养老经济发展奠定了理念基础和共识。

这里有着“华东氧吧”、“浙江绿谷”、“浙南林海”、“六江之源”之称，森林、水能、农特产品、矿产、野生动物等资源总量均占浙江省首位。丽水全市 1.73 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80.79%、市区空气质量二级以上优良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 97.8%、地表水三级以上水质达 98.9%，几乎全市域的负氧离子浓度都在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清新空气”标准以上（1000 ~ 1500 个 / 立方厘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 8 年列浙江省第一、全国前列。

如果从地图上看，它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环台湾海峡城市群的枢纽结点之所在，该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民众生活最富裕的区域，让丽水可以充分利用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台湾等地市场。地处浙江省西南部的丽水，距温州市 126 公里，距金华市 122 公里，距杭州市 292 公里，距上海市 512 公里。

改变考核

但是多年以来，丽水的养生养老产业却发展缓慢，直到近年才发展起来。

这主要与过去的考核机制有关。

“公共设施都需要政府投入，造路修桥，开发景区甚至是到上海杭州等城市做推广，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可谓投资巨大，这些投资的收益可能数年后才能缓慢地体现出来，但是当养生养老产业发展起来后，主要的收益人是当地的老百姓，


无论是发展农家旅游，农家养老，政府要去收税的概率是非常低的，这都是藏富于民，干这个事情需要魄力和勇气。”王平说。

浙江省为支持丽水建设生态市的建设，将丽水与 GDP 数据考核松绑。

正处在开始发展阶段的丽水养生养老产业，得到政府的系统扶持。首先是项目的扶持，对于建设养生养老基地项目，可按不高于该项目土地成交价款的 40% 给予奖励，若重大项目，还可以有更大的优惠。在项目运营阶段，税收实行先征后奖的“五免五减半”政策，即自开始运营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全额奖励其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奖励。同时，实行用水、用电、用气优惠政策。

这些优惠的条件都有制约——禁止将养生养老房产变相转为普通商品住宅房地产项目。

本刊记者采访期间，恰逢丽水开展新农村清洁运动，王平说，以往农民对乡村清洁的积极性不高，乡村垃圾到处乱扔，风一刮满天飞，现在为吸引外地旅游，农民主动清洁溪流河道，将村庄收拾得井井有条。

“如果说有短板，那就是医疗条件还需要加强，这是下一阶段我们正要努力做的，丽水将努力培养自己的养生养老人才，过几年就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医疗和救援体系。”王平说。在丽水养生养老产业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到利用本地院校，加强养生养老人才的培养。



2014年1月8日至10日，新股发行重启第一周，3天共8只新股亮相

基金打新顶风逆行

在同一投研平台之上，同一家基金公司旗下不同基金对同一只新股的估值，差价竟达27元之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祁和忠 | 上海报道

新股发行重启以来，基金、券商等机构与政策的博弈惊心动魄。

2014年元旦之后，我武生物（300357.SZ）、新宝股份（002705.SZ）、纽威股份（603699.SH）、楚天科技（300358.SZ）等公司开始发行新股，各路资金云集，从网下询价到网下网上申购，都异常火爆，发行市盈率普遍较高。

按照“新股发行与募投资金挂钩、不足

25%的部分可以转让老股”的IPO新规，新股定价越高，老股转让规模就会越大。一些发行人的股东纷纷大量套现，一级市场屡现老股转让金额超过新股募资金额的现象。我武生物、楚天科技、炬华科技、全通教育的老股转让金额分别达2.85亿元、4.5亿元、8.59亿元、3.48亿元。

在暴利的诱惑与驱使下，事态急剧升级。1月9日，新股奥赛康（300361.SZ）发布发

行公告，拟募集资金金额 7.93 亿元，而大股东套现金额高达 31.82 亿元。发行人大股东与保荐人犹如毫无节制的巨兽贪婪而凶猛。

面对大股东的疯狂套现，监管层紧急出手，暂停奥赛康的发行。1 月 12 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给 IPO 新规“打补丁”，并随即对新股发行过程进行抽查，抽查 44 家机构询价对象及 13 家主承销商。

此后，迫于监管压力，一些发行人与保荐人通过大比例剔除最高报价，把发行价格市盈率控制在不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的水平，多只剔除比例竟高达 90% 以上，类似奥赛康的巨额老股转让没有重现。

按下葫芦浮起瓢。1 月 21 日以来，深市新股分批上市，普遍遭到暴炒。新股上市首日大多以发行价的 120% 上限开盘，盘中两次“秒停”，收盘涨幅达 45% 附近上限。

针对新股发行改革，上投摩根研究部总监王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从中长期看，发行制度向市场化的注册制已迈进了一大步，多个重要环节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比如，发行监管部门对发行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内容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不对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作出判断。这一点已非常接近注册制的实质。再如，核准发行后，新股发行时点由发行人自主选择。发行价格也给发行人较大自主空间。并且引入主承销商自主配售机制等。

“从实行的初期结果看，市场化机制还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但相信新制度效应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着参与者逐渐适应新规则，以及批量新股上市，新股市场将会逐步走向规范和理性。”王炫说。

老股巨额套现

1 月 8 日至 10 日，新股发行重启第一周，3 天共 8 只新股亮相。然而，令市场始料未及的是，奥赛康的登场掀起滔天巨浪。

奥赛康于 1 月 3 日至 7 日进行网下询价，361 家网下投资者的申购报价被确认有效，报价区间为 23.50 元至 87.41 元。其中，广州番禺电力建设集团的申报价格为 23.50 元，

融通－惠理 2 号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的申报价格为 87.41 元。

根据发行公告，奥赛康的发行价 72.99 元/股，市盈率 67 倍，发行股份数量 5546.6 万股，其中，新股数量 1186.25 万股，上市公司计划募资 8.65 亿元，大股东南京奥赛康转让老股 436.35 万股，预计转让资金为 31.82 亿元。这意味着大股东套现金额是公司募额的 3.67 倍。

奥赛康大股东的巨额套现行为，引起监管层震怒。1 月 10 日凌晨，奥赛康发布公告称，“考虑到本次发行规模和老股转让规模较大，公司和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出于审慎考虑，经协商决定暂缓本次发行。”

在 19 家被确认提供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区间 72.99 元至 73.8 元）的网下投资者中，基金与券商占一半以上。其中，中海能源策略基金、中海分红增利基金的申报价格分别为 73.80 元、73 元，诺安灵活配置基金的申报价格为 73.77 元，广发证券、广发聚丰基金、广发稳健增长基金的申报价格分别为 73.2 元、73 元、73 元。在奥赛康大股东企图大规模套现过程中，基金一马当先，欲充当主要接盘者。

1 月 17 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作为一个新发行上市的公司，筹集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公司经营发展，如果在一级市场发行大部分资金被大股东拿走，显然有违 IPO 的初衷。同时，控股股东是公司信息的优势者，在 IPO 时就过多减持，容易引起投资者对控股股东行为及其影响的种种猜疑。因此，奥赛康的暂缓发行是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也是符合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要求的。”

其实，新股发行重启之后，老股转让是普遍现象。奥赛康之所以被暂缓发行，其原因在于老股转让规模特别巨大，备受投资者质疑。

据统计，迄今约八成启动公开发行的公司都有老股转让，在股份发行总量中的占比约达四成。例如，我武生物公开发行股份 2525 万股，其中，发行新股 1100 万股，募集资金 2.20 亿元，老股转让 1425 万股，转

让资金 2.85 亿元。发行人股东浙江我武管理咨询公司、天津东方富海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利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上海德东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按发行前持股数等比例转让。

再如，炬华科技公开发行股份 1988 万股，其中，发行新股 428 万股，募集资金 2.35 亿元，老股转让 1560 万股，转让资金 8.59 亿元，达新股募集资金的 3.64 倍。发行人大股东杭州炬华实业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敏华，以及其他个人股东进行等比例转让。

一位市场人士认为，虽然老股转让规则由海外引进，但在国际成熟市场并不经常使用。因为在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时，大股东或内部人如果大举套现，往往会被视为不看好公司的标志，从而影响公众投资者信心和公司估值。他说：“在国内，老股转让频频发生，使得这个适用于国际市场的规则被严重扭曲，确实令人困惑。”

网下询价“价低者得”

针对基金、券商们的高价打新狂热，证监会制订了专门的法规条款予以防范。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 6 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采用询价方式的，网下投资者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该措施未能起到有效的降温作用。

例如，良信电器（002706.SZ）公开发行 2154 万股，正好满足《证券法》中公众股本须达 25% 以上的要求。按照 3.76 亿元的募资计划，在不进行老股转让的情况下，良信电信把发行价定为 19.10 元。19.20 元及以上的申购报价被剔除，所对应被剔除的申购量占比高达 80.46%。

进行网下询价时，永安财产保险、华福证券等表现激进，它们的最高申报价格分别为 38.40 元、37.45 元。

在奥赛康事件发生后，证监会进一步加强过程监管，发行人的老股转让比例和发



证监会紧急叫停奥赛康，新股IPO第一次出现中止发行

行价格市盈率双双下降，但剔除的最高报价所对应的剔除申购量占比蹿升，多只达90%以上。

绿盟科技的发行价格为41元，把申报价格在48.7元及以上的初步询价申购予以剔除，占累计申购总量的92%。宝盈、博时、大成、景顺长城等公司旗下多只产品都曾高价打新，被全部剔除。

博腾股份的发行价格为25.10元，把申报价格在25.90元及以上的初步询价申购予以剔除，占累计申购总量的94.24%。开源证券、东海证券、齐鲁证券、信达证券等公司旗下多只产品都曾高价打新，亦被全部剔除。

据统计，新股发行重启以来，近一半机构网下报价对应的申购量最终因高报价而被剔除出局。其中，高报价剔除量占比最高的为众信旅游，达96.33%。

新股定价剔除的最高报价超过90%的情况，引发市场质疑证监会调控发行价格，造成“价低者得”的怪异局面，与市场经济中“价高者得”的普遍规律背道而驰。申银万国首席分析师桂浩明指出，控制“三高”是必要的，但这只能以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进行，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而不是采取变相的行政措施，让匪夷所思的价低者得成为新股定价的基础性要求。

张晓军在1月17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则回应说：“如果网下投资者报价偏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为合理定价，参照二级市场一般估值水平，较多剔除最高报价部分，使参照市场一般估值水平的报价成为有效报价，也是现行规则所允许的。”

疯狂打新谁得益？

对于各大基金公司，证监会一直呵护有加。《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9条要求，不低于40%的网下发行股票，优先向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配售。但是，部分基金公司不负责任的打新行为，却把监管层频频置于难堪与尴尬的境地。

2014年以来，在疯狂打新的基金中，国联安基金公司赚足眼球。

国联安安心成长基金成立于2005年7月13日。按照契约，在正常市场情况下，该基金的资产类别配置的基本范围为：股票资产5%至65%，债券资产不低于20%。不过，截至2013年底，国联安安心成长基金的股票与债券资产占比分别仅占0.45%、1.86%，均远低于契约规定的下限。该基金之所以大幅降低股票与债券资产的比例，主要是为打新股。

在首批3只新股新宝股份、炬华科技与楚天科技发行过程中，国联安安心成长就累计投入6.96亿元申购资金。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1月24日，国联安安心成长已累计打中7只新股，累计申购金额16.85亿元，累计已获配金额1.34亿元。

虽然打中新股数量位列各基金之首，但随着大量套利资金涌入，老持有人的收益被大举掠夺。据测算，在短短20多天内，申购国联安安心成长基金的套利资金达20亿元。截至1月24日，该基金的单位净值为0.597元，与2013年12月31日的0.589元相比，仅上涨了不到1分钱。

也就是说，基金持有人的获利微乎其微，而国联安基金公司自身则名利双收。

在我武生物的网下发行过程中，唯一100%获配的是国联安-吾同-灵活配置分级7号计划，其引发的关注更高。吾同投资的3个合伙人，有两人曾在闽发证券工作，是我武生物的主承销商海际大和证券总经理马飞的昔日同事，这引起市场关于涉嫌利益输送的广泛质疑。

1月24日，在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在被问及我武生物承销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时，新闻发言人邓舸说：“我武生物的主承销商海际大和也在抽查名单之内。目前正在核查中。”

基金打新中的种种荒唐与怪诞不一而足。在奥赛康的网下询价中，富国基金旗下共有7只基金参与网下询价，申报价格分布于55元至82元之间。在同一投研平台之上，同一家基金公司旗下不同基金对同一只新股的估值，其差价竟达27元之大。作为基金“老十家”以及上海两大市属基金公司之一，富国基金在新股申购方面却表现得混乱不堪。中邮、中欧等基金公司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一位不愿其公开姓名的基金公司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表示，新股“三高”再次出现，一是由于询价机制依然鼓励竞相报高价；二是IPO暂停一年多后重启，投资者打新热情高涨；三是高发行价有利于发行人和承销商。他建议应用新股上市后三个月的价格与发行价相比较，如果严重破发，要追究承销商责任，从而提高承销商的责任心。

然而，新股发行市场的种种怪现状，不仅是发行人与主承销等卖方的责任，基金、券商等主要买方同样难辞其咎。如何提高国联安、富国等基金公司在基金管理上的责任心，切实维护持有人利益，这仍是横亘在监管层面的一道难题。☞

财税体制改革



财权格局新博弈

解决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可从财政改革入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特约撰稿何盼娅 | 北京报道

“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都与财政有关。”在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眼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繁复的财税改革重绘路线图，针脚清晰而不失细密。

“财税体制改革中深层次的、根本的、

关键的、核心的问题是财权事权定位划分和匹配。”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未提“财权”，“但并不否认适度地划分和分配财权，这是未来需要探讨的

重点；而事权财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配置和划分，是现在没有解决的。”

对于《决定》中所明确的“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甘功仁看来，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格局“是不能大改的，最多只能是小的改变”。

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的财税体制改革如何以小改动撬动大格局，尚需拭目以待。

财权、财力、事权“倒挂”

刘剑文注意到，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提法，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作为基本原则、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其实是处在不同的维度”。

财权是指各级政府依法享有的筹集收入的权力，主要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财力是指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以货币表示的财政资源，来源于本级政府税收、上级政府转移支付、非税收入及各种政府债务等；事权，是指一级政府在公共产品或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没有提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并不意味着否定。”刘剑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目前的新提法将事权调整放在优先位置，传递了权责统一信号，反映了下一步改革的思维。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是财权定事权，优先调整财权，再根据财权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第二种意见是以事权来定财权，也就是说要优先理清事权，再根据事权来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刘剑文说，目前的提法实际上是采取的第二种，“这和我们国家的实际需求是相适应的，目前我们国家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范围划分随意性较大，而且标准比较模糊。”

“划分事权，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也是整个政府改革的前提和起点。”施正文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

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

“还需要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事权，1994 年分税制改革只是在中央和省之间大致有了划分，但是没有出现省以下各级政府，越到地方支出责任越大，事权越多。”施正文说，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明确导致责任不稳定、政策短期化。

“目前财权也是越到地方越小。地方几乎没有财权。”施正文说，1994 年分税制改革，提出“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这个提法到现在还不落后，但后来慢慢偏离了这样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提出了合理分权但并没有向地方下放税权，现在所有的税收权限几乎全在中央。”

“财力上地方和中央倒挂，中央收入多，地方收入过低。”施正文说，现在地方政府自主财力太少，多数都依靠上级财力的转移支付。

施正文认为，处理好财权、财力和事权的倒挂问题是解决财政体制不合理、地方财政困局的关键和根本保障。

刘剑文给出了未来改革整体逻辑的“四部曲”，“第一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关系；第二，按照事权来界定支出责任；第三，根据支出责任合理配置财权；第四，要落实税收法定主义，最终实现走向财税法治。”

分税制争议

现有地方和中央财力格局，与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

2012 年 3 月 8 日下午，全国人大广东团分组讨论的现场，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地税局局长王南健率先开腔，“分税制一定要完善。”

“100 元的 GDP，中央就拿走了 55 元。”王南健直陈，“上头点菜，地方埋单”的现实令地方政府苦不堪言，“为了完成不停加码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甚至是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

而对于分税制改革确立的通过转移支付实现政府间财力再次分配的做法，王南健认为“这个问题就更大”，“中央拿走的钱，用于专项转移支付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是‘跑



部钱进’的根源。而转移多少就看关系，结果造成很多浪费。”

这场被官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

“1994 年前是财政大包干体制，中央和地方是一种契约关系，上交完以后都留给地方，出现了中央向地方借款来维持中央宏观调控的财力需要。”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所长贾绍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贫弱的局面迅速改观，增强了中央转移支付的能力和宏观调控的能力。“如果用历史眼光看它，怎么评价其功绩都不为过。”刘剑文告诉本刊。

不过，刘剑文认为，随时间推进，这场以行政为主导的财政体制改革，“其弊端、不可持续性、不协调性、不平衡性也逐渐显现。”

“分税制是一种分权、分财的改革。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得太多，关注财权多于关注事权，造成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或者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造成‘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等问题。”刘剑文说。

另一个在分税制财政改革中未明确的问题是，除了税收，“政府在收费、国有企业的利润、政府性基金等多方面也有收入，然而这些在改革中没有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也忽视了对财政支出的管控，因为是行政主导，

透明度不是很强，预算起的作用有限。”刘剑文说。

这场已走过 20 年的财税改革，“利益越来越复杂、固化了。”刘剑文说，财税体制不仅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立法与行政的关系，“要调整这些关系，难度是很大的。必须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即法治，打破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利益。”

地方负债现实

地方债务加重和地方财力紧缺，被认为是分税制的一个直接后果。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的办法后，原属地方支柱财源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增值税的 75% 和消费税的 100%）上划为中央收入，由中央给予地方税收返还，返还额以各地上划中央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增长率为基数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 1 : 0.3 系数确定。

2002 年，中央将日益壮大的所得税纳入分享范围，即将原来属于地方税收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归属，个人所得税 100% 归地方）变为共享收入，实行比例分成，中央占 60%，地方占 40%。

这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对营业税进一步倚重。营业税作为中国第三大税种，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收，其中建筑业又是第一税源。2003 年以后，土地开发、

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上的财税驱动力即由此产生。

2013年两会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央债务规模在7.7万亿元左右,地方债10.71万亿元,考虑到部分地方债存在一定浮动性,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之间。

2013年6月,审计署发布区域性地方债务抽查报告。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85万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其中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

以武汉市为例,据《经济观察报》2013年8月报道,武汉市2010年-2012年6月,累计直接债务4371.8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3763.65亿元占86%、发行债券271.48亿元占6%、转贷债务93.32亿元占2%、专项借款42.39亿元占1%、其他201.02亿元占5%。其融资方式中,银行贷款约占总债务的86%。

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债务过高的情况引起广泛担忧。而2013年12月4日,美国联邦法官批准底特律的破产保护申请,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保护城市。底特律魔咒会否发生在中国地方政府身上,比如曾肩负中国最富城市和“鬼城”双重称号的鄂尔多斯,其负债总额坊间流传不同版本,从1000亿元至4000亿元不等。

“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真正到揭不开锅的时候,上级政府还得替它善后。”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朱大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正因如此,中央政府才有必要更多地掌握一些财力,“万一出现问题,还有抢救的能力。”

“可以说有的地方政府接近破产边缘。但我们不会出现破产的方式,会救济,会控制财政支出。”中国人民大学财税法研究所所长徐孟洲对本刊记者说,但需要警觉,“应该对地方政府债务摸清楚,哪些是确实无力偿还的,哪些是能一定时间内偿还的。”

中国审计署2013年7月28日发布消息称,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中新网记者从审计署相关负责人处证实,审计署于8月1日起全部进点。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2013年9月5日曾在G20峰会上表示,将在10月公布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但迄今未公布。

财权会否下放

徐孟洲告诉本刊,解决地方负债的长远办法是明确事权,并配以相应的财权,“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等,财政收入不稳定。要选择一些适合地方的税,配给它。”

施正文也持同样看法。“地方政府财权很小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预期安排工作,就会产生不确定性。”要使财力与各级政府事权相匹配,就必须赋予其财权,“中央与地方,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应该划分财权,不能回避财权。”

“并不能笼统地讲中央是否会下放财权,财政权进一步分解为财政立法权、管理权、归属权,我觉得财政权主要还是要掌握在中央,包括财政的分成比例,中央应有适度的比较强的财力,这样才能进行转移支付,调节各地差别,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朱大旗告诉本刊。

不过,他认为:“肯定会有一些结构性调整。在具体税种收入划分方面会作一些改革,中央的比重肯定应该降低,比如‘营改增’完成后,是不是应该考虑增值税中央地方六四开或者五五开。另外,房产税显然是适宜于归属地方的税种。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来理顺中央地方的收入划分。”

“可能会有一定财权下放,但是量不会大。”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曹明星这样预估,“以法律乃至财政税收基本法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行政的方式,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在确保中央与地方全局利益前提下,要给予地方适当的财税立法权、管理权、归属权。首先当然是通过人大立法来明确,其次,优化税种结构属性,将部分税种使用权给地方,部分税种可以考虑共享。”贾绍华告诉本刊。

哪些税种改革直接影响央地财政关系

未来哪些税种改革将对央地财政关系造成直接影响?

2013年8月28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下一步工作安排时表示,将继续深入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包括加快营改增、消费税、房产税以及资源税等重点税种改革。

“营改增”在优化现行税制结构的同时,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将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地方税收收入会明显减少;其次,企业货劳税负担下降,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税收收入。”贾绍华告诉本刊。

2013年8月2日财政部公布八省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时间表,北京市应当于9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其他省市为,江苏省、安徽省10月1日,福建省、广东省11月1日,天津市、浙江省、湖北省12月1日。

八省市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政策适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1〕111号)等基本文件。文件明确,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管。

在施正文看来,营业税曾是地方重要税源,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的扩大,当前采用的过渡办法不是长久之计。

房产税改革被认为是另一项牵动地方税体系未来的税种,“同样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有着直接影响。”贾绍华说。

“显然房产税是适宜于归属地方的税种。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来理顺中央地方的收入划分。”朱大旗说。

对于税种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关系的方案目前尚未清晰。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钢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曾建议,可以把增值税、营业税打包看成一个中央、地方共享税,一般来说,分享比例中,中央占比稍高,利用其中一部分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

徐孟洲认为,根据中央和地方事权确定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划分,对共享税采取差别对待,“比例可以浮动,不要一刀切。财政收入比较富裕的地方,比例低一点;比较贫穷的地方则高一点。这样操作起来稍微复杂一些,且这个差别化是动态的,对该支持的地方扶植了好多年后,又可以适当削弱一点。这样财权和事权可能更相适应。”

贾绍华的设想是2015年完成“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尽可能通过立法来解决营改增以后的一些过渡性问题;房产税立法应该建立财产税制;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对消费税要重新来认识。”



张海

张海在哪里

截至2011年出狱，张海实际服刑时间不足6年

文 | 朱兰

他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健力宝董事长，后因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获刑15年；他曾经在监狱服刑，后来经两次减刑假释出狱；其家人说要“人们都遗忘了这个人”，但如今他却重回公众视线。

失踪外逃的健力宝原董事长张海日前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1月20日，广东省检察院对外证实，张海已逃往境外。据悉，截至目前，广东韶关、佛山已有多人因涉案被查，并移送司法处理。

造假立功获减刑

张海涉嫌造假立功减刑并外逃的信息出自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黄武之口。

2014年1月18日，广东省政府委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黄武在参加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时被代表委员问道：张海的情况怎么样？黄武说，张海进看守所的时候就开始作假了，现在已经对他进行重新立案。黄武还说，“现在张海这个人已找不到了，有可能跑到国外了。”该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旋即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实际上，早在1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张海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立功、重大立功表现均属虚假，以此裁定对其减刑错误。韶关中院依法重审并于2013年10月31日对张海两次减刑的裁定予以撤销。广东高院同时认为，该案原生效判决认定张海有立功表现的事实也可能有误，目前已立案审查。

而这距离张海2011年获假释出狱，已有两年多的时间。

低调出狱

2011年的农历正月初三，服刑6年的张海悄然出狱。一改入狱前的张扬风格，张海此次出狱极为低调。

据《南方都市报》当时的报道，张海的秘书与家人都提出，希望不要报道张海出狱一事，希望“人们都遗忘了这个人”。张海女友黄鹭说，张海出狱后先回到老家看望亲戚朋友，报个平安。姥姥见到他很高兴，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既来之则安之，好在平平安安顺利过去了。过去的风风雨雨，就当是人生中的一个教训。不管怎样，接下来的工作，他会更扎实一些。”

张海悄无声息地过了两年，直到2013年年底，他的名字再成热点。《南方都市报》报道称，2013年11月，韶关乐昌市人民法院向媒体通报，佛山市看守所原副所长罗某为在押人员提供检举立功的线索信息，使之受到较轻的追诉，收受在押人员贿赂18万元，被该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2万元。

两年前出狱的张海正与此案有关。根据通报，2006年下半年，原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某找到时任佛山市看守所负责深挖扩线工作的罗某，要其为他的当事人张保（化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寻找检举立功线索材料，并送给罗某好处费3万元。罗某便利用职务便利，将一条抢劫案的线索告知张保，并将涉嫌抢劫犯罪的嫌疑人张磊（化名）调至张保同一监仓，由张保检举张磊。佛山市看守所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张保在押期间具有立功的书面意见，省高院二



赵世曾

香港地产大亨、卓能集团主席赵世曾日前公开表示，将豪掷10亿港元作嫁妆，为女儿招亲。赵世曾的大女儿赵式芝于2012年与同性女友结婚，成为首对公开承认同性婚姻的香港名人。

爸爸不要逼女儿重婚嘛。

道恩·赫尔

英国莱斯特郡的女子道恩·赫尔在泰国度假期间，捕获一条重达110公斤的淡水鱼，创下了女性钓到最大淡水鱼的世界纪录。

这“年货”怎么带回老家是个问题。



帕克

美国女子帕克以平均104.35分贝的打嗝声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打嗝最响的女性。帕克说如果将分贝测试器放到她的嘴边，会有128分贝，跟摇滚音乐会或是飞机引擎声差不多。

你的耳膜还好吗？

陈先生

重庆陈先生使用3台电脑每天半夜1点同时刷票，预订2月8日到10日前往湖南长沙的卧铺票。可连续几天，陈先生都没有买到票，这可愁坏了一家人。

为了路上睡个好觉，几天没睡好觉。



审据此认定张保有立功情节，改判张保有期徒刑 10 年。

通报中的张保就是张海。该案一经见报，即有法律界人士提出，既然张海所揭发的线索已为相关人员所掌握，因此应认定此为假立功，广东省高院有必要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二审结果进行改判。

一旦启动相关程序，张海恐难逃重回牢狱的命运。但如今张海到底在哪里？

少年“神人”

2005 年 5 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分上下集“揭秘”张海，该台记者分赴河南开封、广东佛山、三水等地，采访了当地群众、张海的邻居、同学、同事、社会学者、专家等诸多人士，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揭穿了健力宝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海的本来面目。

在张海的出生地河南开封，他的名字无人不知，大家都说，张海十几岁就成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可经过探究，他的所谓“特异功能”其实不过是些简单的魔术。

张海曾就读于开封第十三中学，但他没有毕业。张海父母见儿子成绩不好，就提前为他寻找出路，当时正赶上河南大学办的武术班招生，于是就把他送进了河南大学武术班。担任武术班班主任的张宏梁回忆起张海，说他既没有武术特长，也看不出超常的智力，可就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突然传出消息：张海有了特异功能，成了气功大师。

张海经常在公众场合表演特异功能。他最拿手的两个表演项目：一个是把树叶放进嘴里，拿出来后树叶就变小了；另一个是用意念拨表，可以把表针拨快或拨慢。这些神奇功能让他得到了街坊邻居的崇拜，很快他的名气就从开封向四周传开。

张海出名的时间是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社会上流行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张海“聪明”地把握住了这个契机，四处搞起了带功报告和治病救人活动。但就在张海“大师”四处作报告的时候，气功大师招摇撞骗被全国各地举报，有关部门开始调查。

但张海却没有“倒下”。他消失一年后迅速找到了新头衔，而且身份更为神秘。

河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卢广森介绍说：“张海说到西藏拜过老师，还说夏目东是他老师，在五台山时正式给他加了一个法帽。”张海以“藏密大师”的身份再次回到河南，主动找到河南省社科院，要求合作成立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

1992 年 12 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挂牌开张，张海出任所长。那年他 18 岁。

在 1993 年录制的一盘录像带上，张海自称深得藏密真传，已经法力无边，“很多癌症、肝硬化、肿瘤等病人，在我们讲课发功，并且教他们练功之后有一部分病人彻底痊愈了”。

那个时期，张海热衷于作带功报告。了解张海的人认为，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时挖到的。当时全国各地请张海作带功报告，根据 1993 年张海讲课时提供的宣传资料上的数字，他到 1993 年春就已经给数十万人讲过课，按最低标准每人 40 元的初级班计算，10 万人就是 400 万元。

在张海声名显赫之时，他结识了一些粤、港富商，这让他受益颇多，其中一些还成为他日后商海生涯中的重要合作伙伴。手中有了一定资本，加之当时气功开始走下坡路，于是张海宣布要退出藏密气功的舞台，考虑转型。

1995 年，张海举家迁居广州，退出“江湖”，一下就投入到资本市场。

28 岁入主健力宝

据河南省工商局的企业登记资料显示，1996 年 11 月 27 日，张海联合其他股东筹资 1999 万元成立河南心智实业有限公司，张海出资占 50% 股份，出任法人代表和董事长；1997 年，张海又发起成立了河南菩提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张海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6 年，张海和他的另外两个伙伴筹资 1 亿元改组了中航科技下面的一家财务顾问公司，即现在的深圳凯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0 年 4 月，凯地公司借收购深圳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之机，入主由国内 36 所名校发起成立的上市公司中国高科，一个月后，

张海担任了中国高科董事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其实那时外界已对其语焉不详的资历开始质疑。2001 年，频频得手的凯地又先后介入了银鸽投资、深大通和浙江国投。须臾间，“凯地系”以资本链捆绑的关联公司总市值已超百亿元，令人瞩目。

2002 年初，张海又以浙国投的名义“闪电收购”健力宝，任董事长兼总裁。

据悉，当时与广东省三水市政府的交易约定是，75% 的股权所作价的 3.38 亿元将分三期注入三水公投账户。然而据《财经》报道，张海当时两手空空，他支付的钱都是短期融资，其中首付的 1 亿元资金是通过国债回购而来的。后来，张海找到祝维沙，借后者资金入局，将之前自己短期拆借而来的 2 亿元资金解套。工商资料显示，2002 年 3 月 20 日，佛山市三水正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股东为张海、祝维沙、叶红汉三人，三人所持股份比例为 4:3:3。三人商定以正天科技名义出资，接盘健力宝。

此后，浙江国投名下的健力宝饮料厂 100% 的股份被全部过户至正天科技，张海之前支付的股权收购款撤出，祝维沙的 2 亿元打入了三水公投的账户。借祝维沙之力，张海得以掌控健力宝。

据公开报道，张海掌舵健力宝前期，多有“大刀阔斧”之举，也曾力推饮料主业。但后期，他转以健力宝品牌展开资本运作。

据健力宝内部人士介绍，张海时代的健力宝主要投资经营行为包括：整合营销网络，实施深度分销，建立品牌旗舰店，在各地成立业务代表处；在四川设立分厂；品牌投资；战略投资托管了河南宝丰酒业；买下了深圳足球俱乐部。

对于自己的功过，张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健力宝期间，不仅在金融投资方面，在实业经营和战略投资上，他都是成功的。但事实却显示，截至 2004 年 8 月，健力宝集团的总资产 45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 30 多亿元；负债方面，银行负债约 22 亿元。而 2003 年年报时，账上还有几亿元现金。不仅如此，2004 年供应商开始停止供应原料。

于是，在 2004 年 8 月 26 日，健力宝集

团董事会的祝维沙、叶红汉二人联合召开集团董事会，作出免去张海集团董事长的决定。

这期间有关张海的传言颇多，也曝出“张海被调查”、“张海被刑事边控”等多个消息。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05年3月25日，以“张海昨天被警方拘留审查”而宣告结束。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3月的报道，张海被拘，与他与祝维沙的一番争斗不无关系。

减刑牵涉到公安法院系统多人

2005年3月24日夜里，张海在广州某酒店吃宵夜时被捕，一同被拘的还有健力宝原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曹庭武、原投资管理部投资总监郭建函。

3月26日，广州几乎所有的日报均以大篇幅报道了张海被拘留的消息。


同年5月18日，因挪用资金，张海被正式批捕。随后，他历经了长达22个月的羁押过程以及两个多月的审理。

2007年2月12日，佛山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海在担任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总裁期间，为支付其购买广东健力宝集团购股款所欠债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指使他人以划款并虚增库存平账和以投资为名转移支付等方式，先后侵占广东健力宝集团资金1.2亿元，挪用资金8644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张海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5年。

张海不服，提出上诉。

2008年9月，广东省高院二审认定，张海检举揭发了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他人在佛山市禅城区入屋抢劫致人死亡的事实，构成立功。故二审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将原审判决的15年改判为10年。

此案当时便引起质疑，认为张海能够减刑是因为走后门、假立功。但在随后的服刑期内，张海又有重大立功表现，获得了4年减刑。

截至2011年出狱，张海实际服刑时间不足6年。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央视、新华网、《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北京青年报》等)



樊特谟

近日，南京军区某工兵团组织了一场对抗比武，筑城一连下士樊特谟技压群雄，以2902个俯卧撑的优异成绩一举夺得桂冠，创下了该团俯卧撑项目的最新纪录，并赢得了“俯卧撑王子”的美誉。

咱们军人有力量！

中国妈妈

1月14日，澳大利亚华文报纸《墨尔本日报》在头版刊出一则中国妈妈劝儿子回家过年的广告：“鹏：打了好多次电话你也不接，或许在这里才能让你看到。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今年回家过年吧！爱你的妈妈。”

儿啊，不成家总得回家吧。



贝卢斯科尼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日前进入养生中心减肥，准备向政坛再进发。77岁的贝卢斯科尼现结交了一个比他小49岁的女友，他打算减肥7到8公斤。此外，贝卢斯科尼还称，对方也应该减肥，上镜头会比较好看。

看来政坛和爱情一样不欢迎胖子。

田玲

陕北清涧57岁的田玲被牙疼折磨了19年。无奈之下，她相继拔了15颗牙。然而，吃过药、拔过牙、做过手术的她，如今才发现根本不是牙的问题，而是三叉神经痛。

拔牙的医生该去检查一下良心了。





2014年1月25日，俄罗斯卡尔斯梅克，2014索契冬奥会火炬传递，火炬抵达佛教圣地卡尔斯梅克

马年，世界各国都什么样

一些国家经济逐渐驱散阴霾，人们的日子开始好转，社会生活重现活力，乐观情绪又出现在人们的脸上。而体育正是安逸时代最好的挥洒激情方式，因此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在谈及2014年的展望时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体育

文 | 张燕

马年的新春开始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都适用。新年伊始，各国领导人都借着给国民拜年的机会，给拥趸们描画出一幅美丽的图景。

各国领导人风格不同，他们的表达方式也大相径庭。有些人会因袭《国王的演讲》套路，发表一番广播电视讲话，也有人并不露面，干脆在网络上发一篇博客告知天下。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老家夏威夷穿着T恤衫，戴着太阳镜，很随意地说：“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2014年。”而在滑雪中受了伤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则不得不拄着拐杖出现在公众面前。

虽然各国领导人表达新年展望的形式各异，但内核却一脉相承，拜年话里都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毕竟拉升支持率是第一要务。不过，如果仔细审读领导人发言的字里行间，也能捕捉到几分大人物们关心的方向、重点，以及2014年世界各国的具体构想。

指天画地拼经济

不需要去白雪皑皑的瑞士高山小镇达沃斯，在一月就能听到不少有关全球经济告别阴霾、重见阳光的“好声音”。全球排名靠前的几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都获得了强劲的增长，这意味着在世界经济产出中占一大半份额的国家进入可持续的增长轨道，财政平衡也有所改善，这种五年来最佳的宏观经济环境让不少领导人都喜上眉梢。

欧元区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过程，同时也是德国影响力不断膨胀的过程。已有“欧洲女王”之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自信满满地告诉民众，德国的失业率创下最低纪录，在全球艰难的竞争环境下依然能够维持竞争力。

英国的经济状况比德国还要乐观，有报告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十年后英国将超越德国重新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新年祝福中，英国首相卡梅伦告诉民众，英国经济已经开始好转，政府将继续实施现行经济计划，并加倍努力全面落实。他声称，“我们将削减所得税，冻结燃料税，尽全力让辛勤的劳动者感到财政稳定。”

当然，也不只是那些已经跨出经济衰退泥潭的国家在欢呼，还没见到任何起色的国家往往更需要一些乐观主义精神。作为欧洲大陆四大经济体之一，法国是唯一经济下滑的国家。2013年12月，法国服务业产值跌至2013年下半年的谷底，法国制造业产值也急剧下降。麦盖提经济学的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廉森称，所有数据，以及法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表明，法国可能在2013年底开始进入经济萧条期。

面对困境，法国总统奥朗德总要拿出对策来，而他给“法国病”开出的药方包括减缩公共开支，在所有可能节约的地方进行节约。他表示将要简化企业和个人的生活，政府将采取措施缩减法国的官僚机构，以便吸引外来投资。奥朗德认为，法国的政府支出依然过于沉重和昂贵，“法国的竞争力遭遇了10年来最大幅度的减弱，同时结构性贸易赤字问题也很严重。”因此，他计划在2017年削减500亿欧元的政府支出。奥朗德说，这是让法国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更现代和更灵活的前提条件。

对于法国失业率严重的现象，奥朗德曾经希望迎来在2013年

拜年话里都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

风尚

2013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的瀚霖杯2013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2014年1月24日揭晓。

1 人类探测器历史性地飞出太阳系

美国航天局2013年9月12日宣布，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已经飞出太阳系，目前正在寒冷黑暗的星际空间中“漫步”。人类，迎来向星际空间进军标志性的第一步。目前，该探测器距太阳约190亿公里，但仍暂时受到太阳的影响。

2 首次3D打印出“活体组织”

研究人员创造出一种水滴网络，利用一台3D打印机，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将这些小水滴组装成为一种与胶状物类似的物质，从而能够像肌肉一样弯曲，并能够像神经细胞束一样传输电信号。研究人员说，这样打印出来的材料其质地与大脑和脂肪组织相似，可做出类似肌肉样活动的折叠动作，且具备像神经元那样工作的通信网络结构，可用于修复或增强衰竭的器官。

3 世界第一台碳纳米管计算机建成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利用新设计方法建成的碳纳米管计算机芯片包含178个晶体管，其中每个晶体管由10至200个碳纳米管构成。不过，这一设备只是未来碳纳米管电子设备的基本原型，目前只能运行支持计数和排列等简单功能的操作系统。专家认为，受限于硅自身性质，传统半导体技术已经趋近极限，而这项新突破使人们看到用碳纳米管代替硅，制造出体积更小、速度更快、价格更便宜的新一代电子设备的可能性。

4 首次发现人类DNA存在四链螺旋结构

剑桥大学的尚卡尔·巴拉苏布拉马尼安等人在《自然·化学》杂志上报告说，过去研究者能在实验室中制出四链螺旋结构的DNA，但一直不知道这种结构是否在人体内天然存在，他们使用一种会发出荧光、只与四链结构DNA结合而不与普通双链结构DNA结合的物质，首次证实了人类DNA中也存在四链螺旋结构。对这一结构的研究将来也许会成为控制癌细胞增生的关键。

5 首次捕捉到太阳系外高能中微子

多国研究人员利用埋在南极冰下的粒子探测器，首次捕捉到源自太阳系外的高能中微子，中微子天文学从此进入新时代。从2010年开始，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与新西兰的200多名研究人员开始利用“冰立方天文台”捕捉中微子。

底前扭转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局面，但法国年底的失业率再次蹿升，全国失业人口总数超过 300 万。奥朗德建议创立一个“责任合约”，减少企业限制，以便能够最终减少失业人数。

对光彩照人的“金砖国家”来说，2013 年也是减速的一年，受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燃料进口增加和制造业者竞争力下降的拖累，巴西 2013 年贸易顺差降至十多年来最低，但总统罗塞夫认为，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巴西人民的生活水准并未发生倒退，国家在内外困难中仍取得积极进步，巴西经济已经重新步入复苏轨道。巴西政府表示，将支持个体及中小企业发展，推进盐下石油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牧业，努力提升教育和医疗水平，并加大反腐力度。

2014 年巴西政府会继续以控制通胀、保障财政平衡、改善教育和医疗服务为重点开展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巴西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做得并不出色，巴西通货膨胀率达 5.91%，高于前年的 5.84%。

“一战”爆发 100 周年的纪念

无论经济如何，生活仍在继续。因此各国领导人除了指天画地拼经济外，还要有更宽广的事业才能让民众感到信服。在这个议题上，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南非领导人祖玛呼吁民众继承前总统曼德拉的遗志，继续执行民族和解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为实现繁荣之梦而继续共同努力。祖玛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南非能与世界各国建立更为牢固的关系。

祖玛看重外交，而泰国看守内阁总理英拉则以内政为先，毕竟几个月来泰国政局的动荡和街头运动，甚至让总理不得不数次撤离官邸。英拉希望泰国能重归平静。她也承诺在当前局势下将继续认真工作，绝不气馁，保持忍耐，同时也将为国家恢复和谐尽力。

绝大部分国家在展望 2014 年时都看重繁荣和祥和，相比之下，日本的表现却有些“剑拔弩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这是应该朝着日本建设新国家迈出一大步的时刻。安倍还称，在日本和平宪法制定将满 68 年的现在，应该朝着把握时代变化的修改方向，进一步深化国民讨论。他还表示，将坚决保卫日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

安倍要“夺回大日本”，其中带有的倾向让人警惕。同样是对过去的回顾，德国就做得深刻得多，继续对历史进行反思。默克尔强调：“德国的进步始终依赖于欧洲的前进以及持久地克服主权债务危机。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75 周年，也是隔离德国和欧洲的柏林墙倒塌 25 周年。由最初少数人的梦想，通过了许多人的努力而为成千上万民众打造出欧洲这块和平之地。这再次证明了，如果相互信任、同心协力，我们可以努力实现任何目标。”

在领导人的新年许愿中，同样提到会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还有法国。奥朗德同样是站在欧洲的高度上谈论未来，他说，“绝不会任由那些否定欧盟，试图让欧洲各国回到各自为政的旧国界以图免受危机波及的人以及那些妄图退出欧元区的人所摆布。我愿成为一代代为了实现统一的欧洲的奋斗者的继承人。来年春季开始，我们



2014 年 1 月 14 日，巴黎，名为“战争中巴黎的日常生活”的一战主题展览举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爆发 100 周年

就会同德国一道采取措施为我们的联盟贡献力量。”

而当年参加一战的另几个重要国家中，英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年轻人身上。卡梅伦设定的工作重点是——“我们打算继续建设最佳学校，培养儿童和青年人技能，以便在他们离开学校时，能在人生道路上获得真正的机会。”

至于当年被列宁看成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俄罗斯，现在则还在继续和顽敌斗争。普京一脸严肃地宣称：“我深信会严厉并且有序地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直到将恐怖主义根除。”

体育成为特别关注

一些国家经济逐渐驱散阴霾，人们的日子开始好转，社会生活重现活力，乐观情绪又出现在人们的脸上。而体育正是安逸时代最好的挥洒激情的方式，因此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在谈及 2014 年的展望时不约而同地提及了体育。

2014 年，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世界杯将在巴西举行，因此体坛也会热闹纷呈。1 月下旬，巴西总统罗塞夫出席了东北部城市纳塔尔沙丘球场的落成仪式，在落成仪式上致辞说：“我很高兴看到球场这么漂亮，我很高兴工程耗资比预算少了 3%，而且球场还将获得环保认证”。

罗塞夫大谈对世界杯的美好展望。虽然当时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球场门口，抗议世界杯耗资巨大，认为世界杯动用的公共资金导致医疗、治安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减少，但这并不能阻挡巴西总统的好心情，发誓要举办史上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

对于足球王国巴西来说，成功的标准可以一言蔽之：夺冠，把大力神杯留在巴西。这固然能为黄衫军团的球衣胸前再添一颗金星，但更有利于巴西的经济。根据历届世界杯经济学统计数据表明，冠军争夺战获胜队的国内生产总值因胜利平均增加 0.7%——当然，这也要东道主真能过关斩将挺进决赛。

巴西人想着夺冠，而另外一些国家，觉得能在世界杯决赛圈露脸就是幸事，如果能有出色表现就更是赚翻了。

比如非洲小国加纳就成功出线，得到了一张通往巴西的门票。加纳总统马哈马对此表示很欣慰，新年伊始将这当作一件大事告诉民众：“即使有人曾经质疑他们的能力，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了世界大赛上，我相信他们，也相信我们的球队一定能在世界杯中创造奇迹！”

马哈马乐观地认为，加纳队有小组晋级的实力，因为“加纳队



2014年1月22日，巴西纳塔尔，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为纳塔尔当地的世界杯球场揭幕

同样是一支令人生畏的球队。有句老话叫，危急关头方显英雄本色”。他说，“我相信，加纳队将在巴西世界杯上再次闪光，震惊世界，成为我们的骄傲。”

在现代足球的故乡英国，获得能派四支队伍参与世界杯预选赛的优待。但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和北爱尔兰队往往积弱，只有英格兰队星光闪烁。“三狮军团”英格兰队每次在出征前都被无良的本国媒体炒作成夺冠热门，最终结果则是一次次让球迷伤心，除了大赚一笔的酒吧老板外，其余人都只能收获郁闷。因此英国领导人也没拿世界杯当正事，他们关注的是另一个赛事：英联邦运动会。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在两年前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客串表演”跳伞后，再次涉及大型赛事，女王表示自己很期待2014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顺利举办。有84年历史的这一大型体育赛事共有53个英联邦国家和71支队伍参与，2014年夏天将在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举行。

女王提及运动会可能目的并不在赛事本身，而在于对举办地苏格兰喊话。因为按照计划，就在英联邦运动会结束一个多月后，苏格兰首席部长亚历克斯·萨蒙德政府就要在9月18日推动通过公投让苏格兰脱离英国独立。女王重申了英联邦的重要作用。

首相卡梅伦也通过新年文告向苏格兰公众发出呼吁，希望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他说，“今年，让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告诉所有苏格兰民众：我们希望你们留下，我们同心协力，可以打造更强大的英国。”

希望以体育赛事做纽带的不止卡梅伦一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如此，他的平台是索契冬奥会。普京表示，举办索契冬奥会将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俄罗斯，将有助于提振民族信心，推动国家发展。普京表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能够促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有助于发展大众体育，提升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而对外来说，索契冬奥会“也将有助于发展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地区）的关系”。

从巴西到英国再到俄罗斯，政治家们喜欢拿体育说事，而把重点引向其他领域。

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享受到的则是体育运动和比赛带来的乐趣。不过，运动也要注意安全，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前车之鉴，新年时她告诉公众“我自己其实总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户外活动——这一定也算是众多新年计划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谁能料到，不到一周后她在瑞士度假期间滑雪时摔伤，不得不取消随后三周的行程。❧

6 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

借助多年猴子细胞实验积累的数据，美国比弗顿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 Shoukhrat Mitalipov 及其同事发现了能够适用于克隆人体细胞的“秘诀”。科学家表示，去除人体卵母细胞内包含 DNA 的细胞核，然后将这些细胞与胎儿皮肤细胞或8个月大婴儿的皮肤细胞融合，产生出的胚胎携带着来自皮肤细胞的 DNA。之后科学家能够使用这些胚胎衍生出胚胎干细胞，理论上这些胚胎干细胞能够分化成这个婴儿的所有类型细胞。

7 世界最大地面天文观测装置正式启用

总投资15亿美元、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面天文学观测装置——“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天线阵”2013年在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正式投入使用。66个重约120吨、直径从7米至12米不等的高精度抛物面天线组成一架直径16公里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分辨率可达0.01角秒，相当于能看清500公里外的一分钱硬币，“视力”超出“哈勃”望远镜10倍。

8 首张人脑超清三维图谱问世

一个由神经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历经10年，通过对一名65岁妇女的大脑样本进行切片研究和分析，制作出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完整三维人脑图，包含1万亿字节数据的高分辨率图谱，非常精确和精细地展示了神经元组织，有助于弄清甚至重新定义几十年前解剖学研究所获得的大脑区域结构。

9 首次实现人脑之间的远程控制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互联网发送其中一人脑中的“想法”，实现对另一人大脑及手部动作的控制。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技术容易让人联想起各种科幻“心灵融合”情节。但实际上试验中所用的只是易被脑电图仪识别的简单脑电信号，而不是人类真正复杂的思想，它不会让任何人拥有控制别人行动的能力。

10 “一箭32星”发射创新纪录

俄罗斯2013年11月21日用一枚“第聂伯”运载火箭顺利发射了多颗卫星。根据计划，本次发射的一颗意大利卫星在入轨一个月后，还将释放出其携带的多颗子卫星，使发射载荷总数达到32个，超过美国“一箭29星”的世界纪录。据介绍，此次发射的卫星中最大的一颗是阿联酋的地球遥感卫星，质量为300公斤，能够从距地球600公里高的轨道上拍摄精确度达1米的地面影像。

爱情的层次

爱情中的患得患失和由爱生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欲的延续

文 | 半僧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是世俗人生必修的功课，但是我们却难以找到关于爱情的教科书。每个人都需要谈情说爱，但是你懂得爱情吗？如果把爱情分为四层，色、欲、情、灵。你的爱情又处在哪一层呢？

色相

色相，就是外貌，它的外延也包括身份、地位、财富等身外之物。

秀色可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外貌上符合自己的审美，是爱情萌发的基础，但是外貌并不是爱情的全部。

容颜易老，再美的花也会凋谢，如果感情仅仅停留在皮相，就很容易变质。

蒲松龄的《聊斋》中有一篇《画皮》，写一个恶鬼，披上一张描画出来的美女皮相，迷惑了一位多情书生，最后却吸干他的血脉，挖出他的心要吃掉。这个故事很像一个现代社会的寓言。

现代人过分注重外貌与外在的物质世界，富豪与明星的结合被媒体一再夸张渲染，电视剧中，美貌与财富取代了爱情，变成了主题。整容业发达，却没有人看重内在修养。

其实人们丢失了最关键的东西，心灵，爱情最重要的部分来自内心，而非外貌。所以，古人把爱人称为“心上人”而不是“眼中人”。

欲望

喜欢就想占有，是人性的本能。欲望是指以自我得失为中心的占有欲，爱情中占有欲的主要动力来自性欲。

性欲在中国的文化中，是被忽略，或者

说被刻意回避的部分。朱熹以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虽然早已被推翻，但他的影响可以说至今仍在，在中国，性被严重道德化、羞耻化。

欲望是人的原始本能中的重要能量，并不会因为回避和压制而消失，压抑的结果，是使它走向两个极端，一端是像动物一样纵欲，另一端是冷漠，纵欲变得猥琐，而对欲望冷漠的人则会变成伪君子。

欲望如同潮水，来时汹涌，去得无影无踪，时间短暂且不稳定，不仅不能长久，而且易变。所以纵欲的人，往往不专一，朝秦暮楚，因为欲望的本质是寻求新鲜的刺激。

我曾经看到有人，尤其是男性在人前夸耀，自己跟多少异性上过床，换过多少任女朋友，而且越换越年轻。我想说，这其实跟一个不停吃东西的动物没有差别，因为通过感官欲望获得的快感非常有限。人类区别于动物因为人有情感和心灵，爱情的美好并不在欲望获得满足，而是从欲望出发，继而带来情感和心灵的升华。

对欲望的无知，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分不清欲望还是爱情。欲望有时会经过人的妄想，化装成爱情，但发现当欲望的潮水退去之后，只剩下一地鸡毛。有人会结婚之后才发现，自己把少年时的欲望当成了爱情。欲望就像琼瑶小说中的主人公，丧失理智的沉溺，觉得他的一切都好。爱情是理解、接纳、包容。

善用欲望，你会发现，有时身体比大脑更聪明，比如当你的思维无法断定自己是不是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告诉你答

案，你爱的人靠近你，你会感到渴望和欣喜；而你爱的人靠近你，你的身体会感到不舒服。需要提醒的是，这个理论并不可以倒推，就是说，如果一个异性靠近你而你感到很高兴，那可能并不是因为你爱上了他或她，而是你一时的冲动。

情感

“问世界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爱情中的情感层面，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描绘最多的，它是与爱人相关的喜怒哀乐，是爱屋及乌。它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感情。

爱情中的情感并非都美好，因为有患得患失的纠缠，也有因为得不到而由爱生恨。

患得患失来自占有欲的延续，可以称为心理欲望，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定要得到对方，得到承诺，甚至让对方做的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才满意。如果不了解对方的喜怒哀乐，而只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又怎么称得上爱呢？爱情来自接纳和成全，而非占有。

关于爱情，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谎言，“找一个爱自己，比找一个自己爱的要好。”我听到很多人用这句话来教育年轻人，我想说这句话的人大概并不真正懂得感情。在爱情中，快乐往往来自付出而非得到，因为付出的一方有自我实现的价值感。

另一个误解是，爱的反面是恨。其实爱的反面是冷漠，爱和恨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就像爱情总是和欲望相伴而生，恨是占有欲的延伸，我们不可能灭除欲望，只能了解它，善用它。我们难免心生怨恨，但是只要心存宽容，怨恨就不会放大，不仅是宽容对方，更是对自己的欲望、自私和怨恨等负面情绪的宽容。

灵魂

《红楼梦》中宝玉为什么不喜欢人情练达的宝姐姐，偏偏痴爱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呢？其实，薛宝钗的容貌并不输林妹妹，她面貌端庄、体态丰腴，贾宝玉看着宝姐姐也有三分心旌摇荡，但是他们在灵魂的层面却难以沟通。贾宝玉厌恶宦海沉浮，不屑功名利禄，但薛宝钗却是个世俗的女人，苦劝贾宝玉用功学习，求取功名。贾宝玉却说道：“林妹妹不会说这样的混账话！”黛玉在一旁听到，

不觉又喜又惊，心里想“自己果然眼力不错，素日里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

这里所说的知己，可以理解为心灵相通。灵魂层面的爱情，是心心相印的默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有灵犀。

色相、欲望、情感、灵魂，爱情的四个层面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层层递进，没有被对方的相貌激起的欲望，也就无法生长出情感，没有情感的纠缠，就无法升华到心灵的层面。但是，一旦爱情到了更高一级的层面，就很少犯低级层面的错误。比如，深刻的爱情，不会以占有对方为目标，心灵相通的爱侣，一般也不会陷入爱恨得失的世俗纠缠。层次越高的爱情，越能体会到爱情的美好，而少了痛苦的挣扎。

因此，我始终认为，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交代的宝黛结局，违背了曹雪芹的初衷，高鹗写贾宝玉新婚被偷梁换柱娶了薛宝钗，而黛玉在宝玉新婚当夜，因误会宝玉移情抛弃了她，怨恨而死。试问，两个心灵相通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大的误会呢？爱到深处是深信不疑。以黛玉误会宝玉含恨而死的情节作为结局，充满了市井之气，太轻贱了曹雪芹用毕生心血来描绘的宝黛之间这段木石前盟的奇缘。笔者更欣赏已故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对曹雪芹八十回后的续写，贾家道中落，宝玉被拘，黛玉在一个有月亮的寒夜，绝望投水而死。这样的情节发展也应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曹雪芹所写七十六回），这首诗中的伏笔。

但灵魂之爱，并非所有相爱的人之间都有，往往可遇不可求。世俗生活中的爱情，一般只要具备前三个层面的感觉，就可以称得上美满了。

所以，灵魂之爱，往往被写进文学作品中，让人们无限向往。就像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当你老了》中所写的这样：

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报道反馈



统生产方式落后，被淘汰是必然的，但是从人文角度来讲，越来越多的新一代连日常味蕾都国际化全球化了，民族的东西又如何传承？上世纪 90 年代还有荣华鸡大战肯德基，现在这样的话题都不成为新闻了，提都无人提了”。

（《中国肉猪保种战》、《中国畜禽品种消亡趋势加剧》记者：刘耿、周范才、康佳 2014 年第 3 期）

少用融雪剂

近日，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小雪，直到中午方停。我出去买东西时，发现不少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上的积雪了。我问一位环卫师傅，为什么这么快就开始除雪。他笑呵呵地说：“今年环卫处出台了新规定，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只要雪停就得到自己负责的路段进行清除。因为从今年开始除了特殊情况使用除雪剂外，原则上全部用机械和人工除雪。”

想想以往，只要下雪，不论大小，为了快速清理，几乎都采用撒工业盐的方式除雪，虽然很快就能使道路通畅，但之后路面却变得一片惨白，这对道路有很大的破坏。另外，大部分含盐积雪来不及清运走的，几乎都被就近堆放在树的根部，这对植物也是一种极大伤害，其中含有的氯化物等极易对环境造成破坏，据报道，融雪剂滥用已经成为腐蚀中国城市的一大隐患。

所以今天听了这话后，不禁为市政部门的这项举措叫好，这说明我们的政府越来越重视环保了。

王军（辽宁）



热心读者
来信邮箱：
lwdfdzlx@163.com



新华社有错即改
专用邮箱：
ycjg@xinhua.cn



编读往来 热线电话：
(021)64721367
lwdf2008@vip.sohu.com

小老板老徐

老徐算是个成功人士了。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他骑本田摩托车；等我骑上摩托车时，他开桑塔纳；等我开上桑塔纳，他已换了第三辆车，准备买宝马了。

老徐讲，要是命好，财运是挡也挡不住的。

但这几年老徐有点烦，开办的公司经营惨淡，而且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先是一个外省的会计卷了他两万元钱跑了，老徐至今想不通，要卷也得卷多点，怎么就两万元呢。再是他的一辆汽车开着开着，自燃了，损失了不少钱。这倒也罢了，最郁闷的事情是，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业务一落千丈，租在杭州庆春路上的三间写字楼，只能合并成一间，人员也减了三分之二。

那天去时，还没有进门，我就听到老徐的声音。本来老徐的声音带有磁性，总是慢条斯理的，但现在这声音，可以咆哮来形容了，“你们的进度怎么会这么慢，就是一笔小单子，还谈不下来……”我也不知道老徐为什么这样生气。

等到办公室里的声音平息下去，我故作轻松地走了进去。这一进去，我就看到一个女职员，站在办公桌前，哭得像泪人一样。而老徐背对着办公室，透过窗户看着杭州上空灰蒙蒙的天。

训下属，能训到这般地步，可不是老徐的一贯作风。我打着哈哈走进来，老徐看到我，便笑，是那种非常难

看的。老徐的笑还没有结束，我就听到“哗啦”一声响，只见那个小妹妹把桌上的文件资料、台灯、电话机等等，一股脑儿全部砸在了地上，小妹妹大叫：“我不干了，谁在乎啊。”小妹妹哭着走了。

老徐呆在那儿，看着我，看着地上的东西，脸上红一块紫一块。

我从老徐的公司回来后，也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以前老徐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怎么可能这样气急败坏。当年我们在一起啃干菜，每月拿一百多元的工资，害怕连老婆也娶不上的时候，也没见他气急败坏过啊。

我也知道老徐的心态，公司关门了，老板当惯了，会让人瞧不起。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就为了图个名，就是让别人说声“这个人是强的”。

但我还是低看了老徐。老徐把公司关了，员工工资一分不欠，银行贷款全部还清，写字楼水电费全部结清，老徐这人，在商场里混了十几年，人品到底还是在的啊。就是人不见了踪影，据说去休养生息去了。

每个人都需要和解，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与别人和解。和解才能和谐，和解才能快乐，我还是挺佩服老徐的。

流沙（浙江）

过去盼年，现在盼人

过去，盼来的年无论是什么滋味，都有个盼头，盼来的这个年再难过也没关系，明年那个年，会有新的展望和希望。年复一年地盼，年复一年地活在希望中，日子艰难而充实。

现在盼人。商业时代把太多的家庭拆散了，一家人撒豆一样撒向了全省、全国、全世界。平时家里发生天大的事，游子也可以不回来，但过年是必须回来的。老百姓对年的敬畏根深蒂固，过年不回，得有特别重大的理由。抱定游子要回，便成了过年最大的期盼。盼年，变成了盼人。亲人要回了，就是过年。

过去盼年是盼好吃的，许多好东西过年才能吃到，许多不好做的东西，过年才会耐着性子做。现在不盼吃的了，过去过年能吃到的稀奇东西，现在超市都有卖，平时都吃厌了。不好做的东西也不做了，麻烦，没工夫。

劳神费力做了，也没几人动筷子。现在美味太多，不稀罕。现在过年盼聚会，有的亲人几年没见了，有的朋友一年才能聚一次。过年真忙，不是忙吃的，而是忙聚会。

过去在家吃团年饭才叫过年。现在不一定在家吃了，赶时尚、比面子、讲排场，那才叫过新年。到大酒店包席吃团年饭，包席花的钱越多，过年的档次越高。老年人刚开始比较抵触，认为年轻人硬生生把年过丢了。现在也想通了，偶尔也显摆一下，告诉邻居，团年饭是在某某大酒店吃的，这孩子，一顿花了一万多元。

除夕不再是一家人围着火炉说话儿，搞总结，谈希望什么的，成了看春晚打麻将。孩子也不黏着老人了，要上网。有太多的老人，过去坚持守岁，除夕夜摆摆老人的尊严，说说后人的闲话，现在抓不着人，早早地睡了。

过去过年盼热闹，现在盼来的是难言的寂寞。大年三十过了，大年初一睡觉。春节的户外，一片冷清。中国人最疲劳的一天到来了，一年的疲劳，加上大年三十熬夜的疲劳，几乎十有八九的人歪在床上。一边歪着一边发牢骚，过年真没意思。

阮红松（湖北）



微言

@塔斯肯塔老师：

乌鲁木齐机场，没有矿泉水，没有饮料，一盒方便面20元，一根冰棍10块！售货员还告诉我这是物价局的定价，这是真的吗？没有人投诉吗？我要投诉！全国的机场都没有这样的服务！

<http://weibo.com/1872161450/AtBUBg4yy>

@AdolfJi:

我要投诉秦陵博物院，一是3号坑梦回秦朝摄影处，工作人员吃东西，味道极大。二是2号坑和兵马俑出口有人推销兵马俑。三是秦陵遗址公园的所谓义务讲解员主要工作像是卖东西，最后将我们带到东谷楼，公开说我们去东谷楼的人数和他的奖金挂钩，并说秦陵的博物馆没有开放，是否开放了呢？

<http://weibo.com/1761030555/AtDwcaAYg>

他国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都是很难的

——历史学者姜义华专访（一）

在姜义华看来，讲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都要建立在对自己的历史包括世界历史有真正了解的基础之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上海报道



姜义华，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1939 年生于江苏扬州。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1995 年 9 月应邀在日内瓦第 35 届国际论坛上就中国正在进行的和平革命作主题报告，是该论坛成立 50 年来邀请的第二位中国学者。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传统小农社会及其近代变迁”、“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转型”、“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突破性创新研究成果。代表论著有《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章炳麟评传》、《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中华文明的根柢》等。



在未来的世界秩序重建中，中国的软实力应该引起世界的关注

中华民族复兴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经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国凭借这一文明根柢，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从事历史研究半个多世纪，姜义华感到有必要在历史的深处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近作《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中，姜义华对中国崛起背后的文明根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说，“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有着自己难以摧毁的根柢，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强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

他认为，寻求民族传统与精神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借助这些根柢，并充分依靠形成这一根柢的核心价值，在完全改变了的现实环境中，积极吸收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优秀成果，对自身进行有效的变革而一步步实现的。

“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传统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认真梳理一下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真理。”姜义华在书中这样写道。

2013年岁末，《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以及现代转型等问题，在复旦大学对姜义华进行了专访。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姜义华，言谈间不失历史学者的严谨与缜密。从中国近百年来道路探索，谈到西方学者对今日中国变化的关注；从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谈到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从中华文明的三个根柢，谈到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四大核心价值；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谈到农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话锋纵横古今，落脚点却总在当下。

在姜义华看来，讲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都要建立在对自己的历史包括世界历史有真正了解的基础之上。”

采访全文约一万八千字，拟分三次刊发，

本期为第一部分。

走一条符合中国历史和现状的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近两年热议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你的看法是什么？

姜义华：其实这100多年来，中国一直都在探索要实现振兴中华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我们前面主要想学习西方，但是很早就发现，西方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曾经想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也想学日本明治维新，还想学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后来又想学习法国、德国，经过一场大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模式，最后还想学苏联，特别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些模式我们都探索过，但是每一次学习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把这些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都是很难的。

于是人们开始探索在中国的土壤上，怎么寻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这种探索从孙中山就开始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大家都想努力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当时我们对苏联模式本身的认识还有很多问题。例如我们一直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总结的经验和概括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成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当成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所以我们的自我修补基本上还是在局部范围内，没从根本上检讨。直到经历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对苏联模式有了比较深切的反思。

我们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局部一步步开始做。比如当时搞了特区试点，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始都在很小范围内进行。我们打破计划经济，最初公有制为主体，民营企业做补充……一点点试验，最后发现把公有制绝对化完全脱离了实际，尤其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脱离了中国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我们逐步认识到，除了国有经济之外，民营经济实际上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大的动力。市场也从当时的“补充作用”，到后来变成“一部分”，再到现在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这个转变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老百姓生活普遍提高，能够达到马克思当年讲的，江泽民在2001年建党80周年会上又重申的“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都需要中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一条符合中国历史和现状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探索中国道路实际上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

至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现在讲可能还太早了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不断探索中间，但一个基本点是，我们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广泛地吸收全人类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制度生产的各种优秀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寻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一条发展道路，这个表述可能更为准确一些。不用太早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确定的模式。包括今天我们说顶层设计，这本身就还是一个设计阶段，实践过程中怎么去做，还要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不断探索、不断反思、不断实践。

我比较赞成讲中国道路，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曾断言“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福山近几年也开始反思自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并对中国模式高度重视。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你怎么看？

姜义华：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的确有很大的转变。因为中国这几十年，尤其是最近35年来发展迅速。世界上其他国家走过这个发展阶段，都经过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而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却从人均几百美元发展到现在人均5000美元甚至更多。全世界只要是不带偏见的人都要关心这样的变化。

1949年，毛泽东说中国90%的经济



和平崛起的中国让世界瞩目，用“铁与血”称雄的模式早已成为历史。图为油画作品德皇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登基，白衣者为铁血宰相俾斯麦

生活还停留在古代，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可能还有70%~80%停留在古代，我们的经济生活和古代差不多。而到今天，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生活已经有70%~80%走出了古代。这个变化在全世界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深度之深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正因为这样大的变化，所以福山他们都要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

但21世纪是否就像汤因比说的就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只是他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在未来的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中国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应当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的软实力应该引起世界的关注。

但是我觉得，21世纪肯定不会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也不会像19世纪、20世纪的英、美霸权一样直接主宰和影响世界秩序。我想未来还是一个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想让谁代替谁，谁一统天下，都不太可能。未来的秩序还是在各种文明的互动中形成的。这其中既包括亨廷顿讲的影响最大的三种文明——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也包括我们不能忽视的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还有现在正在崛起中的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等。

自信建立在对历史了解的基础之上

《瞭望东方周刊》：亨廷顿教授去世前曾写过一本名为《我们是谁？》的书，认为美国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却出现了精神危机，不知道美国人是谁了——民族特性模糊了。您刚才也提到，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十分迅速。在这样急剧的社会转型中，中国人精神层面是否也存在缺失呢？

姜义华：谈西方的没落很早，是从斯宾格勒开始，后来汤因比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世界的文明。而亨廷顿所提出的上述问题主要是针对美国而言的。20世纪美国影响力上升，特别是后半期，尽管曾经有苏联和它相抗衡，但是它在世界上的支配性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当苏联瓦解的时候，美国曾经不可一世。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国家内部的危机其实还是很深的。

其实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早就已经凸显。后现代主义思潮崛起后，对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的矛盾和危机的感觉相当敏锐，发现了很多深刻的问题。比如他们表面上讲自由平等博爱，讲天赋人权，实际生活中因为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都带来大量的问题。

市场化把人和人的关系完全变成货币交换的契约关系、利益关系，就像亚当·斯密说的，人都变成了经济人。工业化则一方面使物质生产丰富起来，另一方面带来的后果是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压倒了精神上的追求。城市化带来了人口、人才、资金、信息等各方面的集中，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它又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亲情的、自然的、感情的联系。所以现在城市人口虽然密集，但是人和人之间是很疏离的。信息化发展使得人们在世界范围内信息联系变得非常密切。但是它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比如现在垃圾信息泛滥，网络诈骗等也随之而来。

世界化也是如此，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解放和他与世界的联系程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与世界的联系程度与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每个人都与世界紧密联系，但是这些变化让人们会不知不觉完全丧失自我，为它所左右。所以要保持自己的本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现代化发展的所有层面都有两面性，整个世界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发展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今天中国也同样在面对。

姜义华：对。今天中国也经历了这样现代化的发展，我们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世界化等等都在快速发展。这当然对我们传统的文明、传统的价值观都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在这个情况下，要适应今天整个市场化的发展，我们怎样继续保持自我，保持自己民族、国家、文明的主体性，建立起一套能够应对现代各种异化问题的新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解决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更多是忙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没有把它转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上来。

所以，在相当一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间内，更多思考的还是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等的正面意义，对它们负面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审视和反思。还没有能利用我们自己传统的资源和世界上的新资

源，去建立起一套能应对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性挑战的价值系统、意识形态。这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致力于中华文明根柢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发掘，是想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姜义华：对。这其实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今天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希望搞清楚中国道路、中国的发展内在动力是什么，真正的根基是什么。因为中国道路，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究竟怎么形成，可能还是要从根本上、从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中间去寻找。所以我们讲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都要建立在对自已的历史包括世界历史有真正了解的基础之上。

中华文明是巨型的复合型文明

《瞭望东方周刊》：在对待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肯定的文化复古主义两种倾向，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姜义华：马克思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类今天的发展，是全部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今天的人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和今天我们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所有客观条件，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是历史形成的。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历史，不可能超越历史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限度。所以我们真正要了解今天的主体“人”，要了解进行历史创造的所有客观条件，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有真正完整的、系统的、真实的了解。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

但是我们过去对这个重视不够。我们对于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从其本身出发的重新反思和审视。我们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但当时主要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人编的一批中国历史教科书，还有一些传教士对中国历史所做的解释。那些解释比起我们传统的二十四史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更简明扼要、也更观点鲜明，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把二十四史都看作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按照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

寻求民族传统与精神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传统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我们更多接受的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当时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地去学习他们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这成为我们当时新历史观最标准的样本。我们按照“五阶段论”来解释中国历史，没有资本主义，就搞了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又搞出了东方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很多东西还是很难解释得通。

今天真的要弄清中国道路、中国国情，弄清中国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历史究竟给我们今天提供了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怎样制约着我们未来的发展，就需要真正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对中国历史做出重新的梳理，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一套史学体系，这样才能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应该从中国的历史来认清中国的现状，而文明这个概念比国家、民族的概念更容易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这是为什么？

姜义华：我80年代中期到日本去，读到了日译本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全文，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汤因比认为，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很难讲清楚历史，因为国家的变动太大，民族太多，前后变迁也特别大。所以他提出以文明为单位，因为在相类似的许多国家、地区、民族，他们是共处在一个文明中，以文明为单位可能更容易把握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以，他最初谈了21个文明，后来逐步增补到30个左右。他把文明分为第一代的原生文明，第二代的次生文明，还有围绕这些大文明周边的文明和一些停滞的文明。

他强调这些文明有历时性，也有同时性。因为从文明的角度讲，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也不过几千年，而在人类发展几百万年的历史中，几千年只不过是短短一瞬。所以这些不同的文明有同时性，基本是等价的。这样

就给我们一个比较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以文明为单位可以让我们超越单一国家、单一民族、单一时段，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中核心的东西。不说是规律，至少可以知道一些基本的趋势、共同的特点以及各种文明发展的个性。我觉得汤因比的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观察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未尝不可以做一个尝试。

在这所有文明中间，中华文明是第一代原生文明，而其他的第一代文明如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都已经消亡了，甚至后来崛起的第二代文明很多也已经消亡了。而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统一文字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以文字为载体的整个中华文明也一直延续至今。汤因比在分析世界文明的架构时，谈到统一国家、统一宗教，包括应对内、外部无产者的挑战等等，用这些问题来分析中华文明，你会看到，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华文明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中华文明摆脱了像许多文明一样覆灭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具有强大的再生力和凝聚力。

我觉得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历史，深刻认识中国，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跳出曾经迷信过的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的桎梏。

《瞭望东方周刊》：你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一种应对环境的挑战而形成的复合型文明，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姜义华：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将中华文明等同于儒家，等同于汉族，我认为这都不准确。

我当年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时候就说过，把中华文明概括为儒教文明，这个把握是不准确的。中华文明不仅仅是儒教、儒学的文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中国对很多宗教都可以包容，比如佛教、伊斯



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生活已经有70%~80%走出了古代。这个变化在全世界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图为2014年1月9日，上海

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到中国来，都可以被接纳。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最华丽、最庄严的建筑都是教堂，但是在中国，这些教堂虽然都可以存在，但却不是占支配地位的。

在中国过去占支配地位的儒家、道家等都讲人的现世生活，没有寄希望于高高在上的上帝和死后的彼岸世界。孔夫子讲“不语怪力乱神”，这是我和西方很大的差别。我们是讲人本身，讲的是人怎样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人，怎样成为君子，怎样成为圣贤。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是把道德教化放在文明发展的最核心的地位。所以，不能单纯只讲儒教或儒学就是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有那么多的宗教战争，儒家有不同的派别，后来的孟子和荀子也是不同的派别，到了宋明理学，变

化更大，但是它没有像西方那样有那么长时间的宗教战争。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中，宗教生活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之一，宗教正是他们文明的支撑。但是在中国不同，中国最重要的是道德教化，是人怎么做人。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

姜义华：这是文明从一开始就产生的差异，西方更多地把希望放在彼岸世界。比如基督教有原罪思想，讲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而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强调人对家庭、对国家、对天下要负起责任。所以我说中国是崇尚责任伦理，这是构成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点，不能说中华文明就是汉族文明。第一，汉族本身就说不清，从血统上来说，它绝不是一个单纯族源的民族。中国的南方

人和北方人在体形、体质等方面差异都很大，就因为北方是蒙古族系统，南方是马来系统的，还有其他系统。汉族本身就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由很多族群逐步融合而形成的。另外，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不仅仅是汉族的功劳，北方游牧民族，西南的农牧山林地区也长期参与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构建。其实，正是我们的农耕文明和其他文明长时间的互相博弈、互相交融，形成共同秩序，最终才形成了中华文明。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中华文明简单看作一个儒教文明或单一的汉族文明。我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合性。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是个巨型的文明，中华民族是个巨型的民族，中国是个巨型的国家。要把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国情，了解我们的文明。✎



“怎样才能在以后去的时候避免碰到雾霾天呢？”我苦笑着告诉她，目前来说，这只能靠“拼人品”加“拼肺”了

文 | 李赛拉

一个英国旅行者的“中国三问”

“亲眼所见的中国跟平时读到看到的中国，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友人L，50多岁中年英国女性，伦敦某大学教务人员。今年夏天，她所在的院系要组织一批学生去北京和上海修学旅行，她受命先去打个前站。行前，第一次去中国的她，辗转托朋友找到我，询问了一些在中国旅行的注意事项。

我跟她讲了些基本原则，又托了些中国朋友给她做向导。两周后，她从中国胜利班师，打电话约我出来喝杯咖啡，说有些感受要和我聊聊。

一见到我，她的第一句话是：“北京和上海都好现代化！什么都是全新的！上海看上去几乎就是纽约！”我不禁莞尔——对于身边都是老房子、旧习惯的英国人来讲，发此感慨可谓意料之中。

接下来赶紧问她，是否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她说，大部分中国人都特别友好、热心帮忙，很多人都会说英语——除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她在北京所住酒店的门外“碰到”的。一看到她出酒店门，这个女人就紧紧跟了上来，用几个英语单词拼起来的“英语”问她，去哪里，要不要带路。她牢记我告诉她的原则——不要随便搭理主动搭讪的陌生人，于是摇了摇头。这个女人却不肯放弃，仍然紧跟着她，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她望着她的眼睛，清晰地说了个单词：NO！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女人居然对着她开始破口大骂。尽管不知道她在骂什么，但出门莫名其妙被骂的感觉，她是平生第一次遭遇，让她胸闷不已。

“告诉我，怎样才能让紧跟着你搭讪或推销的人‘消失’？”她认真地问了我第一个问题。

我苦笑，说，大概只能一直向前走，不回头，完全不要搭理他们！

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我问。

她说，北京和上海都好贵——购物中心里，不少商品的标价换算成英镑，比英国贵得多。她的旅行箱在途中突然坏了，去北京的商场里一看，价格太贵，实在不合算，最后只能请我在北京的朋友带她去秀水街买了一只暂且用着。

“不是都说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只有英国人的十分之一吗？中国人如何负担得起这样的价格？我听说房子还要更贵。”她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

我解释说，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是一个地区、行业、城乡之间差别都极其巨大的国家，不像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虽然有区别，但生活水平还是大致相当的。所以，“平均值”对于理解中国意义并不大。持续30多年的两位数GDP增长，使中国富人——我们常常称之为“土豪”——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其财产规模是一般英国中产阶级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中产阶级的人数和购买力也已经相当可观。而与此同时，还有比整个英国还多的人口仍然处于贫困之中。

她不停点头，感叹说真是应该每年都带学生去中国旅行，亲眼所见的中国跟平时读到看到的中国，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除此之外，她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北京有一天“爆表”的雾霾。所以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在以后带学生去的时候避免碰到雾霾天呢？”

我苦笑着告诉她，目前来说，这只能靠“拼人品”加“拼肺”了。☞



李赛拉：媒体人，现居伦敦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

文 | 松野丰(日本)

一个日本人的观察： 中国如何从源头上反公款送礼吃喝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常常见到一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却实际上逾越了公私界限的行为



2013年年底，全中国都在反对节日期间公款送礼和吃喝。这让我想起一个英文词——“compliance”。它虽是英文词，很多日本人却都知道，因为它是日本机构和企业员工要遵守的最重要的个人道德守则，用中文来表达的话大约是“遵守法令”或“遵守规范”。

在日本，它是职场上最基本、最绝对的伦理观，即严格遵守公私界限，不可越界。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常常见到一些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却实际上逾越了公私界限的行为。比如，从进货商户那里收受礼品或招待，将购买办公用品时得到的优惠券据为私有，买公用物品的发票用到其他物品的报销中，在工作时间用公司的电脑上网购物，等等。

我从事咨询业，曾在上海为日本公司创立分公司，由于公司有一些客户是在金融业界，所以我们规定，员工买股票需要向公司报告。在公司规定的说明会上，不少中国员工听到这一规定都显得很吃惊：“我们买股票还要向公司报告吗？买股票不就是通过那些知道内部消息的朋友来赚钱的吗？”当时的我，闻之不禁瞠目结舌。

很多中国人或许不能够理解——上述行为并不是占用公司

财产啊，也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为什么也要作出要求呢？

这是为了从观念和制度的源头保证“公”和“私”的井水不犯河水，从而杜绝公器私用的可能性，使廉洁成为一种自觉。

我还曾与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商谈一个合作项目，正当我要说明委托研究费用的瞬间，这位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了几份正在和其他日本企业进行的共同研究的协议书给我看：“你看，某公司在某领域以某主题，以1200万日元作为委托费用请我们做研究。K公司在某某方面的研究开发……”

我郑重向他表示谢意后，站起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在想的是，如果和这位教授再谈下去的话，我们的相关信息同样也会被别的公司知道。

在中国，大学与企业的共同研究即所谓的“产学研合作”中，成果所有权归双方共有，在这位教授看来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使用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公私不分、超越职业道德规范的例子。

只有建立起公私严格分明的职业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在中国杜绝公款消费、吃喝，和其它形式的公私不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概念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当然，也许这是中日两国国情不同所致。日本人那种几乎可以称为“洁癖式”的职业伦理观，是否能在中行得通，仍然需要观察。东

只有从观念和制度的源头保证“公”和“私”的井水不犯河水，才能杜绝公器私用的可能性，使廉洁成为一种自觉

松野丰(日本)：Billionbeats专栏作家，
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心主任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

